

国是

Vol. 16

> 吕守军-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动态博弈及对我国金融监管改革的启示

> 刘玮辰-踮起脚尖，遇见学术之巅-哈佛访学的观察与思考

> 吕立远-数学与社会科学的奇妙邂逅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



博学 明德



奋进 和谐

国是

卷首语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林冈

在改革开放即将进入第四十个年头之际，《国是》刊物邀请我写篇“卷首语”。《国是》是学院师生汇聚知识、交流思想的园地。作为早过“耳顺”之年的老教授，有机会与本院年轻学子在此分享平生治学的经历和体会，堪称幸事。

四十年前的此时此刻，我正在为投入十年文革后的首次高考而紧张冲刺。1978年初入学，实现了延宕多年的大学梦。作为恢复大学招生考试制度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摆脱了以往无书可读的贫困，沉浸于知识的海洋之中。当年我们做学问的路径是博览群书，易稿誊稿，不厌其烦。不像如今可以凭借电脑调段移行的删贴功能，大大提高写作速度；还可以依托电子讯息，迅速积累和查核写作资料。信息爆炸的时代，需要更多地借助科技手段，快速反应，否则就难免落伍。不过蓦然回首，又难免好奇我们在疾步向前的同时，是否应该多一点气定神闲？在用微信进行人际关系的频繁交流时，是否应该多一点深思熟虑？在网络时代，如何处理人脑和电脑的辩证关系，涉及人文与科技竞合关系的永恒命题。我们既要鼓励科技创新，也要坚持以人为本，才能避免主客易位，电脑凌驾于人脑之上。

学院成立至今，经历了从北三楼到机械楼再到新建楼的多次搬迁，但学术立院的传统不变。衷心希望生活在上海这一国际大都市、交大这一老校园的年轻学子，能够以学业为重，不忘初衷。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精神，珍惜人生难得的知识储备期；以“壁立千仞，无欲则刚”的意志，抵制外界的诱惑干扰；进而发扬光大本院的立院宗旨，为国家和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必要的智力和人力支持。

【顾问】

钟 杨 姜文宁

【名誉主编】

谢 玮 彭 勃 樊 博
刘帮成

【主 编】

谢建功 张嫣婷

【副主编】

李锦红 胡蓉洁
李佳慧 刘青琴

【美术编辑】

庄雨倩 倪晨阳

【编 辑】

陈雪雯 李文静 赵晨晨
张心怡 李佳慧 孔子月
张红斐 熊 博

Catalog 目录

治学

超越“讲故事”的案例研究——读《Designing Case Studies: Explanatory Approaches in Small-N Research》有感1
刘一弘

大学学习的“练级”之路.....7
梁昕

洞见

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动态博弈及对我国金融监管改革的启示.....11
吕守军、徐海霞

“脆弱性”与“抗逆力”核心概念的界定及关系研究21
樊博、聂爽

雾霾影响下的公众情绪与风险感知研究——以天津市微博用户为分析样本.....36
樊博、杨文婷、孙轩

开卷

《大城养老——上海的实践样本》读书笔记47
杨帆

中国政治的变与不变——读《中国政治》50
陈雨雁

生于无印，长于无印——走近无印良品董事长金井政明.....53
李瑞琪

《白老虎》读书笔记.....60
张子江

有感

踮起脚尖，遇见学术之巅——哈佛访学的观察与思考.....62
刘玮辰

交大“武林”之路.....65
张心怡

社会科学与数学的奇妙邂逅.....68
吕立远

分享

挂职锻心炼性，助力成长成长.....70
黄伟强

走进哈佛.....73
周文星

狮城行：Why exchange? Why NUS?78
麦婷茜

巴黎政治大学交换基本情况.....80
金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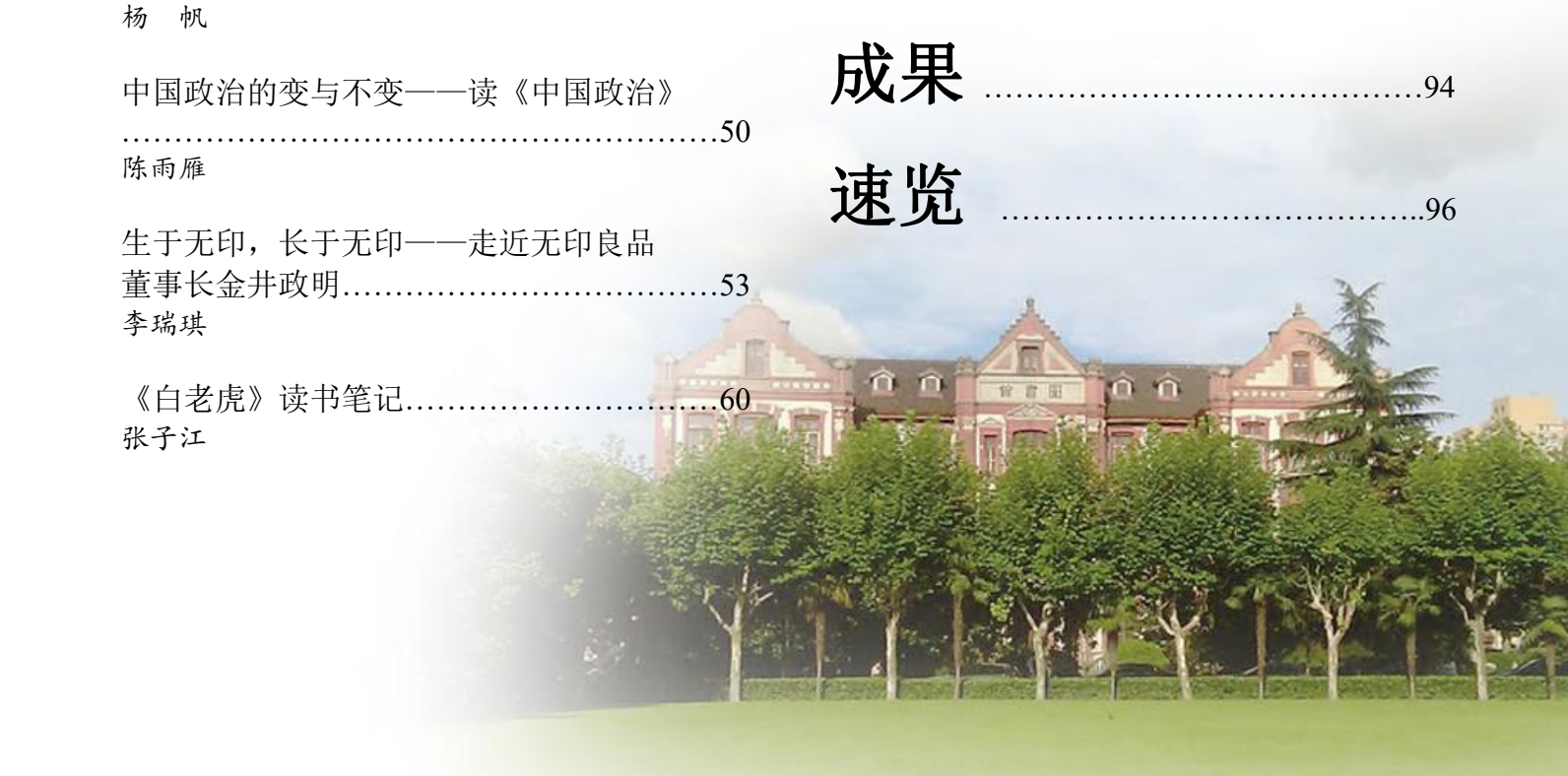
前沿

公共管理前沿理论梳理.....87

政治学前沿理论梳理.....90

成果94

速览96



超越“讲故事”的案例研究——读《Designing Case Studies: Explanatory Approaches in Small-N Research》有感¹

Designing Case Studies: Explanatory Approaches in Small-N Research
By Joachim Blatter and Markus Haverland
Palgrave Macmillan, Basingstoke, 2012, 280 pp., £57.50, ISBN 978-0-230-24969-1 (hbk)

刘一弘²

定性案例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中最基本的方法之一，也是理论发展的重要路径。一方面，案例研究广泛应用于除经济学之外的所有社会科学中；另一方面，案例研究在实施过程中的严谨性和结论限制颇受质疑。过去二三十年的时间，对于定性研究的理论改进和案例研究方法完善成果显著，不乏加里·戈茨(Gary Goertz)、詹姆斯·马奥尼(James Mahoney)、亨利·布雷迪(Henry E. Brady)、大卫·科利尔(David Collier)、约翰·耶林(John Gerring)、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George)、安德鲁·本内特(Andrew Bennett)等名家之作。

之所以推荐这本书的根本理由是笔者自己从中获益良多。在博士课程的方法论课上，本书作者之一哈瓦兰德(Haverland)在全书还未完成之前做了现场教学实验，并在书正式出版之后给每位博士生邮寄一本样书作参考。通过课程经历，笔者形成了对案例研究从问题提出、理论建构和因果推论等基本过程的初步认识。在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与我交好的保罗·登哈特('t Hart Paul)教授也强烈推荐我精读此书。相比之前的通读，与实际写作想联系的针对性学习让我有更深入思考，对其中“共变性分析(co-variantional analysis)”和“因果过程跟踪分析(causal process-tracing method)”两种方法所支持的不同研究问题和案例选取标准印象深刻。例如，前者以自变量X为中心“是否产生影响?(Does X matters)”的研究问题类型出发，进行最相似案例之间的比较分析，而后者以结果Y为中心探索个案内现象发生的因果条件和机制(Which (combination of) conditions or mechanisms make outcomes?)。

今年，与学院其他老师合上“质性研究方法”课程，我以此为基础讲述“因果过程跟踪分析方法”和“一致性分析(congruence analysis)”。从“自己会”到“教人学”的过程使我

¹ 转载《实证社会科学》第四卷，2017

²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再一次有所获。例如，从过程跟踪的“单个理论解释单个现象”到一致性分析中“多个理论视角解释单个现象”的过程凸显理论解释的张力。从案例研究发展历史出发，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统筹理解案例研究方法理论基础，抓住整本书从认识论、方法论、研究目的和问题、理论和案例选取、数据收集和分析、因果推理和实证基础，以及结论类型和推广的纵向逻辑结构，同时打通案例研究在小样本、中层样本和大样本研究之间藩篱的横向关系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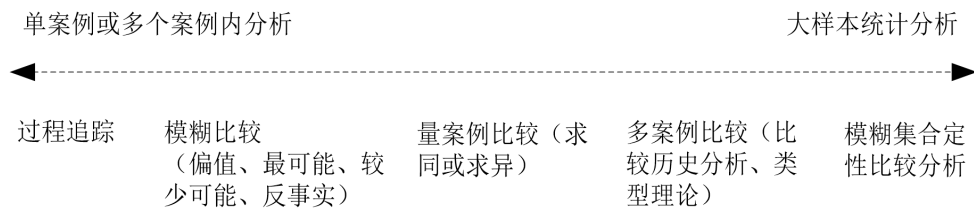


Figure 1 案例研究方法图谱

从初度此书到如今以本书为课程教材，体会在于本书结构清晰、整体性强。既能让我们理解案例研究的历史发展和内部关系，也能将其放在研究方法的整体框架下思考。其次，在简明扼要阐述完理论基础和历史发展之后，直入主题，且方法介绍部分目标明确、步骤清晰，能够满足初学者对于“怎么做”这一根本困惑的需求。当然必须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操作化和程序性对于定量研究方法而言不可相提并论。整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关于案例研究的基本知识包括概念、背景、历史等核心要素；第二部分分三章介绍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定性案例研究方法；第三部分介绍了定性案例研究方法内部，定性案例研究方法以及与中等样本和大样本案例研究方法的关系与结合。

在全书第一部分，作者开篇列举了政治学领域以案例研究为基础的经典著作力证案例研究方法在理论发展过程中的贡献和地位，以及把握从最初以案例比较设计到后来个案内分析的历史发展脉络。但随即指出，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对于案例研究的理论支撑明显不足且存在争议。自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政治学领域以比较案例研究设计即“共变性关系”为基础的研究一直饱受诟病。西方学术界一直对于案例研究在方法论层面有一定反思。

随后，作者介绍了摆脱支持案例研究传统认识论层面的新视角，以此为基础提出方法目标开始朝向以“过程跟踪”为基础的个案分析 (within-case analysis)，以及之后的“一致性分析”发展。即传统“共变性方法”通常处理案例比较，而“因果过程跟踪分析”和“一致性分析”主要应用于个案研究。进而，作者有创建性地提出不同的案例研究方法应具体依据不同理论基础，例如，传统共变分析方法与实证主义传统 (Empiricism) 的批判理性主义

(Critical Rationalism)紧密联系，因果过程跟踪方法以自然主义流派(Naturalism)的批判现实主义(Critical Realism)为基础，而一致性分析方法与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框架下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不谋而合，因此，折中的“中层理论(Middle-ground)”是整本书中介绍三种类型方法行文的理论基础。很显然，本书对案例研究的认识论基础跳出了实证主义和建构主义非此即彼的窠臼。

作者在第二部分将三种方法分为三章分别讲解。虽然三种方法都属于解释性类型，针对不同的研究目的和研究问题，作者提出三种方法之间处理案例选择、数据收集和分析等技术性问题应保持差别对待。特别基于认识论层面的差异，在因果推论方面更不能一概而论。每一章节系统地解释不同类型案例研究所需要的条件，以及每一类案例研究在研究设计方面所需要的匹配因素：研究问题、案例和理论选取标准，因果推论模型（数据产生和分析）以及结论推广方向，研究结论展示方式等等。

	共变性分析方法	因果过程跟踪方法	一致性分析方法
研究问题 研究目的	检测不同赋值的 X 是否产生结果差异 (Whether 问题)	揭示引发特定结果的条件和机制之间的时序性相互作用 (How 问题)	比较不同理论之间描述力和解释力
研究重点	自变量 X 作为影响因素	因果条件或社会机制的顺序组合或情境组合	相互竞争或补充的综合性理论贡献
案例选取 理论选取	选择多案例： 穆勒的差异法 多案例比较	选择单个或多个案例： 材料可得性、研究结果的实践相关性和理论相关性； 以个案为参照：积极案例或可能案例	多元理论选择根据在科学话语中的地位和研究者的理论抱负； 依据已选择理论的案例可能性原则
数据生成	观察： 能够体现变量具体化指标的信息； 结果数据： 对所有案例中每一个指标进行赋值	观察： 因果过程的时序信息； 反映原因和结果之间的时空距离和相近性的信息； 重要成员认知和动机的信息 结果数据： 因果链与因果衔接；确凿证据； 动机和认知交代	观察： 理论演绎所期待的信息； 结果数据： 对每一种理论的确认和反驳



<p>数据分析 (因果推论)</p>	<p>数据的必要内容: 因变量赋值和自变量赋值之间的共变性关系 结论: X 有因果作用于 Y; 结论的必要条件: 在因变量和控制变量之间没有理论上的相关性</p>	<p>数据的必要内容: 综合故事线; 确凿证据; 动机和认知交代 结论: 对于特定结果的必要条件或充分条件的理解; 结论的必要工具: 机制和过程动力的反事实和理论概念</p>	<p>数据的必要内容: 对于解释理论预期和经验观察之间一致性程度的差异 结论: 所选理论的相对重要性; 通过理论融合的综合解释 结论的可能条件: 先前关于案例可能性的期待与来自不同理论的期待是一致的</p>
<p>结论推广</p>	<p>统计分析性推广: 将结论推广到其他控制变量相似的案例中</p>	<p>可能性推广: 将经证实的因果组合和机制纳入潜在因果组合和机制的整体框架下, 进行理论发展</p>	<p>理论性推广: 将有解释力的结论推广到科学话语框架下的理论相关性</p>

表 1 三种案例研究方法的分析框架比较

其中, 最为深刻的是“因果过程跟踪方法”章节。为了回答现象 Y 如何发生, 本书作者首先提醒, 研究者需要具有不同于“共变性分析方法”以统计和集合思维为基础的组性思维 (Configurational thinking)。相对于“共变性”研究关注单个变量的作用, 因果过程跟踪方法对于结果解释有三个基本假设: 原因组合性 (combination of causal factors)、殊途同归性 (equifinality) 和因果异质性 (heterogeneity)。在因果推论的单一过程中, 又表现为原因多元化、时序性、以及对于经验观察的重视。而经验信息的实证基础则体现在三个部分: 勾勒案例整体信息的综合故事线 (storylines)、凸显整个故事线关键节点和组成部分的确凿证据 (smoking-guns), 以及反映行为人认知和动机的主观交待 (confessions)。进一步, 作者提出, 对三种类型所需经验信息进行数据分析必须立足于过程跟踪的逻辑基础: 因果链 (causal chains) 和过程动力 (process dynamics)。即发现因果链中的因果必要充分条件, 以及因果动力循环过程中的社会反馈机制。整体来看, 研究者对因果过程的深度挖掘要求案例选取“在质不在量”, 即案例数量不一定多, 但单个案例的信息尽量囊括经验信息的三个类型范围。最终, 不论是基于因果条件集合还是因果机制集合的研究发现都不能很好地满足传统案例研究对于超越个案的推广标准。因此, 本书作者再次强调因果过程跟踪方法所具有的特殊理论价值和目标导向。

全书最后一部分探讨在定性案例研究内部三种方法之间，以及小、中、大样本研究之间互相融合的可能性和路径。为了增强案例研究方法的解释力度，作者展示了定性案例研究内部如何利用“因果过程跟踪方法”补充“共变性分析方法”的不足，以及如何让“因果过程跟踪方法”研究结论成为“一致性分析方法”研究的组成部分。同时，如何与大样本的定量研究和中等样本的定性比较研究相结合是本书一大亮点。作者对比了定性案例研究分别在开展大样本的统计研究或者中等样本的定性比较分析之前或之后所发挥的不同作用，列出了相互支持的技术条件。



通读此书，笔者认为以下几点是两位作者对于定性案例研究方法的亮点和贡献：

理论系统性强

本书最大的贡献之一是将以往丰富复杂的案例研究方法的理论研究做了系统梳理，将不同类型的案例研究方法放在一定的框架下来展示。这样的取向既符合了目前学术对于案例研究方法研究的发展趋势，在实际研究和方法论话语方面也更胜一筹。同时，对于定性研究方法学者一直困惑于理论的繁杂程度来讲，无疑也是最大的帮助。



逻辑结构合理

本书融合了迄今为止关于定性案例研究的不同流派，基于认识论的“中层理论”建立了一个新的，且有说服力的定性案例研究方法的分类，体现了小样本案例研究方法不同类型之间的包容性和差异性。在目前大多数学术成果对于过程跟踪研究和个案研究还停留在描述性阶段的背景下，作者大胆地并详细地将因果过程跟踪研究和个案研究纳入小样本研究中的严谨因果推论框架内。

技术路径清晰

如同书名所示，本书以研究设计为要义，为三种案例研究方法的实践操作做了详细阐述。因此，本书摆脱了很多定性案例研究方法论著作所具有的普遍缺陷，即沉迷于抽象方法论概念和认识论层面的因果推理。并且，三个案例方法章节的行文都是依据案例研究实践顺序展开。开始于研究问题，结束于结论推广展示。同时，本书也注重基本概念和术语的解释。除了在总章中对基本概念做界定外，在每一种方法涉及到的专用术语也做了详细解释。

概念包容性高

本书创新性地打破定性案例研究的思维桎梏。理论基础既贯通了案例研究内部的联系，同时将小样本案例研究在同一思维框架下与中等样本和大样本案例研究相关联。因此，本书真正做到了小样本、中等样本以及大样本不同层面的案例研究方法之间的对立融合，使读者对于案例研究方法的认识更为全面和清晰。

案例展示丰富

本书在解释研究设计过程的关键步骤一直使用案例来阐释说明。两位作者都是同时跨越政治学和公共管理两个领域的学者，因此书中很多以两个领域的经典案例展示来以此支持理论讲解部分。例如，书中运用斯考切波(Skocpol)关于国家与社会革命的研究来说明革命发生过程中的因果链和关键节点。作者辨析出四类因果集合作为具有时序特点的因果链和37个关键节点，以及因果条件组合的关系。另外，哈瓦兰德教授的博士论文运用“共变性分析方法”和“因果过程跟踪方法”相结合形式探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成员国政策多样性”的问题，在阅读过程中更能感受到书中作者现身说法的清晰思维。

总的来讲，定性案例研究对于研究者的理论功底和研究经验极为看重，特别体现在理论建构、案例选取以及数据收集和分析几个方面。笔者作为青年学者显然还不足以完整把握整个案例研究方法甚至定性研究方法的方方面面，理解视野极为有限。尽管如此，对于像笔者一样对定性案例研究方法感兴趣的学者，这本书是一本很好的入门教程。

大学学习的“练级”之路



（图为被采访者 梁昕老师）

记者：梁老师您好！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您来访谈。我们知道您有着丰富的科研与工作经历，并且参与和负责多个课题，在国际知名期刊发表数篇论文，您的才华和高效让我们敬佩。您在本科和硕士阶段修读信息科学，在博士阶段修读了建设与房地产系，基于您丰富的跨专业学习经验，我们想请您跟大家分享一下您对大学学习的心得和体会。

梁老师：大学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人生非常重要的阶段，许多方面会影响人的一生，如知识的积累、三观的形成、心理的成长以及社会关系的初建。而大学之所以称为“大学”，是因为其首要的目的是治学，每位学生经历了大学的阶段，在学习习惯、学习方法、学习能力等方面都会有质的飞跃。而飞跃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跨越不同的阶段，而每个阶



段的跨越都伴随着重重困难与阵痛。这很像玄幻小说或游戏中“练级”之路。能克服重重困难，练级提升，才能在大学生治学之路上破茧成蝶，飞升上仙。

记者：那梁老师觉得大学的“练级”之路有哪几个阶段呢？

梁老师：我觉得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被动灌输知识。刚入大学的时候，大部分同学都保持了高中的学习习惯。所有的知识是被老师统一灌输的，不管是课文、语法、公式还是解题思路，所有内容老师上课会讲给大家，而大家需要做的是不断加深记忆和反复练习。这一学习阶段的特点是知识的一致性，即大家学习的内容非常一致，这样才能进行统一和标准化的考核。因为老师会把统一的内容，按照固定的思路教给大家，甚至知识点（考点）都一一梳理清楚，这种被动的学习省去了真实学习中所需的大部分过程，例如对知识内容的选择，对知识体系的梳理，对知识真实性的质疑等。

第二阶段，主动探索知识。从大一开始，学习会从被动灌输知识的阶段逐渐过渡到主动探索知识的阶段。这个阶段老师统一的讲授占比会不断减小，同时学生个人的主动学习的占比会不断增加。中国有句古话叫“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就很适用于这个阶段的学习特征。老师在这个阶段会逐渐放手，减少知识性的传授，而更侧重于知识体系结构、研究方法、研究问题的讲解和启发。而学生在老师的指引下更多开启主动探索知识的道路。这个阶段是学习过程中很重要的阶段，每个人的知识图谱、知识边界拉开差距主要产生于这个阶段。比如有些同学更偏爱经济学，他会主动拓展自己经济学领域的知识。而有的同学则更偏爱社会学，会自主增加许多社会学的知识。所以大学奠定了每个人不同的知识体系和结构，虽然大学之后还是会不断地学习，但大多是基于这个知识体系的扩展，很难重新建立全新的体系。

第三阶段，创新开拓知识。一般在本科阶段会完成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过度，而研究生阶段则主要完成的是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的过度。当然，很多本科同学也会参与PRP、大创、挑战杯一类的项目，提前开始挑战第三阶段。在第三阶段，继续学习和探索知识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开拓新的知识，也就是我们在研究中很重要的创新。如果说之前的学习主要是输入的过程，在第三阶段则主要是输出的过程。通过对实际问题的观察和提炼，发现关键的科学问题，在某一个领域中做到创新和突破。这一阶段的提升离不开前两个阶段的积累，包括理论、研究方法、操作技巧等。这个阶段最大的困难在于在前面引领的老师也没有了，因

为你要走的一定是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所以只能靠自己来探索和突破。导师会在你的道路上给与建议，但是路还是要必须一个人来探索。

能够不断修炼，跨越三个阶段并非易事，毫不夸张的说每一步成长都伴随着困难、迷茫和痛苦。比如在第三阶段，因为是在全新的领域中探索，寻找研究问题，寻找案例数据、寻找理论和方法，很多时候会觉得自己像是在黑暗的房间寻找宝物，但周围一片漆黑，只能通过一些线索和经验来推断、尝试。也许运气好很快就发现了宝物，但也许运气不好很久都找不到，甚至看不到希望。这时候许多人会产生怀疑，怀疑自己的能力，怀疑导师的方向，甚至怀疑自己人生选择是不是正确，然后产生许多焦虑和负面的情绪。这种情况在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中并不鲜见。

记者：谢谢梁老师给我们分享的大学“练级”治学的三个阶段，正如您所言，在学习路上修炼自己并非易事，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可能会在不同的阶段遇到一些困难或者迷茫，那么想请问老师有没有一些建议，可以帮助我们应对可能的困难从而突破自己？

梁老师：首先，勇于走出自己的舒适区。经过一定时间的积累，每个人都会形成自己的学习习惯，也就是自己的舒适区。比如每一位同学都是高中的佼佼者，一定都有非常好的学习习惯和方法。然而这些方法适用于第一阶段的学习，在第二阶段的只是探索中就可能完全不适用。因此，很多同学刚入大学时候会觉得很迷茫，我到底应该学哪些知识？看哪些书？看这些书真的对我有用吗？这个时候，应该意识到自己的学习阶段要开始调整，主动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建立新的学习习惯和方法。

第二，敢于突破自己的边界。知识有体系，但并没有边界。听到过很多同学人为地把自己划定在某个界限内，不敢逾越和探索。比如，有同学说我没有经济学基础，这些领域我学不了；有同学说我是文科生，数学基础差，肯定做不了定量研究；有同学说编程做数据分析，这些不是计算机专业做的吗，为什么我要学这些。有很多理由可以给自己划定界限，把自己局限起来。而想不断突破，不断升级，就要忘记这些边界，努力的探索新的知识领域。也许你会因为学习了经济学的理论对社会学问题有了全新的认识，也许你会通过定量研究得到全新的结论，也许因为学习了编程，对社会学很多问题的分析上升到了新的层次。所以永远不要给自己划定界限，勇敢的突破自己的知识边界。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相信自己，独立思考。其实从第一阶段不断升级到第三阶段的过程就是不断建立独立思考能力的过程。从开始不需要独立思考，到老师引导下的思考，到



最后完全离开老师，自己进行独立思考，这个过程一定伴随着失去依赖的痛苦和充满质疑的迷茫。这个过程中要相信自己，可以逐步学会独立的思考问题。特别是在受到质疑和迷茫的时候，要相信和坚持，勇敢继续往前走，之后会觉得海阔天空，享受独立思考带给自己的成长和快乐。

记者：非常感谢梁老师的分享，您对大学治学道路的分析和一些建议让我们对自己的“练级”之路有了更加明晰的认识，也获得了一些中肯的建议。最后，请老师分享一句话给我们吧，谢谢老师。

梁老师：以上的一些想法基于个人的经验，也许有许多不当之处。学无止境，我也希望和 大家多多探讨。希望每位同学都在大学中有学有所得，不断突破，成长为更好的自己。



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动态博弈及

对我国金融监管改革的启示

吕守军^{1, 2} 徐海霞^{2, 3}

(1.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 2.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3. 上海建桥学院商学院, 上海 200030)

摘要: 金融创新与金融稳定的两难、信息不对称以及金融脆弱性带来的负外部性等的存在, 证实了以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金融监管治理的重要性。本文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对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行为策略的调整过程进行动态分析, 并结合互联网金融 P2P 网贷行业的创新与监管动态博弈为例证, 探讨遵循我国金融监管目标的前提下, 如何运用激励性监管的方法对金融监管体系进行规范和设计, 适时转变监管理念, 提高监管有效性, 注重事前防范机制, 以实现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共赢发展。

关键词: 金融创新 金融监管 动态博弈 激励性监管

作者简介: 吕守军,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 200030; 徐海霞, 上海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上海建桥学院商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5BJL003)、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2014BJL002)、上海交通大学自由探索项目 (XE1604);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社科学术领域城市治理专项课题 (16JCCS16); 上海交通大学 SMC-晨星优秀青年教师科研项目 (A 类计划)

中图分类号: F832

文献标识码: A

一、引言

金融稳定一直是各国经济发展中的热点和焦点问题。中国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强金融监管, 推进金融创新, 维护金融稳定的目标; “十三五”规划纲要首次提出“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理念。根据这种发展目标和改革理念, 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应相互促进, 两者实现共赢发展才是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选择。但市场经济国家实践中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协调往往不尽人意, 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通常呈现出对立统一的关系, 陷入一种两难的境地。正如 Tirole (2008) 指出的, 2007 年发端于美国次贷问题的全球性金融危机, 虽然“非理性繁荣”、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全球宏观经济失衡等都是危机的重要原因, 但缺乏监管或无效监管而产生的系统性风险及带来的金融动荡正是这场危机的罪恶之源。再如, 中国正处于多层次金融体系的构建时期,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是一项划时代的金融创新, 对传统垄断性金融生产与服务方式产生了极强的冲击与颠覆, 然而其“鲶鱼效应”带来金融创新巨大动力的同时, 也呈现出“野蛮生长”的态势, 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规模效应带来的行业垄断倾向、金融脆弱性引发的负外部性等乱象在现实中频现¹, 社会公正、安全原则的实现进程步履维艰, 这迫切地需要我们合理确定互联网金融的创新与监管之间的度, 在鼓励金融创新与防范金融风险之间寻求平衡。

¹ 见王俊豪主编. 管制经济学原理[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年9月第2版。



20世纪80年代,“完全理性”假设下的传统规制经济学停滞不前的情形下,Laffront与Tirole运用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和机制设计等工具将激励问题内生地引入到规制分析中,在规制者与被规制企业面临的信息结构、约束条件和可行工具的条件下分析双方的最优行为决策,由此形成了新规制经济学¹。早在20世纪80年代Tirole就已经将新规制经济学的思想运用到金融领域,之后他在金融危机的微观机制、流动性供给、宏观审慎监管等方面,陆续发表了多篇影响深远的研究成果。市场经济中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之间关系的发展和演进一直备受关注:20世纪70年代“规避监管说”认为两者是相互对立的²,金融创新对金融体系的稳健性造成冲击时,监管机构的严厉管制将会带来金融创新的激励下降,如“惜贷”问题;80年代放松规制的浪潮下两者从矛盾对立走向互补促进,金融创新的发展与金融监管的改革遵循一种“监管—创新—再监管—再创新”的发展样式相互促进、共同发展;90年代激励性规制理论有机地融合了规制与竞争两方面的优点,研究重心由为什么规制转到怎样规制,激励性金融规制将激励理论融入到金融监管问题中,对金融机构与监管机构的行为进行最优机制设计,内生地解决了监管中出现的问题。

随着政府规制的目标不断向社会公共利益的回归,单纯从金融监管角度对金融创新业态进行规制是不可持续的,政府金融活动应从传统金融监管向激励性监管过渡³。鉴于此,本文通过回顾国内外相关前沿研究成果并对已有文献进行评述以找出以往分析的不足,拟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对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的学习试错及策略调整过程进行动态分析,据此对宏观金融规制下金融监管的目标、激励机制进行合理设计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文献评述

20世纪80年代Tirole就已将新规制经济学运用到金融领域的分析中,从Tirole激励性金融规制理论的基本思想与发展逻辑中,我们不难得到金融规制体系的必要性和主要规制工具。早期传统审慎监管的侧重点在于微观方面,Dewatripont与Tirole(1994)根据资本结构理论得出存款人对其银行债权的管理缺乏激励,由此提出了“代表性假说”并阐明审慎监管的焦点在于银行清偿能力。Holmstrom与Tirole(1997)构建金融中介资本模型,提出了对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应具有逆周期性。之后,他将上述研究应用到宏观领域,Dewatripont与Tirole(2012)指出巴塞尔协议I和II有关资本充足率的规定具有顺周期性,这无法应对宏观经济冲击的影响,由此提出了逆周期的金融规制方法,较好地规避了不利的宏观冲击,如巴塞尔协议III中的逆周期资本缓冲等规制方式。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系统性风险的监控、流动性偏好冲击、金融监管治理的质量、宏观经济政策等是影响金融体系稳定的主要外部因素(Rochet&Tirole, 1996; Allen&Gale, 1998; Das&Quintyn, 2004; Stein, 2012)。从金融机构自身来看,内部控制制度(Aghion&Bolton, 1992)、融资方式及结构(Holmstrom&Tirole, 1997)、代理人的薪酬机制(Benabou&Tirole, 2008)是保护金融消费者利益的关键因素。近年来,为了应对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和金融创新程度的提高,Buckley(2014)对G20全球金融规制的绩效研究表明,全球金融危机可以视为金融产品创新的直接结果,然而G20的改革并没有真正体现“金融市场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的内涵,进一步完善的方向在于改革银行家的薪酬、消除信用评级中的利益冲突、开证金融交易税等方面。Hermes与Meesters(2015)对发达和新兴经济体的金融改革如何影响银行效率的实证研究表明,金融改革措施可分为金融自由化、金融规制与监管质量两种类型,结果显示金融

¹ 1993年,Laffront和Tirole完成专著《政府采购与规制中的激励理论》,标志着新规制经济学的诞生。Tirole作为新规制经济学的创始人,由于对市场垄断与激励性规制的贡献荣获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与他一起开创“新规制经济学”的Laffront若不是英年早逝,也将会获此殊荣,这里我们深切缅怀Laffront教授。

² 见Kane E. J., Accelerating Inflati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Decreasing Effectiveness of Banking Regulation [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1981, 36 (2): 355—367.

³ 见王国跃、杜征征:《金融监管治理进展研究》,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8年第9期。

自由化政策显著提高了银行效率，而金融规制与监管创新可以增强银行风险管理体系的透明度和责任性，为此，政府和金融机构应该致力于提高资本充足率标准、完善信息披露及增强应对流动性风险的能力。

国内关于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晚，其中郑丽（2006）和彭红枫（2016）借助动态博弈方法对金融监管的机制设计进行研究。郑丽构建了金融机构与监管当局的动态博弈模型，用以论证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双方行为如何从一个均衡达到另一个均衡，研究表明金融创新的动机不仅是盈利，同时也是金融监管滞后的结果，而金融创新会直接带来金融风险的变化，因此金融监管的关键是风险控制。彭红枫等运用演化博弈理论来分析监管部门与金融机构的策略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由此设计出合理的激励机制来鼓励金融创新、完善金融监管，应当建立违规创新的“负面清单”、加大监管的处罚力度、坚持激励性监管理念等。近年来，还有一部分学者通过建立指标体系对金融创新背景下金融监管的有效性进行评价。赵峰等（2014）构建了金融监管治理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共4个一级指标和30个二级指标，并以中国银行业为例展开问卷调查及其有效性评价，结果发现2012年中国银监会的监管治理水平相比2011年有所提高，除监管责任性外其他三个维度的监管治理水平都有所提高，这也为评价国家金融监管智力水平提供依据。刘玉强（2012）运用多属性模糊评价法构建了地方政府金融监管绩效评估指标体系，选取相关省市样本进行实证测评，结果发现样本监管机构的外部监管治理整体水平较低，金融监管独立性不强，透明度和操守性均有待提高。

国内已有研究对金融规制体系进行设计时，单纯依靠金融外部监管对金融创新业态进行规制是不全面、不系统的，多忽略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和社会公众力量的影响。虽已有学者开始关注信息披露做法、风险防范措施、媒体的监督等对整个金融规制体系的影响，但并未结合金融创新业态进行机制设计的具体措施研究。本文试图克服已有研究的缺陷，首先基于有限理性的假设建立金融创新机构与监管部门之间行为策略的动态博弈模型，初步运用演化博弈的方法探究两个主体循环博弈的行为规律与均衡状态；然后为了进一步验证上述分析中两者关系的实践结果，将采用当前互联网金融创新中的P2P网络借贷为例证，对我国P2P网络借贷的发展现状、监管政策的出台与调整进行动态博弈实证分析，从而对互联网金融产品的有效监管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议。

三、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动态博弈分析

金融创新的发展原因既有自身的内在需求，又有环境的外在供给（郑丽，2006），持有后一种态度的人通常认为引发金融创新的关键原因在于政府部门的金融监管这一外部约束。Kane（1981）在“规避监管说”中提到，政府对金融行业的监管法规实质上是一种对金融机构的隐含税收，它以潜在经营成本的形式降低了金融机构的赢利能力，当相关法规约束达到足够大时，这些金融机构为规避金融监管就会“发掘漏洞”而创造出新的金融交易工具以增加利润。而上世纪90年代放松管制的浪潮下，金融创新层出不穷，许多学者认为监管与创新可以相互促进。如Bhattacharyya等（2000）提出，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发展表现为相辅相成的关系，这种“监管—创新—再监管—再创新”的演进模式有利于金融机构的不断创新与金融监管的不断调整¹。

如上所述，在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动态博弈下金融行业实现了进一步发展。在此过程中金融监管应当把握合理的限度，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合理创新，提升金融监管效率，以实现金融行业的持续稳定发展。下面运用演化博弈论来分析金融机构与监管机构的相互作用过程。

1、基本假定

¹ 见Bhattacharyya S. and Nanda V., Client Discretion, Switching Costs and Financial Innovation[J].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00, 13(4):1101—1127.



(1) 参与主体。金融创新机构（如商业银行、证券公司、P2P 网贷平台等）和金融监管机构（如银监会、证监会等）满足有限理性且信息是非对称的，双方均为风险中性，两者的相互作用具有随机性。

(2) 策略集合。监管机构有两种策略选择：加强监管和维持原有监管，最初采用这两种监管策略的监管机构比例分别为 p 和 $(1-p)$ 。金融机构的创新行为策略有两种：合规创新和违规创新，博弈之初这两类金融创新机构的比例为 q 和 $(1-q)$ 。

(3) 损益。假定监管机构加强监管产生的额外成本为 C ，维持原有监管的额外成本为 0 ，但当金融机构因违规创新而发生系统性风险，监管机构遭受的处罚为 F 。另外，金融机构合规创新的收益为 μ ，违规创新获得的额外收益为 μ_1 ，而金融机构违规创新遭受的处罚为 μ_2 。

这样，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之间形成的创新监管非合作重复博弈的支付矩阵如表 1 所示。

表 1 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演化博弈模型

		金融机构	
		合规创新 (q)	违规创新 ($1-q$)
监管机构	加强监管 (p)	$(-C, \mu)$	$(-C, \mu + \mu_1 - \mu_2)$
	维持原有监管 ($1-p$)	$(0, \mu)$	$(-F, \mu + \mu_1)$

2、演化博弈的稳定点分析

监管机构采取加强监管的预期收益为：

$$\mu_p = q(-C) + (1-q)(-C) = -C \quad (1)$$

监管机构采取维持原有监管的预期收益为：

$$\mu_{1-p} = (1-q)(-F) + q \times 0 = F(q-1) \quad (2)$$

金融监管机构的平均预期收益为：

$$\bar{\mu} = \mu_p p + \mu_{1-p} (1-p) = -Cp + F(q-1)(1-p) \quad (3)$$

这样，监管机构的复制动态过程为：

$$\frac{dp}{dt} = p(\mu_p - \bar{\mu}) = p[-C + Cp + F(1-q)(1-p)] = p(1-p)(F - Fq - C) \quad (4)$$

同理可以得到，金融机构进行合规创新的预期收益为：

$$\mu_q = p\mu + (1-p)\mu = \mu \quad (5)$$

金融机构进行违规创新的预期收益为：

$$\mu_{1-q} = p(\mu + \mu_1 - \mu_2) + (1-p)(\mu + \mu_1) = \mu + \mu_1 - \mu_2 p \quad (6)$$

金融创新机构的平均预期收益为：

$$\bar{\mu} = \mu_q q + \mu_{1-q} (1-q) = \mu q + (\mu + \mu_1 - \mu_2 p)(1-q) = \mu + (\mu_1 - \mu_2 p)(1-q) \quad (7)$$

这样，金融创新机构的复制动态过程为：

$$\frac{dq}{dt} = q(\mu_q - \bar{\mu}) = q[\mu - \mu - (\mu_1 - \mu_2 p)(1-q)] = q(1-q)(\mu_2 p - \mu_1) \quad (8)$$

根据式 (4) 和式 (8)，令 $\frac{dp}{dt} = 0$ ， $\frac{dq}{dt} = 0$ ，组合求解后可在平面

$M = \{(p, q) | 0 \leq p \leq 1, 0 \leq q \leq 1\}$ 上得到演化博弈的 5 个局部均衡点¹，分别为 $O(0, 0)$ 、 $A(0, 1)$ 、

¹ 根据 Friedman (1991) 提出的方法，上述均衡点的稳定性可利用该演化系统的雅可比矩阵的局部分析法得到。见 Friedman D., Evolutionary games in economics[J]. Econometrica, 1991, 59:637—666.

$B(1,0)$ 、 $C(1,1)$ 、 $D(x_D, y_D)$ ，其中 $x_D = \frac{\mu_1}{\mu_2}$ ， $y_D = 1 - \frac{C}{F}$ 。当 $0 < x_D, y_D < 1$ 时 D 存在，则雅可比矩阵为：

$$J = \begin{bmatrix} (1-2p)(F-C-Fq) & -Fp(1-p) \\ -q(1-q)\mu_2 & (1-2p)(\mu_1 - p\mu_2) \end{bmatrix} \quad (9)$$

博弈双方形成具有稳定性的最终策略叫做演化稳定策略（ESS），是否稳定可以通过复制动态方程一阶偏导的正负性进行判断，当 $(\frac{dp}{dt})' < 0$ 且 $(\frac{dq}{dt})' < 0$ 时，局部均衡点可以成为演化稳定策略。在 5 个局部均衡点中，A 点和 B 点是稳定的，是演化稳定策略（ESS），而 O 点和 C 点为不稳定点，D 点为鞍点。

图 1 是该演化系统的相位图，描述了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演化博弈的动态过程。由两个不稳定的均衡点 O 点和 C 点及鞍点 D 的连线是系统收敛于不同状态的临界线，即在 ODC 线的左上方系统将收敛于 B 点，即监管机构选择加强监管，金融机构选择违规创新；在 ODC 线的右下方系统将收敛于 A 点，即监管机构选择维持原有监管，金融机构选择合规创新。由于系统的演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一种共存的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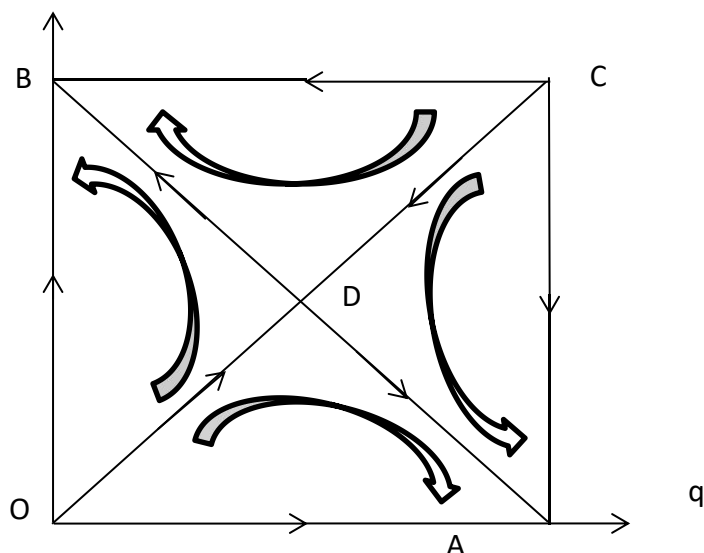


图 1 系统的动态演化相图

3、参数分析

若博弈产生的初始状态随机位于 $M = \{(p, q) | 0 \leq p \leq 1, 0 \leq q \leq 1\}$ 上，则博弈双方支付函数的某些参数的初始值及其变化，会导致演化系统向不同的均衡点收敛。对于 $p = \frac{\mu_1}{\mu_2}$ ， $q = 1 - \frac{C}{F}$ ，我们可知影响系统演化的参数有：违规创新获得的额外收益 μ_1 、金融机构违规创新遭受的处罚 μ_2 、加强监管的额外成本与产生系统性风险使得监管机构遭受的处罚之比 $\frac{C}{F}$ 。

(1) 违规创新获得的额外收益

从相图中可以发现，当金融机构违规创新获得的额外收益 μ_1 变大时，D 点的 p 坐标变大，q 坐标不变，使得 OBC 部分的面积变小。此时系统收敛于均衡点 B 的概率增加，处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会选择违规金融创新策略。

(2) 金融机构违规创新遭受的处罚

系统演化博弈的过程中，违规创新的处罚力度 μ_2 越小，则 D 点的 p 坐标会变大，q 坐标保



持不变，使得 OBC 部分的面积变小。此时演化系统收敛于 B 点的概率就越大。由于相应的处罚机制的缺失及利益的诱惑，金融机构会倾向于采取违规创新策略。

(3) 加强监管的额外成本与产生系统性风险使得监管机构遭受的处罚之比

$\frac{C}{F}$ 描述了监管机构在监管决策过程中的损益状况。从相图分析可知，当其他参数一定时，

若 C 变大或 F 变小时，D 点的 p 坐标不变，q 坐标变小，使得 OAC 部分的面积变小，系统收敛于 A 点的概率就越大，监管机构缺乏加强监管的激励而选择维持原有监管的策略；反之，监管机构处于规避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危机损失，将会选择加强监管策略。

前述分析表明，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是一种相互影响并相互促进的动态协调关系，两者在博弈过程中基于不断的认知和学习而产生反复的策略调整，由此形成演化稳定策略。这种系统演化的长期均衡结果取决于该博弈的支付矩阵、博弈双方支付函数的某些参数的初始值及其变化。

四、互联网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动态博弈分析——以 P2P 网络借贷为例

近年来，互联网金融发展迅猛，谢平等（2012）指出互联网金融模式是既不同于商业银行间接融资、也不同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第三种金融融资模式，它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移动支付、社交网络、搜索引擎和云计算，是一次划时代的金融创新。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经历了网上银行、第三方支付、网络借贷、众筹平台等模式，正在融通资金、风险定价和期限匹配等方面引致出更加大众化、民主化、效率化的金融交易。

下面将以新金融模式 P2P 网贷行业的人人贷为例来进行实证研究，对当前这种新型互联网金融行业的有效监管及未来发展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期降低 P2P 网贷业务的创新风险，促进 P2P 网贷创新与监管的平衡发展。

人人贷成立于 2010 年 5 月，系人人友信集团旗下公司，注册资金 1 亿元，是唯一连续 4 季度蝉联中国网贷评级体系 AAA 级（最高级）的民营网贷企业。人人贷的业务覆盖全国 30 多个省并超过 200 万用户，截止 2016 年底平台累计交易额达 243 亿元，2016 年共完成 133687 笔交易，实现成交金额约 111.9 亿元，同比增长 84.7%，撮合交易累计达 2724 万人次。从业务运行模式看，人人贷是我国担保抵押模式的代表，采用线上投标和线下抵押相结合的模式，它选择的合作担保机构资金实力雄厚、经营期限长且信用审核操作熟练，有效地降低了投资者的风险，保障了投资者的本息。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对融通资金的需求不断提高，P2P 网贷的迅速发展为许多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了便利，同时也获取了巨额收益。根据网贷之家公开的统计数据，我们来看国内 P2P 网贷行业的发展结构。传统金融机构信贷严格的现实诱发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近年来 P2P 网贷迅速发展促使民间信贷不断由线下转为线上，网贷行业的平台数量日益激增，相应的平台累计交易额数倍攀升，多家 P2P 网贷平台推出了各种更具体、易操作的投资理财计划，以此刺激用户的投资，然而这些金融创新活动所隐藏的问题日益凸显。自 2007 年 6 月首家 P2P 网贷平台拍拍贷成立后，互联网 P2P 网贷行业迅速发展。图 1 显示，2012 年和 2013 年的年增长率都在 200% 以上，2014 年和 2015 年则以 96.9% 和 64.8% 的比例增长。截止 2016 年底，国内 P2P 网贷行业正常运营平台数量达到 2448 家，比上年同期减少了 985 家，这充分说明了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的背景下网贷行业的发展正在从“野蛮阶段”转向“规范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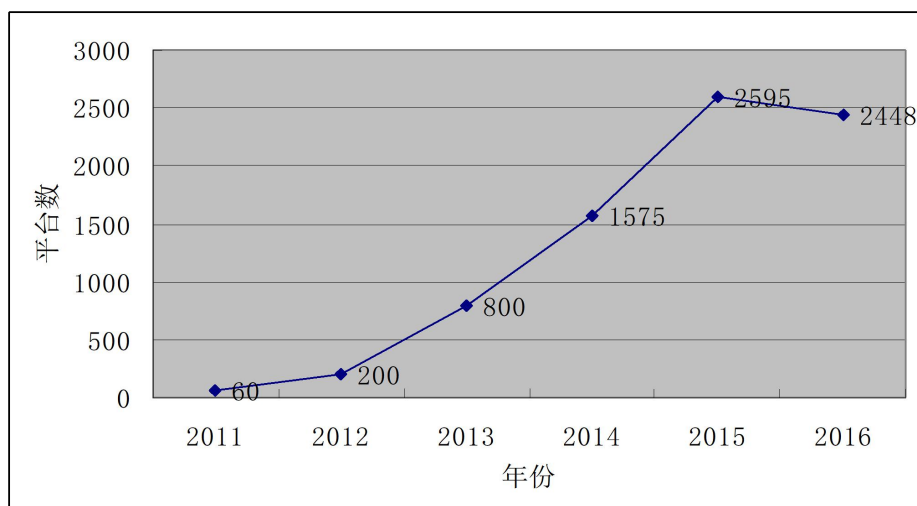


图 2 2011—2016 年我国 P2P 网贷正常运营平台数

数据来源：经网贷之家相关数据整理而得。

由于我国 P2P 网贷业务的发展尚处于早期阶段，网贷平台的质量参差不齐且缺乏相应的监督管理，故 P2P 网贷的创新风险加大而导致问题平台数增加。如图 2 所示，2015 年中国人民银行颁布《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以后，相关部门依法对 P2P 网贷平台进行监管和整顿，当年新增问题平台数量 896 家；随着平台总数和问题平台数的不断增加，2016 年银监会等四部委联合发布《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被业内视为“史上最严监管”，其中“负面清单”列出了 13 类不得从事的行为。新办法实行以后，截止 2016 年底新增问题平台共 938 家，网贷平台的规模趋于减少且问题平台数增加，这说明了国家对于 P2P 网贷行业发展的相关规范和监管政策的效果很显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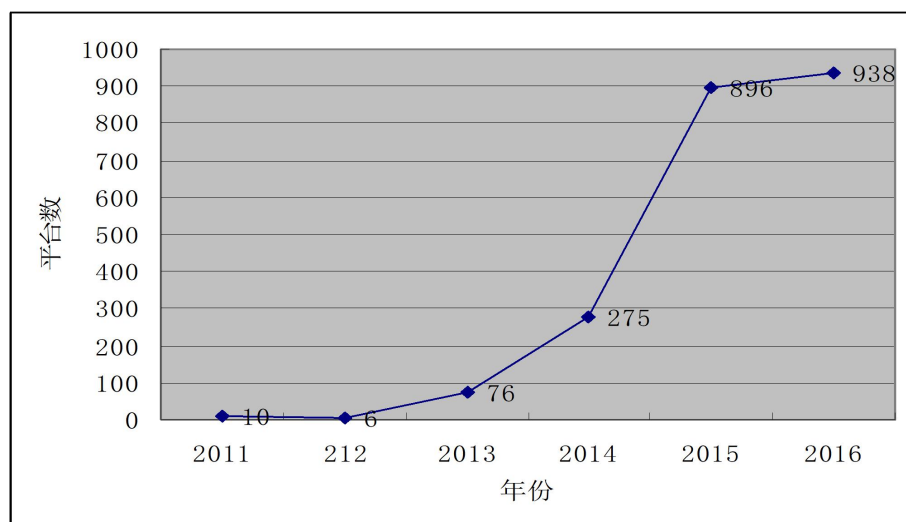


图 3 2011—2016 年我国 P2P 网贷新增问题平台数

数据来源：经网贷之家相关数据整理而得。

为了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国内 P2P 网贷行业的发展不断趋于规范和完善，在此背景下为了更好地促进网贷行业的创新和发展，就人人贷这种运营模式的外部环境和自身运营来说还存在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如上述针对 P2P 网贷的两项法规，相关细节仍有待完善，网贷新规的实施效果仍需要后续的检验；人人贷的信用审核采用线上操作，由网贷平台统一审核，而出资者无法判断借款人信息的实际情况，这种方式无法有效控制违约率；人人贷的风险补偿机制采用备用金计划，这种风险控制方式的不确定性很大，一旦发生违约风险超出



风险备用金的情况，将不仅导致网贷公司发生大量损失，还将波及出资者。基于此，对于这种新型的金融创新应当进行合理有效的监管，以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及更好地保护投资者的权益。主要包括：建立 P2P 网贷平台的信用评级标准、信息用信息共享机制和保证金制度。

上述 P2P 网贷金融创新与监管的动态发展过程，从实践角度进一步验证了金融机构采取违规创新的比例与违规创新的处罚力度 μ_2 成反比，与监管机构的监管成本成正比；而监管机构加强监管的概率与金融机构违规创新获得的额外收益 μ_1 成正比，与对金融机构违规创新获得的罚款 μ_2 成反比。此时，当 μ_1 越大时，金融创新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会加大，整体社会福利会降低，而为了保持金融市场的合理有效发展则监管机构会加强监管，使得金融违规创新的超额收益减小；当 μ_2 越大时，监管机构对违规创新的处罚力度增强，这将会使得监管机构监管热情下降而疏于监管。很显然，监管机构的目标是降低系统性风险，保持金融行业稳定发展；而 P2P 网贷平台的目标是增加平台竞争力，扩大企业利润率。由此，监管机构与 P2P 网贷平台的行为策略在上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下，经过反复的动态调整后博弈双方会产生某种均衡策略，即监管机构以某种力度进行监管，而 P2P 网贷平台以某种概率选择创新并接受监管。

五、结论与建议

近年来，金融监管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加速的金融创新。金融创新一方面可以更好地服务客户，另一方面出现的监管套利并不能增加社会剩余，如发起人通过保持高级别资产来放大表外资产规模，使之适应较低的资本要求及相应的流动性支持，这种监管套利行为甚至扩大至整个行业。因此，相关部门应及时调整金融监管体系，尽量避免出台的监管措施总是比市场发展滞后一步。

然而，金融监管需要达到什么目标呢？这一问题的明确至关重要。监管的目的不外两个方面：一是保护小储户、保单持有人、养老基金投资者的利益，以防止金融机构的违约行为而使其遭受损失。二是遏制多米诺效应的发生，即防止系统性风险，监管部门应当旨在避免一家金融机构的破产而对其他金融机构产生多米诺效应。如上所述，当违规创新的额外收益越高，处罚尺度越低，则经过长期动态调整以后有限理性的金融机构会趋于“违规创新”策略；当监管机构的监管成本越低，社会正面评价越高，则经过长期演化博弈以后有限理性的监管机构会趋于“加强监管”策略。为了实现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共赢发展，积极引导金融机构的行为策略演化为“合规创新”，需要我们遵循宏观金融规制下金融监管目标的基础上，运用激励性监管的方法对金融监管体系进行规范和设计。

第一，完善各项事前防范机制，培育金融机构进行合规创新。当金融机构出现违规创新时，监管机构除运用事后处罚的形式外，还应当不断完善相关事前防范机制，增强金融机构的自律性来引导其从事合规创新，做好金融风险的早期预警和控制。首先，为了解决信息失灵问题，应建立金融创新行业的信用评级系统。如前述 P2P 网贷行业的额分析中，网贷交易者的信用信息对于整个行业的发展影响重大，而目前网贷公司处于金融消费者的个人信息保护而并未将其纳入银行征信系统。因此，为了建立整个网贷行业的信用数据来源和审核标准，金融监管部门应当加强信用评级系统的建设，这可以有效地降低借贷双方信用信息成本。就人人贷来说，在相对严格的信用认证过程中，通过统一的信用数据库来审核借款方的资料，不仅可以减少信用审核成本，还可以有效地限制资质差的借款方进入市场。其次，为了克服代理失灵问题，应健全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制度。金融机构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会利用复杂的金融创新工具进行过度投机行为，但是出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和防止金融风险，必须加强金融创新的信息透明度。由此，投资者具备充分的信息才可能了解金融创新工具的风险，从而进行合理科学的投资决策，或者成立权威的金融评估机构是一条更加有效的途径。

第二，优化市场约束与外部监管有效结合的金融监管体系。新巴塞尔协议中明确将市场约束作为现代银行监管框架中的第三支柱，在以外部监管为主的监管体系中强化市场约束，直

接反映出投资者对金融机构的要求，由此可以为监管体系注入活力，也有利于金融机构从其内部加强资产管理和风险控制。但是，市场约束的积极作用需要充分完善的金融市场作为基础，随着我国金融市场不断趋于成熟和完善，过度强调外部监管会挫伤金融机构的创新积极性，不利于金融行业的长期发展，而通过引入市场约束机制可以起到一定的激励作用，由此实现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的平衡。

第三，适时转变监管理念，有单一型监管逐步发展为激励性规制。监管机构应当充分识别创新风险，通过法律法规的完善、信用体系的健全、行业准入的提高和行业结构的优化，来降低金融创新的法律风险、信用风险、行为风险和营业风险，将鼓励金融机构合规创新与强制处罚机制相结合。从P2P网贷行业来看，在行业发展的早期，为了实现P2P网贷平台的规范化运作，监管机构应当加大对违规金融创新的惩罚力度以维护金融市场的有序运行；到行业发展趋于成熟后，监管机构可以采用一些优惠政策来鼓励业务创新，如税收优惠、信贷政策等，由此将普惠制金融较好地运用到P2P行业的发展中。

第四，在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与促进金融创新发展之间寻找平衡点，提高监管有效性。金融监管并不在于单纯的“松”或“紧”，而应当保持监管适度，合理使用惩罚手段，不断降低监管成本并提高监管有效性，促进金融行业的长期稳定发展。我们在进行P2P网贷业务创新时，应当合理确定监管机构的监管风险与监管力度。监管机构的行为策略主要取决于金融创新对整个金融体系产生的冲击，是否监管以及如何监管应当考虑到金融创新业务的发展程度，由此不同的监管条件会对金融机构创新业务的发展战略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当创新业务面临不监管状态时，P2P网贷业务应不断创新以推动网贷平台步入成熟，通过设立合理的准入标准以降低信用风险，有效扩大经营规模；当P2P网贷创新业务面临监管时，进入成熟期的P2P网贷应当在监管范围内实现规范发展，建立不同客户的信用评级系统及相应的优惠措施，在合理的风险程度下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

参考文献：

- [1] Dewatripont M. and Tirole J., A Theory of Debt and Equity: Diversity of Securities and Manager-Shareholder Congruence[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4, 109(4) : 1027-54.
- [2] Holmstrom B. and Tirole J.,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Loanable Funds and The Real Sector[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7, CX II (3) : 663-91.
- [3] Dewatripont M. and Tirole J., Macroeconomic Shocks and Banking Regulation[J].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2012, 44(2) : 237-54.
- [4] Rochet J. and Tirole J., Interbank Lending and Systemic Risk[J].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1996, 28(4) : 733-62.
- [5] Allen F. and Gale D., Financial Contagion[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0, 108(14) : 1-33.
- [6] Stein J., Monetary Policy As Financial Stability Regulation[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2, 127 : 57-95.
- [7] Aghion P. and Bolton P., An Incomplete Contracts Approach to Financial Contracting[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92, 59 : 473-94.
- [8] Das U. and Quintyn M., Crisis Prevention and Crisis Management: The Role of Regulatory Governance[J]. IMF Working Paper, No. 163, 2002.
- [9] Bukley R., The G20's Performance in Global Financial[J]. UNSW Law Journal, 2014, 37(1) : 63-93.
- [10] Hermes N. and Meesters A.,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Financial Regulation and Bank Efficiency: a Multi-country Analysis[J]. Applied Economics, 2015, 47(21) : 2154-72.
- [11] 曹东、曹巍、吴俊龙. 互联网时代金融创新与监管的博弈研究[J].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7)。



- [12] 俞林、康灿华、王龙. 互联网金融监管博弈研究: 以 P2P 网贷模式为例[J]. 南开经济研究, 2015 (5)。
- [13] 谢平、邹传伟. 互联网金融模式研究[J]. 金融研究, 2012 (12)。
- [14] 彭红枫、杨柳明、王黎雪. 基于演化博弈的金融创新与激励型监管关系研究[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16 (9)。
- [15] 德瓦特里庞、罗歇、梯若尔著, 欧明刚、张昕译. 制衡银行: 金融监管平衡术[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6 年 7 月。
- [16] 斯蒂文·L·施瓦茨、许多奇. 影子银行监管: 金融规制及其责任失灵[J]. 金融市场研究, 2013 (7)。
- [17] 郑丽. 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动态博弈——兼论对我国金融监管的启示[J]. 财经论丛, 2006 (7)。
- [18] 赵峰、付韶军、杜雯. 中国的金融监管治理有效吗——基于中国银行业的问卷调查[J]. 财贸经济, 2014 (8)。
- [19] 刘玉强. 地方政府金融监管绩效评估体系及实证研究[J]. 财经理论与实践, 2012 (5)。

Dynamic Game between 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Financial Supervision and Some Enlightenment to China

Lyu Shou-jun^{1,2} Xu Haixia^{2,3}

(1.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2. China Institute of Urban Governanc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3. Business School, Shanghai Jiao Qiao University, 200030)

Abstract: The dilemma of 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asymmetric information and the negative externality of financial fragility, all above confirm that the importance of financial regulation to maximize the public interests of our society. This paper dynamically analyses the adjustment process of behavior strategies betwee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regulators with the means of evolutionary game theory. For example, we combines with the dynamic game between innovation and regulation of P2P net loan industry. Thus we can explore how to regulate and design the financial supervision system with incentive regulation. We should change the regulatory philosophy timely, improve regulatory effectiveness and focus on preventive mechanism, in order to achieve a win-win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financial supervision.

Key words: Financial Innovation; Financial Supervision; Dynamic Game; Incentive Supervision

联系方式:

徐海霞

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莘朱路 879 弄 37 号 203 室 邮编: 201100

电话: (0) 15221850970

Email: 395820335@qq.com

“脆弱性”与“抗逆力”核心概念的界定及关系研究

樊博 聂爽

摘要：“脆弱性”和“抗逆力”作为应急管理领域中两个具有隐喻属性的多学科概念，其发展沿革是一个学科集成化和内涵扩展的过程，但长期以来存在定义不清甚至混用的情况。对此，本文立足于交叉学科的视角，基于“原子图谱法”的数据统计指标提炼出客观聚焦心像，基于已有概念演进过程的回溯与考量提取出质性指标，从而在综合集成主客观信息的基础上实现概念内涵与外延的精准勾勒。研究显示，“脆弱性”和“抗逆力”相互独立并交互影响，是一种依据具体情境而变化的动态存在。其中，“脆弱性”强调暴露于特定情境时，由于系统对多重扰动的敏感性而呈现出的一种易受损害的可能性，在人地耦合系统的交互过程中以抵抗不利影响、实现适应性和恢复力的动态过程量为显著表征，是一种随时空演进而动态变化的多重循环属性。而“抗逆力”概念外延比“脆弱性”更为广泛，强调系统能够积极抗御和适应风险灾害的冲击，既包括通过风险因素与保护因素的互动机制发挥自组织作用的内在特质，也包括在动态的应对过程中，通过多样性策略调用冗余资源和启动重构，以快速实现减灾和恢复常态的能力。

关键词：脆弱性；抗逆力；应急管理；概念界定；原子图谱法

1 引言



“脆弱性（Vulnerability）”和“抗逆力（Resilience）”是应急管理领域中的两个核心概念。起初，学术界多聚焦于“脆弱性”开展相关研究，2010年开始，“抗逆力”概念和理念逐渐得到应急管理领域的广泛关注和认可，成为新兴研究热点。当前，“脆弱性”和“抗逆力”在诸多学科领域中都有所研究，但由于不同学科研究视角的差异性，其概念界定和实质内涵始终处于动态演变之中。应急管理作为一门具有交叉性和综合性

特点的新兴学科，经过近年来的发展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其研究内容虽已基本统一，但由于起步较晚，相关核心概念的定义尚未达成共识，关于应急管理学科基础理论和概念的探讨并不多见。总体而言，当前应急管理理论的研究相对滞后于其应用方法和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由于“脆弱性”和“抗逆力”是具有隐喻属性的多学科概念，在应急管理学科中长期存在概念界定不清、内涵难以厘定、概念之间具有诸多重合点等严重问题，其共有属性和特有属性的区分较为混乱，从而导致两者之间的关联性也模糊不清，制约了应急管理学科的研究发展。

所有科学研究都需要以基本语言为载体开展研究，即一系列的概念（Concept）^[1]。一个学科领域的发展离不开扎实的理论支撑，各类研究现象需要用概念范畴予以表达，概念内涵的清晰厘定对于构建理论模型具有关键作用。对重要概念的推敲与界定作为建构理论的基石，对学科体系的发展将起到基础性的支持作用，也有助于为跨学科研究提供积极的借鉴启迪。当前，理论界对“脆弱性”和“抗逆力”概念的界定多采用“站在巨人



肩膀上”简单列举，而后提出自己概念的界定方式，相对缺乏科学的概念界定路线。因此，本文通过整合不同学科对“脆弱性”和“抗逆力”的经典界定，采用原子图谱法对已有概念的心像进行统计学分析。核心概念的界定不仅需要大量的相关理论作为支撑，同时需要将经验相容作为概念构造的前提，因而将在统计指标的基础上提炼与考量既有研究中的质性指标，从而提升概念基础的建构。由此，勾勒出应急管理学科中“脆弱性”和“抗逆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并对两者的关联性进行分析，对于应急管理学科的研究发展具有必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 文献回顾

2.1 “脆弱性”概念的分析与演化

脆弱性这一概念起源于地理科学领域，最初多聚焦于致灾因子的类型、频率、强度及空间分布，脆弱性偏向于定义为损失的可能性。1981年，Timmerman 正式将脆弱性界定为某一系统对灾害事件反向行动的程度，其中这种程度取决于系统的弹性^[4]。20世纪80年代以来，脆弱性研究逐渐成为生态环境领域的前沿热点，侧重描述生态系统面对不利扰动的结果，其中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是指系统面对生态变化时出现的潜在破坏量及所产生的不利影响的程度，另一方面代表着人与环境综合研究的概念集群。在社会科学领域中，脆弱性多强调关注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变化过程，以及社会、制度、权力等人文因素，如在经济学领域脆性被概念化为降低到消费临界值的可能性。1998年，澳大利亚应急管理署（EMA）正式将脆弱性概念引入应急管理领域，提出脆弱性是“社区与环境对危险的易感性和康复力的程度”^[5]。国外学术界对脆弱性的研究起步较早且较为深入，相对而言，国内学术界对脆弱性的关注时间较短。20世纪80年代，我国首次开展的脆弱性研究起源于生态学领域^[4]，90年代后逐步扩展至更广范围的灾害学、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5]。当前，学者们对脆弱性概念有着不同的解读，尤其是对于应急管理这一新兴学科来说，尚未形成较为科学而全面的概念界定。

在脆弱性概念模型的分析与演化方面，Burton 等人最先提出 RH 模型^[6]，强调致灾因子与灾害后果，关注系统受到自然灾害影响的程度，但忽视了系统对灾害结果的放大或缩小作用的具体路径。而后，Watts 等学者从人类生态学、权力理论和政治经济学三个维度构建了脆弱性三角模型，强调权力、政治及经济结构的重要性，但未将自然环境的变化纳入界定范畴^[7]。1996年，Cutter 提出 HOP 模型，将自然系统中的风险因素与社会系统中的恢复力、应对能力等要素相联结，构成了闭合回路，但却忽视了系统外部扰动与变化的影响作用^[8]。而后，Cheung 从脆弱性的生成机理视角出发，建立 PAR 模型，引入了敏感性、资源调用、多元化应对以及恢复性四个关键要素，并关注各构成要素间的关联性^[9]。然而，该模型过分强调个体及社会的决定性作用，忽视了自然与社会系统之间的互动反馈，从而缺乏人地耦合视角下对脆弱性的全面界定。此外，Bohle 认为脆弱性的概念研究多聚集于外部分析，对脆弱性内部的探索不足^[10]。对此，通过对脆弱性内外维度相互作用及辩证关系、资源使用权及冲突和危机理论的研究与探讨，创建了脆弱性概念的钻石模型，强调脆弱性是在自然和社会的交互过程中动态变化的，这一模型有力的推动了脆弱性概念的发展。而后，Turner 等人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构建了 AHV 模型^[11]，以“人类—环境”耦合系统为分析对象，强调扰动的多重性、多尺度性及地方特性，其中包括暴露、敏感性和恢复力，由此构成一个跨维度、多要素、多重循环的闭合回路。

2.2 “抗逆力”概念的分析与演化

抗逆力概念最初源于物理工程学领域，用以描述一种物质或系统变形后恢复到平衡状态的能力。1973年，生态环境学领域专家 Holling 在原有稳定性概念的基础上引入抗逆力概念，以此衡量生态系统适应变化、维系稳定状态的能力，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正式将抗逆力作为学术概念率先提出^[12]。20世纪50年代首先引入至心理学领域，表示个体面对高危环境和困境时体现出来的良好适应

性和抗压性^[13]。此后，抗逆力逐步扩展到组织管理学领域，侧重描述组织范围内的适应和恢复能力。20世纪末，在借鉴其他学科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抗逆力作为衡量灾害系统的一个属性正式应用于应急管理领域，并从传统灾害的应对视角将抗逆力界定为个人、

组织和系统应对突变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能够承受和抵抗外部冲击以及恢复的能力^[14]。总体看来，抗逆力研究多聚焦于生态学和心理学领域，而应急管理领域相关研究多聚焦于社区抗逆力，相关理论探索与实践总结主要来自于国外的社区研究。国内对抗逆力这一重要理论转向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多侧重于心理学领域的微观个体层面，对于应急管理学科视角下的抗逆力研究十分匮乏。

在应急管理领域中，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跨学科地震工程研究中心（MCEER）最早开展对灾害抗逆力概念的研究并提出4R模型，即将鲁棒性、冗余性、充足性和快速性视为抗逆力概念的重要内涵，认为这四个要素适用于任何社会系统之中^[15]。在此基础上，Sherrieb以个体应对灾害的能力为视角，引入信息、社会资本、社会支持等要素建立了抗逆力概念网络模型^[16]。总体而言，在抗逆力概念模型的构建方面，研究者主要围绕风险因素和保护因素两个基本因子展开探索。起初，Garmezy基于抗逆力的保护因素建立了行为目标模型，强调个体有能力获取资源，从而有能力采取应对策略，是一种静态性分析。而后，Adger从降低风险因素

这一维度开展研究并建立个体—环境策略模型。强调风险因素的刺激与保护因素的应激是相互博弈、相辅相成的关系，由此呈现出抗逆力运行的关系框架^[18]。在此基础上，有学者基于抗逆力的生成起点、过程结果以及运作机制建立个体—环境互动模型^[19]。该模型

重点强调重构的优势和能力，认为这种互动过程是由诸多因素建构生成，具有多面性特征，由此提出应降低环境中的风险因素及其消极连锁反应。对此，Richardson从个体层面出发，以“改变”的视角将其看作是动态的、多样的、立体的过程，实现了对之前既有研究的进一步突破^[20]。

2.3 “脆弱性”与“抗逆力”的关系演化

文献梳理发现，早年间脆弱性的概念使用较为广泛且更为成熟，2001年起，脆弱性研究愈加关注恢复力的重要性，由此脆弱性开始与抗逆力相关联^[21]。早期研究中，脆弱性被视为抗逆力的一部分，实际是一种不准确的想法。当前，学术界对两者的关系研究主要存在三个

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脆弱性与抗逆力是对同一种表征的两种视角表述^[22]。其中脆弱性主要从负面角度来描述遭受损害的可能性，而抗逆力则是从正面角度来描述恢复的能力和过程。以Folke为代表的部分学者则认为脆弱性与抗逆力是互反性关系^[23]。强调脆弱性是承灾体受到扰动而被破坏的程度，而抗逆力是承灾体抗御和从中恢复的能力，认为抗逆力是脆弱性的反向体现，系统的脆弱性越低、抗逆力越强，脆弱性越高则抗逆力越弱。此外，有学者强调两者并非简单的正反





关系,认为两者的关系可类比为一种双螺旋结构^[24,25]。其中,脆弱性越强、抵抗力越弱、过程损失量越大,系统恢复的可能性和能力越低,则抗逆力降低;而抗逆力越强则恢复能力越好,由此将对预期系统的脆弱性程度产生积极影响。

通过对脆弱性概念的梳理发现,脆弱性在不同领域中获得广泛关注并逐渐被视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随着研究视角的扩展,基于人地耦合系统进行脆弱性的界定与研究是必然趋势。抗逆力研究则起步较晚,通观“抗逆力”定义,发现传统意义上的抗逆力概念多强调事后的补救,侧重系统的复苏能力,而现代意义上的抗逆力则更加关注调用自身资源进行防灾抗灾,体现对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重视。此外,脆弱性与抗逆力都是由复杂因素相互作用而形成,因而对两者关系的研究中第三种观点相对更为准确,但并未对此作出进一步的深入分析与探讨。总体而言,综观既有文献发现当前研究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首先,从学科属性上看,应急管理属于交叉性学科,脆弱性和抗逆力概念的发展沿革是一个学科集成化和内涵扩展的过程,应急管理学科亟需形成自身的理论体系。相对于国外研究而言,国内学术界在基础概念的理论建构方面较为薄弱,尤其在应急管理学科的初期发展阶段,已有研究更多的将解释锁定在宏观层面,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微观层面的研究,聚焦于核心概念的研究几乎空白且呈现碎片化。其次,从研究方法上来看,已有研究多是在占有已有概念基础上,通过对其蕴含特征的定性描述与归纳实现概念界定,导致通常只抓住部分核心并难以获取概念的周全要素,存在过大的主观性。应急管理学科研究需要实现由宏观向微观层面的延伸渗透。鉴于此,本文将立足于交叉学科的视角,通过数据统计指标与质性指标相集成的界定路线,实现应急管理学科中脆弱性和抗逆力的概念界定和关系探讨。

3 统计指标与质性指标相集成的界定路线

科学研究中的概念需要规范性、科学性、周全性的界定方式。在概念界定方面,原子

图谱法是一种较为科学的定量概念界定工具,虽出现时间较短但应用过程客观清晰,能够通过明确的执行步骤获得概念统计的数据指标,更加具有客观性,因而对本研究十分具有适用性。具体而言,原子图谱法是利用原子结构图理论作为指导进行概念界定的一种方式,即在概念化的起始阶段人们会对各类现象形成各种心像,当有些心像具有共同属性时便可将这些心像聚类为一组,即构成反映某一概念的结构化信息^[26]。而后,类似于主成分分析中提取主成分并对其命名的过程,对该组心像的共同特征进行命名。具体而言,首先收集已有的概念定义并进行心像分析归类。在此基础上,编制心像表并进行统计分析,确定出心像频数、频率、出现率,并按照数值大小逐渐编排。最后,编织原子图谱并进行解读,实现最终的概念界定。

核心词项挑选的合理与否,对本文概念界定的科学性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要求在概念化的过程中心像的挑选必须客观科学,对专家的理论素养和理论建构能力也提出了更高要求。鉴于此,本文选取长期从事相关研究并具有丰富研究经验的五位专家,在改进原有研究者个人确立心像方式的基础上,采用多人挑选心像的方式,以保证聚焦研究问题更为有效地确定核心词项。本文借助已有研究中的一致性聚焦点进行界定,将收集到的所有概念汇编为问卷表格,实现专家的独立打分以排除相互影响,力图保证筛选心像的科学性和代表性。通过首轮对五位专家意见的统计、处理和初步归纳,对专家经验与主观判断进行了综合度量,而后经过多轮意见的征询、反馈和调整,实现多专家、多周期等多源信息间的整合。最终以五分之三制为原则进行规范心像的测量,从而确立本文概念界定的核心词项。此外,为提升概念界定的科学性,本文将在原子图谱法统计指标的基础上,通过对已有概念演进过程的分析与系统回溯,以此提取质性指标,从而实现主客观信息的有效集成。

在文献来源方面,本文以权威性、时效性和全面性为原则进行比较分析和有效引用。为保证概念发展的继承性与延续性,本文积极引用相关学科的起源经典概念和影响力较大、可信度较高的核心文献。尤其是对于作

为新兴的应急管理学科而言，近期文献较为分散因而更多地以前期权威文献和长期的研究实践成果为基础。此外，积极关注相关领域的前沿研究成果和最新动态，以此更为准确地把握研究起点和深度。在定量统计分析部分，原尝试加入层次分析法，在权威性、影响力和时效性等维度通过期刊性质、下载次数、被引次数及发表时间等指标进行权重赋值，以确定各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对权重。但已有概念中包含大量外文文献，其中部分文献无法精准考证其各项指标，因而被迫舍弃权重赋值，在析出数据统计指标部分采用同一层级的处理方式。但在提炼质性指标部分，本文着重引用权威性期刊和经典性与前沿性的概念定义并对此进行定性指标考量，以此二者相融增强论证强度。

4 “脆弱性”的概念界定

4.1 “脆弱性”心像表的编制与分析

本研究主要基于中国知识资源总库（CNKI）和维普数据库平台获取中文文献数据源，以SPRINGER数据库为英文文献数据源，对应急管理、地理科学、生态环境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中对“脆弱性”概念的相关国内外研究进行收集。以“脆弱性”为关键词的相关研究十分丰富，但聚焦于研究其概念的文献却相对较少。为尽可能科学而全面的考量概念，本文在收集明确界定概念研究的同时，对“脆弱性”的影响因素指标和测量维度的相关研究也进行了纳入汇总，从而编制更为全面且认同度较高的概念心像表。其中，文献范围主要集中在应急管理领域，其他学科领域的概念仅选取该领域的起源定义及较为经典的文献。最终，本研究共收集6个学科，共66条“脆弱性”概念，其中包括38条应急管理学科概念、7条地理科学学科概念、7条生态环境学学科概念、5条经济学学科概念、5条人类学学科概念、4条社会学学科概念。同时，“脆弱性”概念共筛选出90个聚焦心像词汇，包括应急管理领域51个聚焦词项、地理科学领域21个聚焦词项、生态环境学领域23个聚焦词项、经济学领域16个聚焦词项、人类学领域14个聚焦词项、社会学领域11个聚焦词项。

原子图谱法主要考察概念心像的三个指标，即频数（P），指每个心像词汇出现的次数；频率（F），指该心像词汇与所有心像词汇的比率，即 $PL=PS/90*100\%$ ；出现率（C），指每个心像词汇在所有概念中出现的比率，即 $CXL=PS/66*100\%$ 。其中，频数和频率高的心像表明关注点较为聚焦，相反非聚焦点词汇则可忽略，心像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为进一步实现对“脆弱性”的概念界定，本文对概念心像词汇的总频数、总频率、总出现率以及各心像词汇在应急管理（ $F1=P1/51*100\%$ ， $C1=P1/38*100\%$ ）、地理科学（ $F2=P2/21*100\%$ ， $C2=P2/7*100\%$ ）、生态环境学（ $F3=P3/23*100\%$ ， $C3=P3/7*100\%$ ）、经济学（ $F4=P4/16*100\%$ ， $C4=P4/5*100\%$ ）、人类学（ $F5=P5/14*100\%$ ， $C5=P5/5*100\%$ ）、社会学（ $F6=P6/11*100\%$ ， $C6=P6/4*100\%$ ）各学科中的频率和出现率分别进行统计分析（附录1）。

根据心像统计表可以得知每个心像的频数、频率、总出现率以及在各学科中的出现率。统计表明，脆弱性概念的心像词汇较为聚焦，频率和出现率都相对较高，为提升分析结果的严谨性，本文将“脆弱性”概念中总频率高于25%且出现率高于30%的心像视为核心心像；频率高于15%且出现率高于20%的心像视为准核心心像；总频率高于5%且出现率高于10%的心像视为该概念的重要心像，总频率低于5%或出现率低于10%的心像即为非重要心像。分析结果表明，“扰动”、“暴露”、“敏感性”这三个心像的频数、总频率、总出现率最高，其中总体出现率均超过30%，分别达到37.9%、36.3%、34.8%，因而可视为是“脆弱性”综合概念的核心心像。这三个心像的总频率分别是27.8%、26.7%、25.6%，这表明，每100个描述“脆弱性”的概念词项中，就有27.8个采用“扰动”的心像；26.7个采用“暴露”的心像；25.6个采用“敏感性”的心像。

由于本文致力于探索应急管理学科中对脆弱性的概念界定，因而需要对各聚焦心像词汇在应急管理学科中的频率、出现率展开进一步分析研究。对于应急管理学科而言，“暴露”、“扰动”、“系统”是该领域脆



弱性概念的核心心像。这三个心像的频率均超过 25%，出现率分别达到 44.7%、39.5%、34.2%，即意味着在应急管理学科中，每 100 个描述脆弱性的概念中，有 44.7 个以“暴露”心像为核心词汇构建概念；有 39.5 个以“扰动”心像为核心词汇构建概念；有 34.2 个以“系统”心像为核心词汇予以构建概念。这些数据揭示了研究者在概念界定时的导向，显示出这三个心像词汇的重要性，因而应视为应急管理学科中脆弱性概念的核心心像，在原子图谱中处于核心位置。

表 1 “脆弱性”概念心像统计表

序号	聚焦心像	总频数 P(次)	总频率 F(%)	总出现率 C(%)	序号	聚焦心像	总频数 P(次)	总频率 F(%)	总出现率 C(%)
1	扰动	25	27.8	37.9	8	影响	13	14.4	19.7
2	暴露	24	26.7	36.3	9	恢复性	11	12.2	16.7
3	敏感性	23	25.6	34.8	10	可能性	11	12.2	16.7
4	系统	20	22.2	30.3	11	属性	10	11.1	15.2
5	能力	18	20	27.3	12	适应性	9	10	12.1
6	损害	16	17.8	24.2	13	性质、应对、程度、过程、预测、相互作用……	≤4	<5	<10
7	抵抗	13	14.4	19.7					

从本文汇总的脆弱性概念来看，“系统”、“能力”、“损害”的总频率高于 15%且总体出现率在 20%以上，是脆弱性综合概念的准核心心像。而在应急管理学科中，数据表明“系统”、“恢复性”、“抵抗”、“能力”、“损害”是聚焦程度较高的心像。较之于综合概念而言，应急管理学科中的脆弱性在关注“系统”、“能力”、“损害”的同时，也将“抵抗”和“恢复性”视为十分关键的组成部分。因其出现率相对弱于核心心像，因而被视为应急管理学科中脆弱性概念的准核心心像。从统计结果来看，“影响”、“恢复性”、“可能性”、“属性”、“适应性”、“抵抗”是脆弱性综合概念的重要心像，而“影响”、“属性”、“可能性”、“适应性”则构成应急管理学科中脆弱性概念的重要心像。较之于综合概念而言，应急管理学科更为重视“抵抗”和“恢复性”，并将其视为准核心心像。由此看出，不少研究者对于抗御性和恢复性较为关注，对于概念界定具有重要的补充性作用。此外，出现率均超过 10%可解释为，应急管理学科

中每 10 个脆弱性定义就会出现上述心像，并至少有 1 个以这些心像中的某一个为核心词。由于这些心像的聚焦程度弱于前两类心像，因而被视为应急管理学科中脆弱性概念的重要概念。对于“性质”、“应对”、“过程”等心像来说，在界定脆弱性概念中不属于关键性词汇，因而处于原子图谱的边缘位置。

4.2 基于原子图谱法的“脆弱性”解析

通过统计分析可以界定脆弱性概念中各个心像词汇的相对位置，由此绘制出脆弱性综合概念的原子图谱（图 1），以及应急管理学科中“脆弱性”概念的原子图谱（图

2）。通过原子图谱可看出，已有的脆弱性定义主要是针对研究客体暴露于的特定扰动而言，强调这种施加在系统上的扰动具有

情境动态性，从而导致系统发生变化，即敏感性。综合各相关学科概念界定来看，脆弱性关注系统面对扰动所产生负面影响时的显著表征，以及通过自身特征的改变来应对已存在或预期发生的外部扰动的能力。另一方面，立足于应急管理学科的脆弱性关注点更为集中，主要聚焦于人地耦合系统的研究视角，将自然科学领域研究中的风险概念与社会科学领域研究中的恢复性、抵抗力等结合起来。从系统内部结构和功能角度强调系统抵抗扰动所产生的不利影响以及从中实现恢复性的能力。

由于研究视角不同，各学科对脆弱性概念的解读存在差异性。分析发现，在地理学中，脆弱性较多地关注风险源暴露于扰动后的表征，强调风险产生不利影响后的调节能力和恢复力。生态环境学科中则侧重关注遭遇灾害的程度和潜在破坏量，逐步显现出融合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等特征，反映出系统对扰动易于感受的性质，突出强调人和系统可避免损害的程度以及对灾害的适应性能力。相较于自然科学领域，社会科学领域

更关注个人或社区的脆弱性，强调社会环境和政治结构变化的影响。在经济学领域，脆弱性强调特定的政治经济背景下发生损失的可能性，关注人的行为和内外部扰动对系统显性化程度放大或缩小的作用。人类学中的脆弱性则关注社会群体易受灾害影响或损害的原因，反映出脆弱性是社会不平等的产物，同时强调人的主动性、结构的稳定性、经济、教育等对于实现恢复力的重要影响。在社会学领域中，脆弱性强调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会导致敏感性增加，由此形成脆弱性空间和人口，并将其视为是贫困的一个维度。在强调物质资本和经济资本的同时，拓展引入社会资本，更多的将其视为系统内部结构的一种属性。综上所述，虽然各学科对于脆弱性概念的界定存在差异性，但不同学科研究的相互联系和交融贯通使脆弱性概念的内涵不断深化。

4.3 “脆弱性”概念的质性考量

“脆弱性”一词发轫于西方国家，是根据英文“Vulnerability”翻译而来，原意是指“对身体上或情感上伤害的接受能力”，后续引申为易遭受损害、具有敏感性、抵抗能力差等含义。中文字面解释为“易折断破碎、敏感性高而易受冲击的一种不稳定状态”，但这一释义并不能完全表达“脆弱性”概念的原意，因而应结合英文原意进行全面理解。对脆弱性概念化表述的定性分析将有助于进一步全面挖掘构成要素，基于这一逻辑，本文在原子图谱的基础上对相关概念的质性指标进行深入考量，以期精准勾勒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从脆弱性概念的外延来看，由于不同系统脆弱性研究中的功能机制与角色过程具有差异性，因而各有侧重，其中主要涉及社会脆弱性、灾害脆弱性、生态脆弱性、经济脆弱性、资源脆弱性等方面。近年来，脆弱性概念的内涵呈不断丰富与扩展，具体可从两方面理论取向加以把握。一是脆弱性的“发生机理”与“产生结果”。从理论的发展维度上来看，一些学者从脆弱性发生机理的过程视角展开分析，不仅考虑外部扰动对系统的影响，同时将脆弱性视为由系统自身的易感性和不稳定性所致的内在属性^[27,28]。认为这种属性在系统受到扰动时即会显现，而外

部扰动与系统间的相互作用是脆弱性发生变化的驱动因素，并通过系统面对扰动的敏感性及其应对能力得以体现。从这一角度来看，脆弱性是系统承受不利扰动时的一种内在抵抗风险的能力，强调承灾体易受到损害的性质和对灾害破坏缺乏抵御能力，是对系统应对风险能力的一种衡量。另一方面，就系统遭受损害的结果而言，一些学者从灾害潜在影响的角度进行定义，侧重于遭受不利影响或威胁的程度和结果，认为脆弱性是系统面对不利扰动而受到损害的结果^[29]。20世纪90年代以来，应急管理领域中的脆弱性概念不仅关注致灾因子，同时强调系统对灾害的暴露程度，将其视为系统受损的一种结果^[30]。

脆弱性的“单一扰动”与“多重扰动”。研究初期，脆弱性通常以自然环境为中心，关注自然系统的固有脆弱性，侧重灾害发生时来自系统外部的单一扰动所产生的多重影响^[31]。随着逐步延伸至社会系统，相关定义开始注重人文因素并转向人地耦合系统研究^[32,33]。从这一角度来看，脆弱性由单向的静态概念逐渐向多向互动的动态概念积极演变，强调系统通常暴露于来自系统内部与外部的多尺度扰动，其中这种多重扰动之间具有复杂的相互作用。由此，概念内涵更加强调动态性和相对性，着重体现脆弱性随时空而演变的特征，并将时间维度扩展至事前、事中和事后三个阶段，成为一个包含敏感性、抵抗力、适应力、恢复力等要素在内的多元概念集合，从而实现对脆弱性发生逻辑与内在机理的精准把控。

4.4 “脆弱性”概念界定

“属加种差”是由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定义方法，主要包含属、种、种差三部分，即通过确认被定义项的上位属概念，以及作为种概念的被定义项概念与其他种概念的差别进行定义。其中，逻辑学中认为事物的种差可以是一个简单属性或由几个属性组成的复杂属性，也可以是事物现有的属性或事物发生或形成过程中的属性。因而结合具体的语言情境，将沿用逻辑学中的“种差+属”的

方法进行定义¹，在具体给出定义时，本文结合“脆弱性”自身特性，以事物的性质做种差，采用“性质定义”的方式进行界定²。由此，在结合定量统计分析与质性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将应急管理学科中的“脆弱性”概念界定为：系统暴露于特定情境时，由于对多重扰动的敏感性而呈现出的一种易受损害的可能性，在人地耦合系统的交互过程中以

抵抗不利影响、实现适应性和恢复力的动态过程量为显著表征，是一种随时空演进而动态变化的多重循环属性。其中，系统所暴露于的扰动是具有多重性和交互性的，既可能来自系统外部，也可

能源自系统内部，并随着暴露情境的改变而不断变化。既有定义中有学者认为脆弱性是独立于扰动而存在的一种系统内部属性，因而内涵中不应包含“暴露”要素^[18]。与这一观点不同，通过综合定量统计与质性分析，本文认为“暴露”应是脆弱性概念中的重要构成要素。

这种内源性属性在风险发生前就已存在，但同时又受到系统外部社会、经济、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当致灾扰动因素打破系统结构

与系统间平衡时，便会随着危机事件的形成而显现。基于此，将应急管理领域中的脆弱性分为物理系统脆弱性、管理系统脆弱性和应急系统脆弱性。其中在我国，由于规范化监督缺失、管理能力稀释与应急准备不足等问题的存在，加速了系统承受度突破安全阈值，致使结构功能与运行机制出现质变，进一步加剧了灾害的负面影响。因此，应急系统的脆弱性概念应注重敏感性识别，即系统能够承受扰动并通过冗余资源的动用实现系统有效运行的缓冲能力。为提升应急响应能力，脆弱性概念同时更应着

重强调系统面对致灾因子扰动的反应能力，从而在准确识别薄弱环节的基础上，从源头厘清突发性事件的生成机理。因而，系统对外界扰动的暴露、系统的敏感性与反应能力构成了脆弱性的重要要素。由此，这一理论范式推动了应急管理的研究重心从自然系统转至人地耦合系统，为传统致灾因子与灾害研究架起桥梁，有助于从灾前预防的角度为识别应急事件的运行机理提供分析框架和理论指导。



¹ 由于希腊语和英语语言作为限制性成分的“种差”是补语，定义结构为“属+种差”，而在汉语语境中，种差是属概念的定语，因而定义结构为“种差+属”。

² 根据种差的不同分为性质定义、发生定义、关系定义、功用定义等方式，对于“脆弱性”，本文主要以“性质定义”为种差进行界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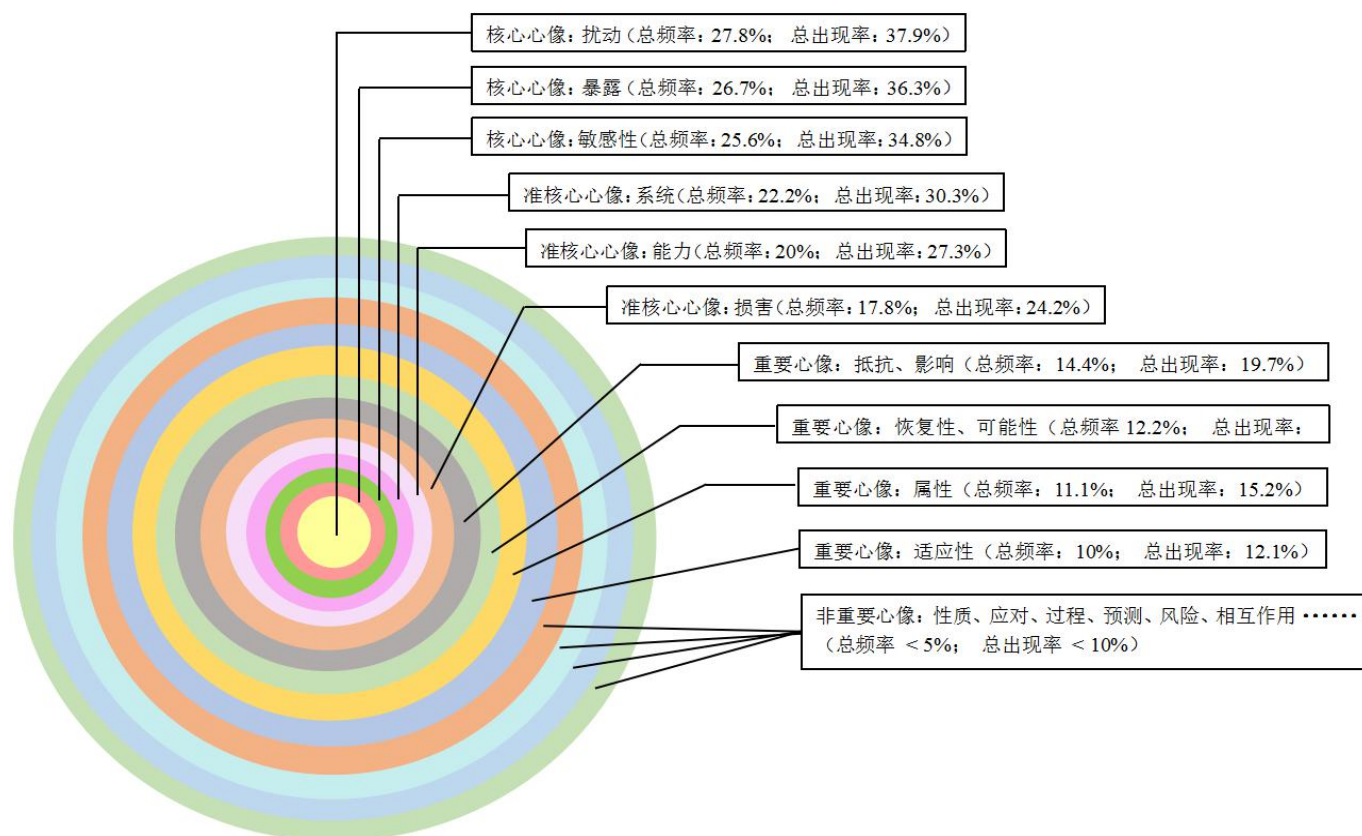


图1 “脆弱性”综合概念原子图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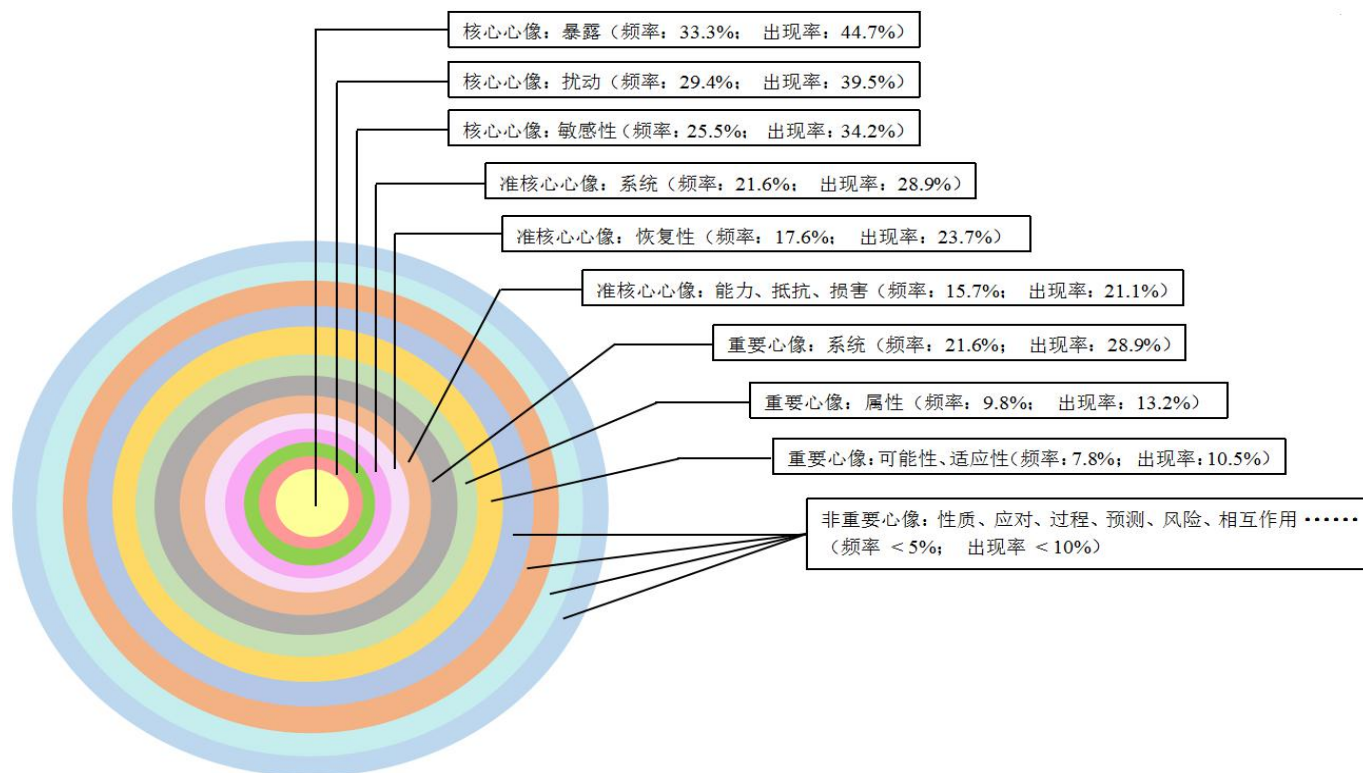


图2 应急管理学科“脆弱性”概念原子图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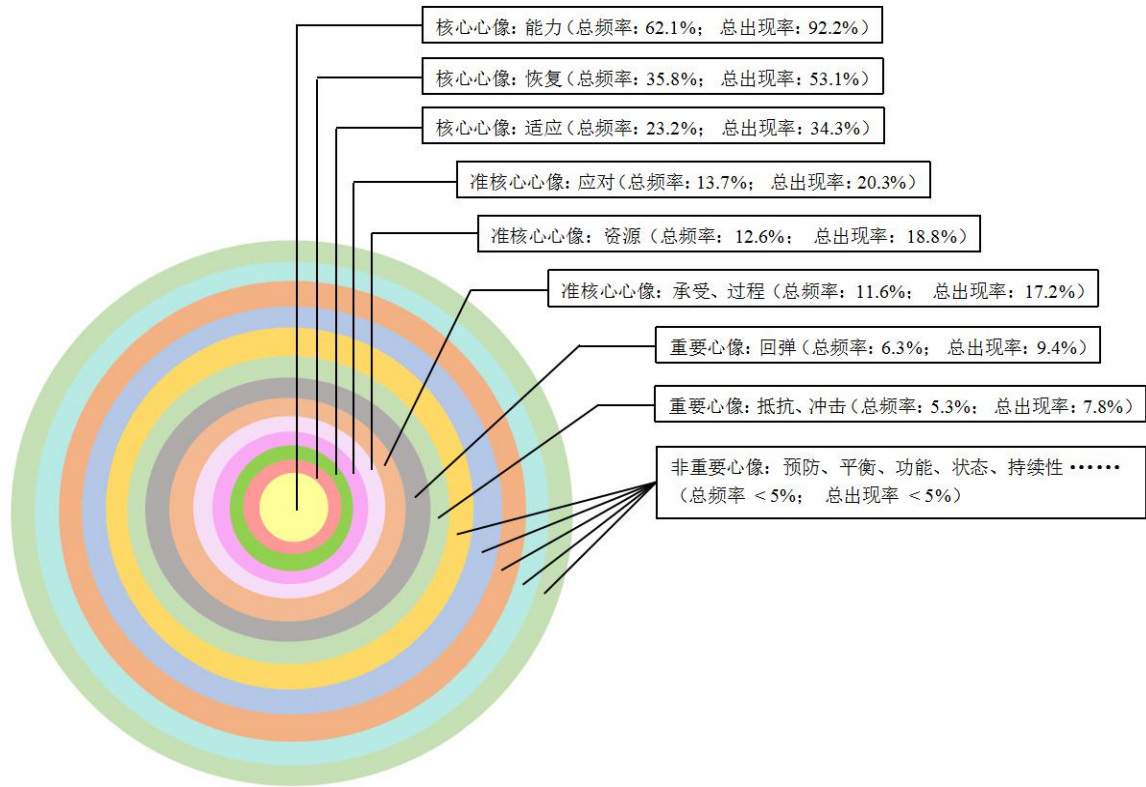


图 3 “抗逆力”综合概念原子图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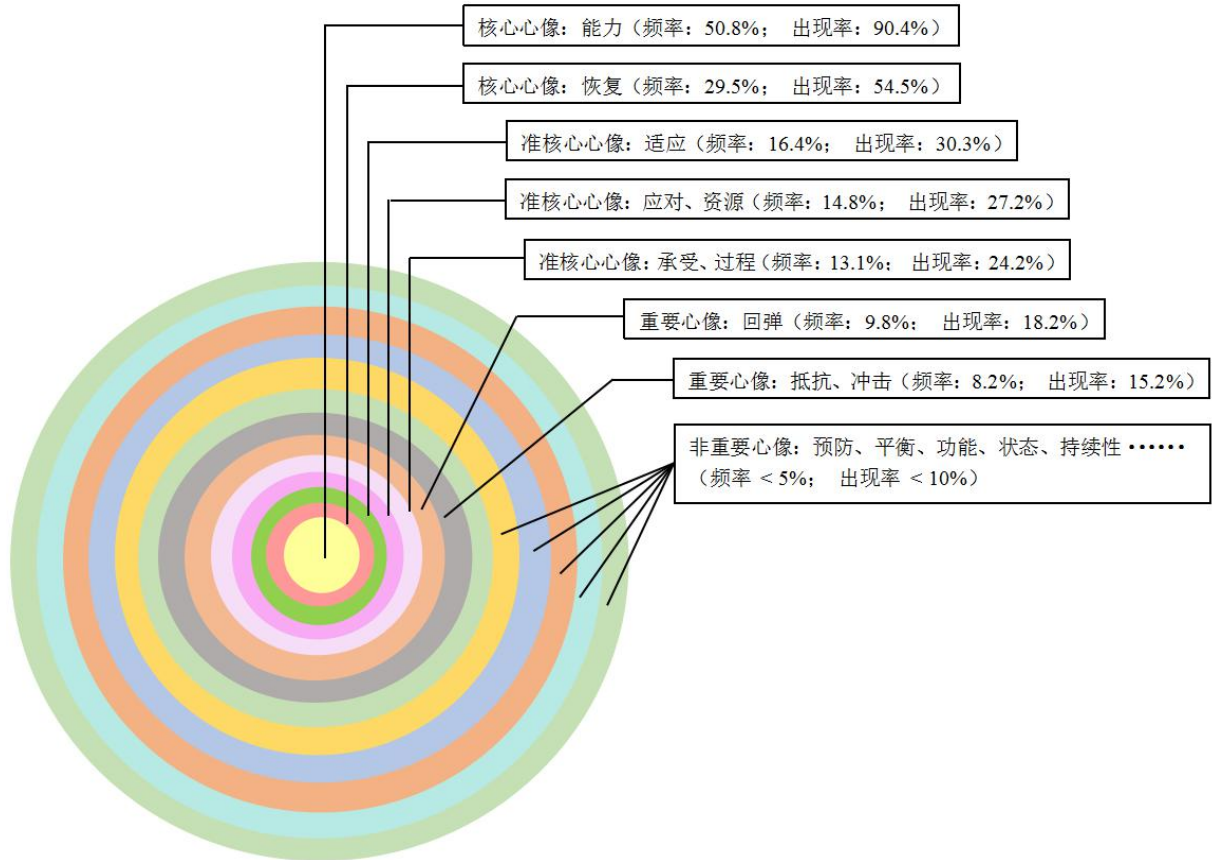


图 4 应急管理学科“抗逆力”概念原子图谱

5 “抗逆力”的概念界定

5.1 “抗逆力”心像表的编制与分析

对“抗逆力”进行概念界定采用与“脆弱性”相同的界定方式，基于国内外文献数据库，本文对应急管理、物理工程学、生态环境学、组织管理学以及心理学领域中对“抗逆力”概念的相关研究进行收集。文献来源主要集中在应急管理领域，其他学科概念仅选取该领域的起源定义及较为经典的文献。在此过程中，共收集到5个相关学科，64条“抗逆力”概念，其中包括33条应急管理学科概念、6条物理工程学学科概念、5条生态环境学学科概念、8条组织管理学学科概念、12条心理学学科概念。采用五分之三制进行心像筛选，最终共获得95个聚焦词项，其中应急管理领域获得61个聚焦词项、物理工程学领域获得12个聚焦词项、生态环境学领域获得12个聚焦词项、组织管理学领域获得23个聚焦词项、心理学领域获得30个聚焦词项。根据“抗逆力”概念的聚焦词项表可统计出每个聚焦心像的频数、总频率及总出现率（表2）。为进一步实现应急管理领域“抗逆力”的概念界定，本文对“抗逆力”的聚焦心像词汇在各学科领域中的频率和出现率分别进行统计（附录2）。

表2 “抗逆力”概念心像统计表

序号	聚焦心像	总频数 P(次)	总频率 F (%)	总出现率 C(%)	序号	聚焦心像	总频数 P(次)	总频率 F (%)	总出现率 C(%)
1	恢复	34	35.8	53.1	6	过程	11	11.6	17.2
2	适应	22	23.2	34.3	7	反弹	6	6.3	9.4
3	应对	13	13.7	20.3	8	抵抗	5	5.3	7.8
4	资源	12	12.6	18.8	9	冲击	5	5.3	7.8
5	承受	11	11.6	17.2	10	预防、平衡、功能、状态、持续性……	≤4	<5	<5

相对于脆弱性概念来说，已有抗逆力概念的聚焦词项呈现出相对分散状态，聚焦心像出现频数间的差值较大，因而为保证分析结果的科学性和严谨性，本文将抗逆力概念中频率高于20%且出现率高于30%的心像视为核心心像；频率高于10%且出现率高于15%的心像视为准核心心像；频率高于5%且

出现率高于5%的心像视为该概念的重要心像，频率低于5%或出现率低于5%的心像即为非重要心像。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认为抗逆力侧重强调的是一种能力，这一观点通过心像统计分析获得了验证。在64条概念中共有59条以“能力”作为聚焦心像，总频率为62.1%、总出现率达到92.2%，在应急管理学科中频率为50.8%、出现率高达94.0%，因而可视为抗逆力概念界定中的“公因数”和重点强调的词汇，在此虽未将其列入聚焦心像统计表，但认为“能力”是抗逆力概念的核心心像。

综合各学科统计指标表明，频数、总频率、总出现率最高的心像词汇是“恢复”，其总频率达到34.7%，总出现率高达46.6%，其次是“适应”，总频率达到22.4%，总出现率达到30.1%，因而这两个心像可视为抗逆力综合概念的核心心像。从聚焦词项统计情况来看，“应对”、“资源”、“承受”、“过程”的总频率超过10%，总出现率超过15%以上，是“抗逆力”综合概念的准核心心像。此外，“回弹”、“抵抗”、“冲击”是综合概念的重要心像。对于抗逆力概念来说，非重要心像词汇较为分散，如“预防”、“平衡”、“功能”等词汇的总频率和总出现率通常在5%以下，无法构成聚焦点，因而属于抗逆力综合概念的非重要心像。聚焦于

应急管理学科来看，除“能力”之外，“恢复”是该领域抗逆力概念的核心心像，频率为29.5%，出现率高达54.5%。而对于作为抗逆力综合概念核心心像的“适应”，在应急管理学科中属于准核心心像，揭示出应急管理学科中的抗逆力更加强调以“恢复”为导向。同时，“应对”、“资源”、“承



受”、“过程”共同构成了应急管理学科中抗逆力概念的准核心心像。此外,分析数据表明,与抗逆力综合概念相同,“回弹”、“抵抗”、“冲击”构成应急管理学科中抗逆力概念的重要心像,而出现率低于10%的心像词汇在界定概念中的作用较小,因而可视为应急管理学科中抗逆力概念的非重要心像。

5.2 基于原子图谱法的“抗逆力”解析

通过数据统计,我们可以界定抗逆力概念中各个心像词汇的相对位置。据此,绘制出抗逆力综合概念的原子图谱(图3),及应急管理学科中抗逆力概念的原子图谱(图4)。通过原子图谱可看出,已有的抗逆力概念主要侧重于描述一种“能力”。综合各领域的概念界定来看,抗逆力关注的是面对不利情境下良好的恢复能力与性,多数研究者侧重于以恢复性的结果视角进行概念界定,少数学者则侧重于适应与应对风险的过程性视角进行界定,但主要存在两方面共识,即作用情境为面对灾难以及关注可运用的资源。在应急管理领域,抗逆力则多立足与危机事件和自然灾害的作用情境,关侧重注的宏观集合层面的意义,认为抗逆力的核心要素是“恢复”,即通过重建尽快恢复到稳定情况的能力,强调应对过程中的资源储备、适应和承受挑战的能力。此外,“冲击”、“抵抗”是应急管理学科中两个独有的心像,反映出抗逆力不是以分析致灾因子为重点,而是将面对冲击作为抗逆作用起点,强调通过政治、经济、社会等维度的运行机制实现综合性抗御。相较于脆弱性而言,抗逆力更加注重发挥主观能动作用。

各学科领域对抗逆力的关注维度不同,概念界定也各有倚重。分析表明,作为抗逆力概念起源的物理工程学领域,虽起步较早但定义较少,主要强调物理层面的恢复和回弹,视抗逆力为一种适应能力的结果表征。生态环境学领域的相关研究也较少,主要将其视为生物体在面对风险时产生应急机制的一种属性,强调是生物普遍存在的一种反应和恢复能力。此外,组织管理学领域的抗逆力研究较为分散且不清晰,从有限的研究成果来看,该领域关注的抗逆主体是中观层面

的组织,通常将抗逆力视为一个战略性概念和能力与过程的互动集合,强调的抗逆结果是适应与恢复。心理学领域对抗逆力的研究则较为丰富,主要立足于个体微观层面从个人特质、能力、过程及结果四个维度对抗逆力概念进行界定。关注的抗逆情境是个体遭受压力与创伤性事件的过程,强调心理资本的调动,并逐步从侧重心理的复原能力转向心理能力的恢复与重建,强调个体与环境的互动整合。

5.3 “抗逆力”概念的质性考量

“抗逆力”(Resilience)一词源于拉丁文,原意是指跳回这个动作,而后引申为物体受到挤压后回弹的能力。目前,这一概念的中文翻译尚未统一,如抗逆力、弹复、复原力等,其中有些翻译易混淆或无法体现其本质内涵,因而本文选择认同度最高的“抗逆力”译法。

不同学科的定义纷繁冗杂,抗逆力概念的内涵和构成要素尚未获得统一,但都将面临不利情境、关注资源调用、强调恢复力与重构能力三方面视为概念的重要维度。重点考量抗逆力影响因素的相互作用,并将风险因素和保护因素的互动关系视为概念建构的核心,强调两者此消彼长、彼此制衡的博弈关系^[34,35]。其中,抗逆力联盟将其定义为系统能吸收扰动并保持平衡状态,系统能够发挥自组织作用抗御冲击的能力,通过资源整合提升适应与学习能力。由此可见,已由对系统平衡状态的单一关注逐渐转变到对系统功能的关注,如自组织能力和学习能力等。通观抗逆力概念的外延,TOSE模型概括性指出抗逆力主要存在与技术、组织、社会和经济四个系统^[35]。其中,技术领域主要指物质资源的抗逆力;组织领域则涉及到组织机构在物质要素与组织要素维度上的抗逆力;社会领域即个人及社区团体的抗逆力;经济领域包括灾害发生后经济内在特质的抗逆力。就抗逆力的承载主体而言,可将国内外既有研究分为微观层面的个体抗逆力,即关注于个体在逆境中的心理状态及行为;中观层面的组织抗逆力,即关注组织在逆境中的行为,以及组织中人与人之间、组织与环境间的交互作用;宏观层面的社会抗逆力,即以社会

成员共同面对的逆境为作用情境，关注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对应对、适应与转换能力的综合性交互作用。其中，微观层面的概念内涵最为丰富，而应急管理学科领域涉及的抗逆力多指宏观层面的社会或社区抗逆力，更关注人与人、人与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强调通过调用资源从危机中恢复并获得发展的能力。

5.4 “抗逆力”概念界定

同样沿用逻辑学中“种差+属”的定义方法，结合抗逆力概念的自身特性，本文以事物发生或形成过程中的情况做种差，采用“发生定义”的方式进行界定，即是对发生过程的一种描述。由此，本文将应急管理学科中的“抗逆力”概念界定为：系统能够积极抗御和适应风险灾害的冲击，既包括通过风险因素与保护因素的互动机制发挥自组织作用的内在特质，也包括在动态的应对过程中，通过多样性策略调用冗余资源和启动重构，以快速实现减灾和恢复常态的能力。从作用结果来看，由于应急管理领域强调损失最小化的复杂治理原则，因而本文界定的基准层次是恢复到原有水平，更高层次则是获得能力的发展以超越原有水平、达到更好状态。也就是说，系统的恢复能力既包括应对冲击的适应和抗御性过程，也包含有效识别危险因素、提升保护因素以达成重构的能力。

与已有定义不同，通过结合原子图谱定量分析和已有概念的质性分析，本文将抗逆力视为一个与减灾相对且具有多重张力的概念，即一个动态性的过程，具体可分为内生性抗逆力与获得性抗逆力两个维度并适用于不同的系统范围。其中内生性抗逆力强调不同系统面对灾害时，通过多样性的策略积极发挥系统的自组织能力。尤其是在我国情境下，更应强调“去中心化”要素，通过优化应急预案编制打破中心化的治理结构，协同调用不同组织资源以共同发挥多节点力量，从而实现系统的持续运行和积极应对。另一方面，获得性抗逆力则侧重强调通过抵抗灾害的消极影响获得应对能力的提升。对此，着重强调打破我国原有的条线型应急响应机制，建立起体制化的多重路径以快速实现信息交融与资源整合，继而在此基础上，获得

学习与对预期灾害应对治理能力的提升。由此，通过对抗逆力概念的精准把握有助于实现中国情境下可持续性的应急治理理念。

6 “脆弱性”与“抗逆力”的关系

不同学科的交融发展为脆弱性和抗逆力概念与相关理论的发展带来了良好契机，逐步演进成为跨学科、多要素、多维度的学术概念体系。脆弱性和抗逆力作为承灾系统面对灾害的两个重要属性，是应急管理研究中高度关联的核心概念。通过文献整合发现，对脆弱性与抗逆力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其中将两者关系类比为双螺旋结构的观点相对更为准确，但并未对此进行深入探讨。鉴于此，有必要在界定概念的基础上对脆弱性和抗逆力之间的关系进行阐释说明，从而为应急管理研究提供积极借鉴。

研究发现，脆弱性和抗逆力是一对具有交叉重叠的概念，但在本质上类属于不同范畴。其中，脆弱性是以致灾因子为分析对象，关注系统暴露于风险时的状态表征和受损的可能性，强调的是一种应对扰动的结果属性。而抗逆力则从分析对象出发，强调研究对象的应对、抵御和受灾后的恢复能力，侧重于动态过程表征，概念外延比脆弱性更为广泛。脆弱性与抗逆力均受制于多重因素的影响，其中存在着一定的复杂性和冲突性，这就导致了一个对脆弱性具有积极影响的因素，可能会对抗逆力产生积极影响、消极影响或无作用。因此，在影响因素的研究方面不能简单地认为一个因素指标会对脆弱性和抗逆力同时产生影响或具有相同影响。此外，脆弱性高代表系统暴露于扰动的概率大且受损程度高，即意味着抗逆力程度低。而当抗逆力程度高时，即系统的应对能力与适应能力较好，则系统恢复的时效越高，那么当系统面向后续灾害事件时的脆弱性会被降低。也就是说，对脆弱性的研究有助于降低承灾体的受损程度，而对抗逆力的探讨则有助于提升系统的应对力与适应性，从而快速实现恢复和提升学习与自组织能力。实际上，在灾害发生初期，系统遭受的损害过程量实际上主要取决于脆弱性程度，而后承受损害并从中实现恢复的能力则取决于抗逆力的抗御过程，两者相互衔接，依次占据主导地位并由此构



成一个闭合回路。因此，脆弱性和抗逆力高度关联且呈现出一种相互独立并交互影响的关系，是一种根据具体情境而动态变化的存在。

7 结论及展望

应急管理是一门处于发展前期的交叉性新兴学科，“脆弱性”和“抗逆力”作为应急管理领域中的核心概念具有广阔的研究前景，其发展沿革是一个学科集成化和内涵扩展的过程。长期以来，应急管理领域中的“脆弱性”和“抗逆力”概念的内涵及外延范畴定义不清，尤其是对于“抗逆力”这一前沿热词来说，其内涵要素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态势。因此，在聚集不同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脆弱性”和“抗逆力”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进行了探究，不仅对应急管理领域理论体系的发展起到基础性的支持作用，同时有助于建立跨学科的连接交融，实现碎片化理论向整合化的跨越发展。

定量统计分析可通过数理的精确度提炼心像，质性指标则能够给人以概念化的认识和理解。鉴于此，本文主要立足于跨学科视角对“脆弱性”和“抗逆力”进行概念界定并对两者关系进行阐述。与已有研究不同，本文采用原子图谱法对应急管理领域进行聚焦分析，发现相关学科在概念界定时不同侧重点，删除不符合应急管理学科的构成要素，从而提炼出规范心像用以实现概念内涵与外延的精准勾勒。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已有概念理论模型演化进程的系统回溯，进一步考量“脆弱性”和“抗逆力”在应急管理领域中的特有要素，从而实现统计分析 with 质性指标的有效集成。由此，立足于我国情境，更加科学而全面地对应急管理领域中的“脆弱性”和“抗逆力”进行概念界定。总体来说，本文的研究对应急管理学科的理论发展将提供一定程度上的启迪作用，也为跨学科研究的交叉融合提供一些积极的借鉴作用。但本文研究属于基石性工作，后续仍需要大量对“脆弱性”与“抗逆力”的深入挖掘与研究，为应急管理基础理论研究的发展源源不断地注入新质，从而推动应急管理领域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为政府的精准应急治理提供扎实的理论依据和积极的借鉴启迪。

参考文献

- [1] 艾尔巴比. 社会研究方法(第10版)[M]. 邱泽奇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9:116.
- [2] TIMMERMAN P. Vulnerability, Resilience and the Collapse of Society: A Review of Models and Possible Climatic Applications[M]. Toronto, Canada: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Toronto, 1981.
- [3] BLAIKIE P, CANNON T, DAVIS I. At Risk: Natural Hazards, People's Vulnerability And Disasters[M]. Berlin: De Gruyter, 1994:284.
- [4] 赵跃龙. 脆弱生态环境定量评价方法的研究[J]. 地理科学, 1998, 18(1):73-79.
- [5] 王静爱, 商彦蕊, 苏筠. 中国农业旱灾承灾体脆弱性诊断与区域可持续发展[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2005(3):130-137.
- [6] BURTON I, KATES R W, WHITE G F. The Environment as Hazard[J]. Contemporary Sociology, 1979, 8(3).
- [7] WATTS M, BOHLE H G. The Space Of Vulnerability[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993, 17(1):43-67.
- [8] CUTTER S L, BORUFF B J, SHIRLEY W L. Social Vulnerability to Environmental Hazards[J].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2003, 84(2):242-261.
- [9] CHEUNG K W. At Risk: Natural Hazards, People's Vulnerability and Disasters - by Ben Wisner, Piers Blaikie, Terry Cannon, and Ian Davis[J].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2007, 173(2):189-190.
- [10] BOHLE H G. Vulnerability Article 1: Vulnerability and Criticality[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1.
- [11] TURNER B L, KASPERSON R E, MATSON P A. A Framework For Vulnerability Analysis In Sustainability Science[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03, 100(14):8074-8079.
- [12] HOLLING C S. Resilience And Stability of Ecological Systems[J]. 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s, 1973(4):1-23.
- [13] EGELAND B, CARLSON E. Resilience As Process[J].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1993(5): 517-528.

- [14] HOLLING C S. Resilience And Stability Of Ecological Systems[J]. 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s,1973(4):1-23.
- [15] GALLOPÍN G C. Handbook for Estimating the Social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Effects of Disasters[M]. Mexico:ECLA, 2003.
- [16] SHERRIEB K, NORRIS F H. Measuring Capacities For Community Resilience[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2010,99(2):227-247.
- [17] GARMEZY N. Resilience In Children's Adaptation To Negative Life Events and Stressed Environments[J]. Pediatric Annals,1991,20(9):463-466.
- [18] ADGER W N, KELLY P M. Social Vulnerability to Climate Change and the Architecture of Entitlements[J].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Strategies for Global Change,1999,34(4):253-266.
- [19] MACALANE J M, LINDA C T . The Hidden Resilience of Street Youth[J].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2010,40(3):318-326.
- [20] RICHARDSON G E. The Metatheory Of Resilience And Resiliency[J].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2002,58(3):307-321.
- [21] BUCKLE P, GRAHAM M, SMALE S. Assessing Resilience and Vulnerability: Principles , Strategies and Action, Emergency Management[C]//A Report for Emergency Management, Australia:Canberra,2001.
- [22] LIGON E, SCHECHTER L. Measuring Vulnerability[J]. Economic Journal,2003,113(3):95- 102.
- [23] FOLKE C, CARPENTER S. Resilien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Building Adaptive Capacity In a World Of Transformations[J]. A Journal of the Human Environment,2002, 31(5):437-440.
- [24] COLES E, BUCKLE P. Developing Community Resilience As a Foundation For Effective Disaster Recovery[J].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Emergency Management,2004,19(4):6-15.
- [25] GALEA S, AHERN J, KARPATI A. A Model of Underlying Socioeconomic Vulnerability in Human Populations Evidence From Variability in Population Health and Implications for Public[J]. Health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2005,60(11):2417-2430.
- [26] 尚虎平, 李逸舒. 一种概念界定的工具:原
- 子图谱法——以“绩效”、“政府绩效”、“政府绩效评估”概念为例[J].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1(4):15-29+126.
- [27] 刘燕华, 李秀彬. 脆弱性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7-15.
- [28] CHAPTER D. the Contribu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Meeting the Challenge of Risk And Disaster Reduc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From Concrete Examples to the Proposal of a Conceptual Model of “Resiliency Vulnerability”[J]. Technologies and Innovations for Development 2003(1):131-153.
- [29] DWYER A, ZOPPOU C, NIELSEN O. Quantifying Social Vulnerability:a Methodology For Identifying Those At Risk To Natural Hazards[M]. Canberra:Geoscience Australia,2004:21.
- [30] 王艳, 张海波. 灾害抗逆力: 定义、维度和测量[J]. 2017(4):37-51.
- [31] KATES R W, CLARK W C, CORELL 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Sustainability Science[J]. Science,2001(292):641-642.
- [32] 樊运晓, 高朋会, 王红娟. 模糊综合评判区域承灾体脆弱性的理论模型 [J]. 灾害学,2003,18(3): 20-23.
- [33] 苗鑫, 李敏. 弹复导向的应急管理研究前沿挈领——代表性 SSCI 论文追踪及其研究方法简评[J]. 2013(4):125-136+143.
- [34] GANOR M. Community Resilience:Lessons Derived From Giló Under Fire[J]. Journal of Jewish Communal Service,2003(3):105-108.
- [35] KUMPFER K L. Factors and Processes Contributing to Resilience : The Resilience Framework[J]. Springer US,2002(4):179 -224.
- [36] TIERY K. Structure And Process In The Study Of Disaster Resilience[C]. The 14th World Conference On Earthquake Engineering, Beijing, China, October12-17, 2008.



雾霾影响下的公众情绪与风险感知研究 ——以天津市微博用户为分析样本

樊博¹, 杨文婷¹, 孙轩²

(1. 上海交通大学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上海 200030; 2.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天津 300350)

摘要: 近年来雾霾现象的严重化已对公众生活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基于微博平台获取数据, 进行语料分析和数据整理, 通过相关性检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研究了公众情绪和风险感知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 在1%显著性水平上, 公众的悲伤情绪、恐惧情绪、厌恶情绪在滞后二期情况下能够有效预测公众对环境问题的风险感知, 公众对雾霾的关注度在滞后二期时也能够有效预测公众对环境问题的风险感知, 但公众正面情绪未包含预测公众对环境问题风险感知的有效信息。

关键词: 公众情绪; 雾霾; 风险感知; 微博

中图分类号: C91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3758 (2017) 05-0000-08

Public Emotion and Risk Percep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Haze

——Based on a Survey of Microblog Users in Tianjin

FAN Bo¹, YANG Wen-ting¹, SUN Xuan²

(1.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0, China; 2. Zhou Enlai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severity of haze has negatively influenced citizen's life in varying degrees. Based on the corpus analysis and the data collected from Sina Weibo, correlation test, co integration test and Grainger causality test are implemented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emotion and risk percep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sadness, fear and disgust, at the 1% significance level, can effectively predict the environmental risk perception in lag 2. The concern of the public for haze can also effectively predict the environmental risk perception in lag 2, but the positive emotion of the public cannot predict the environmental risk perception effectively.

Key words: public emotion; haze; risk perception; Weibo

收稿日期: 2016-12-21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1371122);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资助项目(2016YEF012230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资助项目(14ZDB152);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NKZXB1483)。

作者简介: 樊博(1975-), 男, 黑龙江哈尔滨人,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管理学博士, 主要从事应急管理、环境政策研究; 孙轩(1985-), 男, 湖北武汉人, 南开大学讲师, 工学博士, 主要从事智慧城市、电子政务研究; 杨文婷,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



近年来，我国许多城市都发生了持续性的“雾霾”天气现象，严重影响了公众的正常生活和健康水平。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公众已经能够在网络社交平台及时表达想法。“雾霾”话题成为了近年来网络社交平台中的热门话题，但少有学者针对雾霾问题来研究公众情绪和风险感知的关系。此外，不同的情绪会对风险感知产生不同的影响，尤其是恐惧和愤怒等负面情绪对风险感知有着显著的影响¹。因此，本文认为有必要深入探讨公众情绪的波动对风险感知的影响。本文以微博为数据收集平台，以雾霾问题为切入点，进而深入探究公众情绪和风险感知二者之间的关系。

风险感知属于心理学的研究范畴，指个体对存在于外界的各种客观风险的感受和认识，并强调个体通过直观判断和主观感受获得的经验对认知的影响²。Slovic³对风险感知

进行不同维度的测量，提出感知风险是可测量的且是因人而异的。国内对于风险感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突发公共事件领域，如对SARS事件中的公众风险认知研究⁴等。国内外学者还深入探究了情绪与风险感知之间的关系，杨维⁵等讨论了地震环境下的情绪对风险感知的影响，Slovic等⁶研究了不同情绪对于风险感知和决策的影响。然而，现有文献多从公共危机事件（如地震、水灾等）和市民个人行为（如消费、旅行、癌症预防等）等视角来分析情绪与风险感知的关系，但以社会问题为背景的分析较少。

综上，现有文献主要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不足：第一，雾霾会引发公众情绪的波动，现有研究中对情绪波动影响的深入研究较少，尤其是不同情绪会引发怎样的决策行为等具

¹ Lerner J S, Gonzalez R M, Small D A, et al. Effects of Fear and Anger on Perceived Risks of Terrorism a National Field Experiment [J].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3, 14(2): 144-150.

² 孟博, 刘茂, 李清水, 等. 风险感知理论模型及影响因子分析[J]. 中国安全科学学报, 2010, 20(10): 59-66.

³ Slovic P. Perception of risk[J]. Science, 1987, 236: 280-285.

⁴ 时勤, 范红霞, 贾建民, 等. 我国民众对 SARS 信息的风险认知及心理行为[J]. 心理学报, 2003, 35(4): 546-554.

⁵ 杨维, 罗静, 周志刚. 情绪状态、信息关注与地震风险感知研究[J]. 保险研究, 2014(7): 61-71.

⁶ Slovic P, Peters E, Finucane M L, et al. Affect, Risk, and Decision Making[J]. Health Psychology, 2005, 24(4): 35-40.



体问题都有待深入研究；第二，对公众情绪与风险感知之间的关系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共危机事件或公众的个人行为上，针对社会问题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针对雾霾这一环境问题，对雾霾影响下所产生的不同情绪和风险感知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一、理论构建及研究假设

1. 理论构建

葛鲁嘉¹将环境细化为物理环境、生物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和心理环境五个方面。雾霾是一种大气污染现象，因其产生的“雾霾天”属于物理环境的一种，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基于人-环境适应模型可知，环境会影响人的情绪、行为和习惯，人们会被劝服向更为一致的环境转移²。“雾霾天”作为一种物理环境，出现在公众的日常生活中，甚至成为了公众生活环境的一种常态现象，影响公众的情绪、认知和行为。随着研究者对环境保护与可持续性发展的关注，环境心理学家们意识到如果缺少了公众的参与，环境保护与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是无法实现的。在提供公民参与途径时，政府有必要关注公众的情绪、态度、行为变化。

也有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天气和公众的情绪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Schwarz 和 Clore³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晴天接受采访的人比在雨天接受采访的人表示出了更多的生活满足感。Howarth 和 Hoffman⁴把“天气效应”

概括为“天气变量影响投资者的情绪，而情绪会导致投资者有特殊的行为倾向”。还有研究者发现阳光、湿度等是影响情绪的主要环境变量⁵。综上，雾霾作为目前国内的主要环境问题之一，雾霾影响下的公众情绪和行为是不稳定的，具有研究的必要性。

由于互联网平台的情绪分析技术逐渐成熟，国内外学者利用微博、Twitter 等社交软件测量社会情绪，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Bourtte⁶研究了股市与社交软件中公众情绪的关系。赖凯声⁷等通过分析微博选取的情绪词与股市收盘价的相关系数来预测上证股指。这些研究成果都表明基于微博的海量文本分析能够较为科学地反映公众的情绪波动。因此，本文以“雾霾”为关键词在高级搜索功能中进行搜索，结果与对应时间的 PM2.5 值比较，得到的样本数据 T 为 120 天的时间序列。从两条曲线的总体走势来看，包含“雾霾”关键词的微博数量与 PM2.5 值的变化大体相同（见图 1）。本文对两个指数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到其相关性指数 r 为 0.641，在 0.01 水平上显著相关，即采集的微博样本数量与雾霾的天气变化具有相关性。可以看出，从微博中挖掘雾霾影响下的公众情绪方法具有可行性。

¹ 葛鲁嘉. 对心理学研究中环境的理解[J]. 人文杂志, 2007(5): 93-97.

² Fry P S. The Person-environment Congruence Model: Implications and Applications for Adjustment Counseling with Older Adult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unseling, 1990, 13(2): 87-106.

³ Schwarz N, Clore G L. Mood, Misattribution, and Judgement of Well-being: Informative and Directive Functions of Affective State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3, 45(3): 513-523.

⁴ Howarth E, Hoffman M S. A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od and Weather[J].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1984, 75(1): 15-23.

⁵ Allen M A, Fischer G J. Ambient Temperature Effects on Paired Associate Learning[J]. Ergonomics, 1978, 21(2): 95-101.

⁶ Bourtte C G. Daily Stock Market Expectations from Oscillating Social Mood Factor[J]. A New Story Foundation, 2011, 13(1): 35-40.

⁷ 赖凯声, 陈浩. 微博情绪与中国股市: 基于协整分析[J]. 系统科学与数学, 2014, 34(5): 565-5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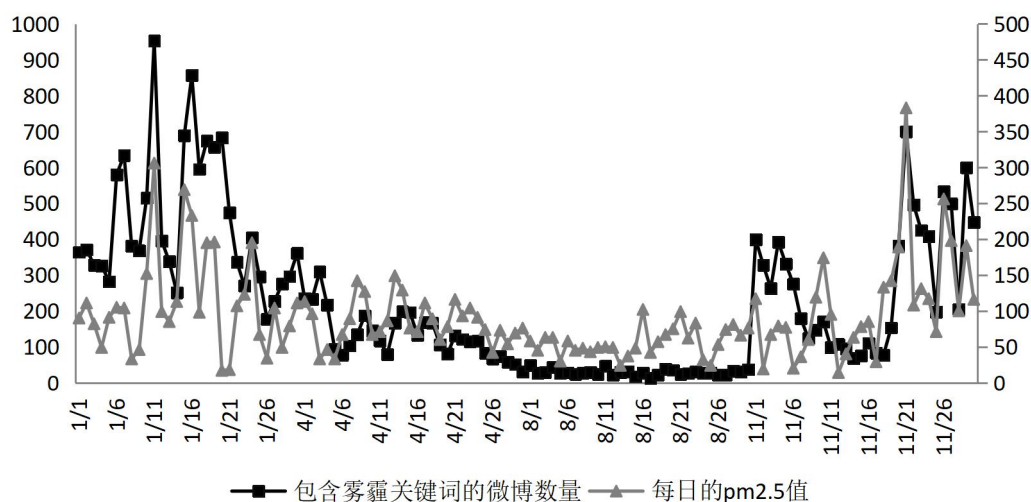


图1 1月、4月、8月、11月（1-30日）微博搜索与PM2.5相关走势

情绪的分类有多种方式，在情绪分类理论取向中，国外学者区分“基本情绪”和“情绪图式”，提出基本情绪包括兴趣、快乐、悲伤、愤怒、厌恶和恐惧¹。在情绪维度理论中，Watson和Tellegen²运用自陈式情绪研究方法，提出了积极-消极情感模型，认为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基本维度。国内研究中，董颖红等³基于情绪结构理论，建立了基于微博的基本社会情绪测量词库，共818个词，分为快乐、悲伤、厌恶、愤怒和恐惧五种基本社会情绪。本研究也采用该情绪划分方法，通过微博的海量数据收集，获得雾霾影响下的五种情绪指数，探究公众情绪与风险感知之间的关系。

2. 研究假设

Slovic提出风险感知的两个主要因素：一是不可控的恐惧风险，二是不可观测的未知风险。而情绪是影响风险感知的关键因素。具体而言，Filep等⁴以旅游业为个案研究发现

快乐情绪和风险感知之间有相关性，越开心的游客的风险感知越低。Johnson和Tversky⁵以效价视角（valence-based perception）划分情绪为正面和负面，检验对风险感知的影响，发现消极的情绪风险感知高于积极的情绪。基于以上研究，提出假设为：H1：公众正面情绪增加会引发公众对雾霾环境的低风险感知。H2：公众负面情绪增加会引发公众对雾霾环境的高风险感知。

Lerner等发现愤怒和恐惧是“9·11事件”中重要的情感因素。评价倾向框架（Appraisal Tendency Framework, 简称ATF）则强调对同一效价的具体情绪进行评估，其假定了恐惧和愤怒对风险感知有不同的影响⁶。也有研究者提出有愤怒情绪的人比有恐惧情绪的人对未来事件有更乐观的评估⁷。基于以

Satisfaction, and Risk Perception[J]. *Tourism Review International*, 2014, 17(4): 283-298.

⁵ Johnson EJ, Tversky A. Affect, Generalization and the Perception of Risk[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1983, 45(1): 20-31.

⁶ Han S, Lerner J S, Keltner D. Feelings and Consumer Decision Making: The Appraisal-tendency Framework[J]. *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 2007, 17(3): 158-168.

⁷ Lerner J S, Keltner D. Beyond Valence: Toward a Model of Emotion-specific Influences on Judgment and Choice[J]. *Cognition and Emotion*, 2000, 14(4): 473-493.

¹ Oatley J L K. The Language of Emotions: An Analysis of a Semantic Field[J]. *Cognition and Emotion*, 1989, 3(2): 81-123.

² Watson D, Tellegen A. Toward a Consensual Structure of Mood[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85, 98(2): 219-235.

³ 董颖红, 陈浩, 赖凯声, 等. 微博客基本社会情绪的测量及效度检验[J]. *心理科学*, 2015, 38(5): 1141-1146.

⁴ Filep S, Klint L M, Whitelaw P, et al. Happiness,



上研究，提出假设为：**H3**：公众悲伤情绪增加会引发公众对雾霾环境的高风险感知。**H4**：公众厌恶情绪增加会引发公众对雾霾环境的高风险感知。**H5**：公众恐惧情绪增加会引发公众对雾霾环境的高风险感知。**H6**：公众愤怒情绪增加会引发公众对雾霾环境的高风险感知。

Finucane 等¹证明了提供关于利益的信息能够改变风险认知，时勘等指出 SARS 疫情信息能够影响个人的风险认知水平。还有学者探讨了信息可信度和地震感知的关系，指出信息可信度能够显著影响风险感知²。基于已获取的数据，本文认为公众对雾霾的关注度能够表示公众获取信息的多少，因此提出以下假设：**H7**：公众对雾霾的关注度增加会引发高风险感知。

二、研究设计

1. 数据的收集与整理

本文选取天津市微博用户为分析对象，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一方面，天津市的大气污染状况堪忧，京津冀城市带是中国雾霾污染的重灾区；另一方面，天津市的微博用户覆盖率较高。本文选取2014年1月、4月、8月和11月进行数据采集，覆盖不同的季节和不同的雾霾污染时段。具体而言，文章采取系统抽样法进行微博语料采集。以1月份搜索为例，首先，选定当月时间段为15至20日，输入“雾霾”为关键词，限定区域为天津，类型为原创，搜索得到12 372条微博，并进行编号；第二，确定样本n为200；第三，确定分段间隔K，根据公式 $k=N/n$ 计算抽取微博的间隔数量，间距为61（12372/200，取整）；第四，按照间距61进行抽取，最终得到200条

微博。其他三个时间段也采取上述方法。最后，本文共得到800条微博、45 595字语料，并使用汉语词法分析系统NLPIR/ICTCLAS（2014版）进行分词，得到情绪词库。

基于微博语料分析，本文共得到 57 个情绪词，但由于表情类符号不能进行进一步搜索，所以剔除后共得到 25 个有效情绪词。本文根据微博基本社会情绪测量词库对所得到的词语进行划分，共划分为五种基本社会情绪，即快乐、悲伤、厌恶、愤怒和恐惧。同时，基于 Watson 和 Tellegen 的积极-消极情感模型，分为正面情绪和负面情绪两大类（见表 1）。基于该情绪划分体系，本文对 25 个有效情绪词进行划分，共得到 16 个负面情绪词和 9 个正面情绪词。

表 1 情绪词划分体系

类型	社会情绪	具体表现
正面情绪	快乐	因雾霾天气好转、自身环境行为等所表达的喜悦之情
	悲伤	对雾霾现状的失望、悲观态度
	厌恶	对雾霾现状的憎恶、讨厌的情绪
负面情绪	愤怒	因雾霾持续存在而引起的恼火、生气的情绪
	恐惧	因雾霾天气引起的对自身健康、安全、生活等的害怕情绪

Pepe 等³通过研究用户给自己未来发送邮件中的情绪来分析人们对未来的态度。他将每一个邮件词汇中的情绪词和情绪词库中的词汇进行匹配，在相应的情绪类型上逐个加分，如邮件中“angrily”匹配为愤怒情绪，在该情绪上加一分。本文也采取类似方法，对分类后的情绪词进行进一步搜集。首先，本文对当天有“雾霾”关键词的原创微博进行判断和清洗，删除冗余信息。然后，通过语义及微博情绪测量词库对相应微博进行划分。如微博中包含“斥责”一词，该词属于愤怒情绪，则在愤怒情绪数值上加一分。最后，文

¹ Finucane M L, Alhakami A, Slovic P, et al. The Affect Heuristic in Judgments of Risks And Benefits[J].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 2010, 13(13): 1-17.

² Zhu D Q, Xie X F, Xie J Q. When do people feel more risk? The effect of ambiguity tolerance and message source on purchasing intention of earthquake insurance[J]. Journal of Risk Research, 2012, 15(8): 1-15.

³ Pepe A, Bollen J. Between Conjecture and Memento: Shaping a Collective Emotional Perception of the Future[J]. Computer Science, 2008, 25(1): 1-6.

章得出当天五种情绪的指数，进行每日的文本搜索和归类，形成五种情绪指数的时间序列。其中“快乐”情绪即正面情绪指数，“悲伤”、“厌恶”、“愤怒”和“恐惧”指数则累加为负面情绪指数。

对于风险感知的测量，国内现有研究主要通过问卷的形式进行测量。问卷调查结果受限于问卷设计、人力、物力及被调查者状态等因素，根据样本进行推断有较大误差。唐锡晋等¹提出用网络搜索行为的频率来表示风险感知，并基于百度新闻热搜词对风险感知程度进行了分析。本文借鉴该测量方法，基于百度新闻热词搜索引擎对搜索焦点进行检索，共得出与环境有高度相关的7个热搜关键词：雾霾、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白色污染、环境污染、保护环境。百度指数平台能够提供每个搜索词的每日搜索热度，笔者对每个关键词的每日搜索指数累加并进行标准化，得到公众对环境的风险感知指数。此外，本文还搜索了有“雾霾”关键词的原创微博，删除无效信息后，微博数量即为当日公众对雾霾的关注程度，连续搜索得出每个月的关注度指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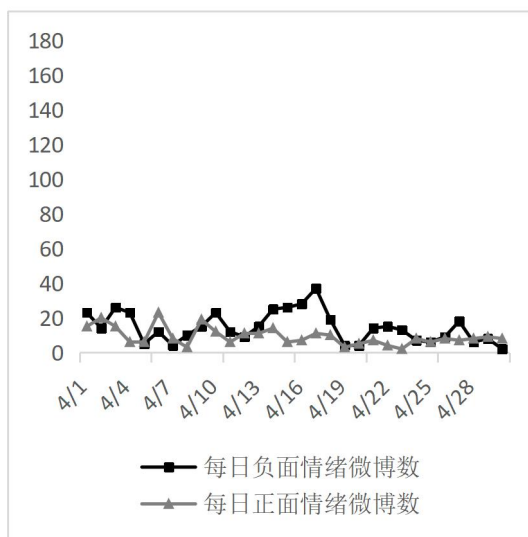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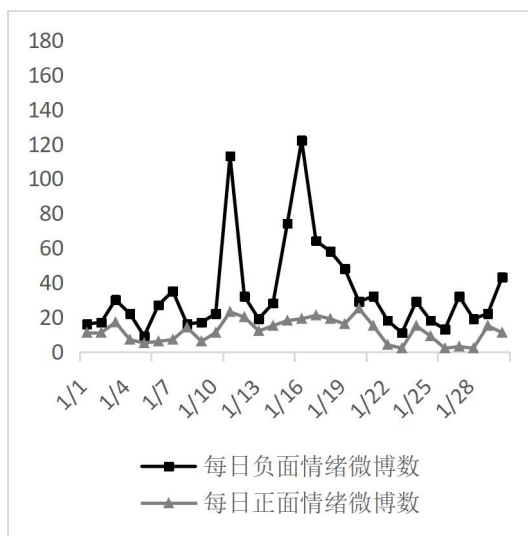
2.描述性统计

本文收集了2014年1、4、8、11月共120天的样本，分别统计了快乐、悲伤、厌恶、愤怒、恐惧五种情绪指数。表2为本文关注的几个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图2为正面情绪指数和负面情绪指数的折线图，可见负面情绪指数在秋冬季波动较大。

表2 描述性统计结果

社会情绪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快乐	1	40	11.90	8.274
悲伤	1	10	1.67	1.176
厌恶	1	12	3.26	2.475
愤怒	1	133	15.52	21.334

恐惧	1	14	2.48	2.654
负面情绪指数	4	160	22.93	26.081
正面情绪指数	1	40	11.90	8.274
风险感知指数	1025	9885	3640.52	2047.836
雾霾话题关注度	12	953	221.42	206.948



¹ Tang Xijin. Applying Search Words and BBS Posts to Societal Risk Perception and Harmonious Society Measurement[C]. Manchester: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s, Man, and Cybernetics, 2013: 2191-21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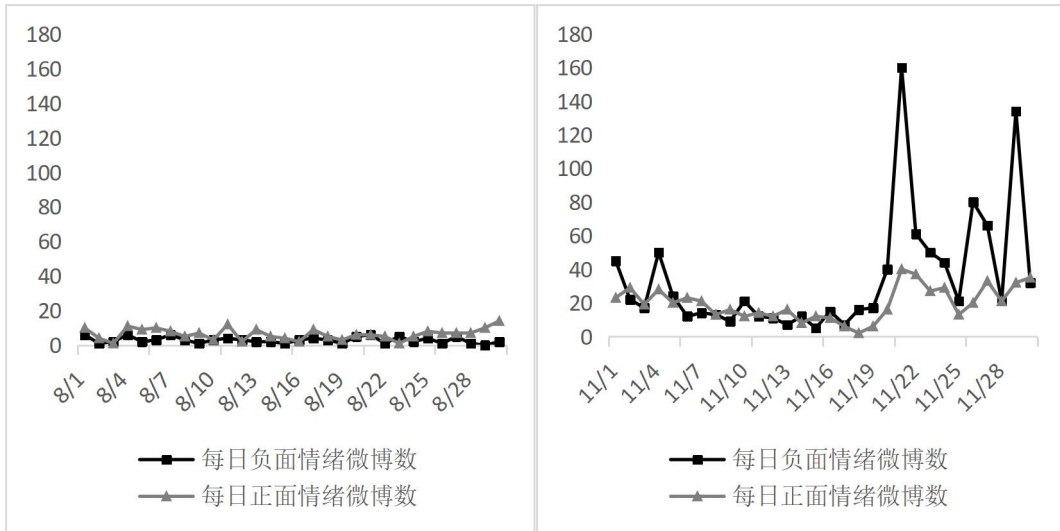


图 2 四个月的负面情绪指数与正面情绪指数折线图

本文将情绪指数与 PM2.5 的指数进行相关性分析。从表 3 中可知，悲伤、厌恶、愤怒、恐惧情绪指数与 PM2.5 指数都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负面情绪指数与 PM2.5 也为显著正相关，而正面情绪指数与 PM2.5 为显著负相关。从图 3 可以直观地看出本文所得到的负面情绪指数随着 PM2.5 的变化而变化，在 1 月和 11 月雾霾非常严重的秋冬季，相应的负面情绪也波动较大。

表 3 PM2.5 与情绪指数的相关性系数

社会情绪	系数
快乐	-0.427**
悲伤	0.575**
厌恶	0.466**
愤怒	0.790**
恐惧	0.581**
负面	0.783**
正面	-0.427**

注：**表示在 0.05 水平下显著，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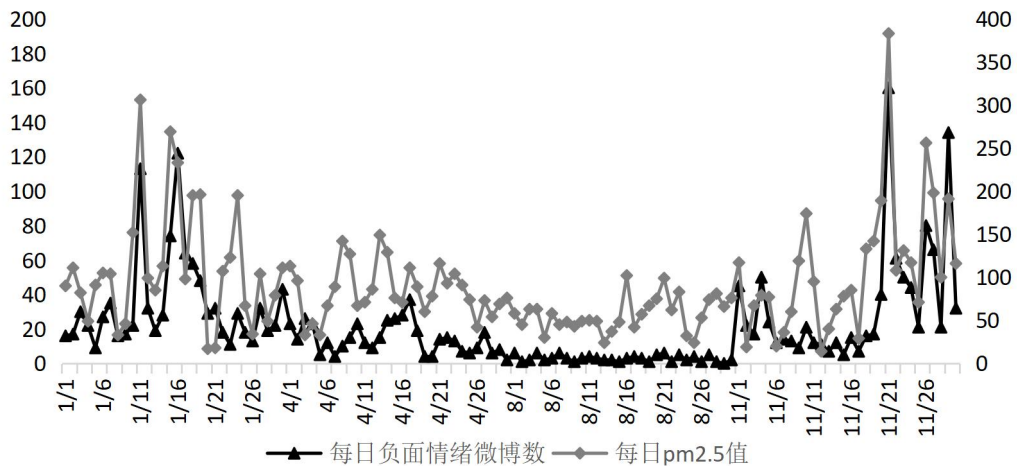


图 3 1、4、8、11 月负面情绪综合指数曲线与 PM2.5 相关走势

3. 雾霾影响下的公众情绪

在进一步分析公众情绪和风险感知的关系前，本文对有雾霾天气时的情绪指数和没有雾霾天气的情绪指数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探究雾霾是否对公众情绪的变化有显著影响。按照国家标准，PM2.5值如果超过75微克/立方米则为雾霾天气。本文对四个月的数据进行划分，雾霾天气共有65天（组1），没有雾霾的天气共有55天（组2）。本文对两组数据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得到sig.值为0.001，小于0.05，故拒绝原假设，即雾霾天气下的情绪和没有雾霾天气下的情绪具有显著差异。因此，雾霾对于公众的情绪是有显著影响的。基于以上结论，本文对雾霾影响下的公众情绪进行进一步分析，探究公众情绪与风险感知之间的关系。

三、分析结果

1. 相关性分析结果

文章对公众情绪与风险感知进行了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4。从表中可以看出，公众对环境的风险感知与公众快乐情绪呈现显著的负相关（ $P < 0.01$ ），而公众对环境的风险感知与公众的悲伤、厌恶、愤怒、恐惧情绪呈现正相关（ $P < 0.01$ ）。公众的环境风险感知与公众的正面情绪显著负相关（ $P < 0.01$ ），与公众的负面情绪显著正相关

（ $P < 0.01$ ）。此外，公众的环境风险感知与公众的雾霾关注度呈现显著的正相关（ $P < 0.01$ ）。

表4 风险感知指数与情绪指数相关性

社会情绪	风险感知指数
快乐	-0.149**
悲伤	0.251**
厌恶	0.617**
愤怒	0.668**
恐惧	0.581**
负面	0.684**
正面	-0.149**
雾霾关注度	0.756**

2. 格兰杰因果关系分析

本文希望通过公众情绪和风险感知之间的格兰杰检验来深入探究二者之间的关系。文章首先对五种公众情绪和风险感知指数之间进行了单位根检验（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简称 ADF 检验），检验时间序列是否为平稳序列。通过对五种公众情绪的 ADF 检验，文章发现快乐、悲伤、厌恶、恐惧情绪，以及风险感知的时间序列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不存在单位根，可直接进行格兰杰因果分析。而愤怒情绪的时间序列存在单位根，为不平稳序列，因而笔者对愤怒情绪进行一阶差分后再进行 ADF 检验，结果显示在 1% 显著性水平下不存在单位根，为平稳序列（见表 5）。

表5 公众情绪（分类）与风险感知的 ADF 检验结果

变量	ADF统计值	1%临界值	5%临界值	10%临界值	结论
快乐	-4.365641	-3.486064	-2.885863	-2.579818	平稳
悲伤	-9.626359	-3.486064	-2.885863	-2.579818	平稳
厌恶	-4.288894	-3.486551	-2.886074	-2.579931	平稳
愤怒	-1.779383	-3.488063	-2.886732	-2.580281	非平稳
恐惧	-4.563754	-3.486551	-2.886074	-2.579931	平稳
风险感知	-3.361891	-3.486064	-2.885863	-2.579818	平稳
D愤怒	-9.754410	-3.488063	-2.886732	-2.580281	平稳

注：D表示一阶差分，下同。



文章在进行了ADF检验之后，为了避免变量之间的伪回归，对五种公众情绪与风险感知之间进行协整检验，探究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基于Eviews的检验结果，根据迹和最大特征值中的原假设所对应的P值看，结果在0.05的显著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即快乐情绪和风险感知、悲伤

情绪和风险感知、恐惧情绪和风险感知、愤怒情绪和风险感知、厌恶情绪和风险感知之间都是长期稳定的关系，但这种关系是否是一种因果关系，需进一步做格兰杰因果检验。

为了确定最优滞后期，本文通过建立方差模型，并根据AIC和SC取值最小准则来确定阶数。根据Eviews分析结果，五个关系的最优滞后期为滞后2期，因此，文章对滞后2期的五个关系进行格兰杰检验。在滞后2期情况下，快乐和风险感知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悲伤和风险感知在0.01显著性水平上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悲伤是风险感知的格兰杰原因；恐惧和风险感知在0.01显著性水平上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恐惧是风险感知的格兰杰原因；厌恶和风险感知在0.01显著性水平上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厌恶是风险感知的格兰杰原因；愤怒和风险感知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见表6）。

本文进一步对公众的正面情绪、公众的负面情绪、公众对雾霾关注度与风险感知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首先，对正面情绪、负面情绪及雾霾关注度进行ADF检验。从检验

表6 公众情绪（分类）与风险感知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滞后期	原假设	F统计量	P值	决策
2	快乐不是风险感知的格兰杰原因	0.34330	0.7102	接受
	风险感知不是快乐的格兰杰原因	0.0937	0.8521	接受
2	悲伤不是风险感知的格兰杰原因	6.39709	0.0023	拒绝
	风险感知不是悲伤的格兰杰原因	0.19028	0.8720	接受
2	恐惧不是风险感知的格兰杰原因	12.9138	0.0005	拒绝
	风险感知不是恐惧的格兰杰原因	0.08029	0.7774	接受
2	厌恶不是风险感知的格兰杰原因	16.6166	0.0001	拒绝
	风险感知不是厌恶的格兰杰原因	0.02440	0.8761	接受
2	愤怒不是风险感知的格兰杰原因	0.51763	0.5973	接受
	风险感知不是愤怒的格兰杰原因	0.63176	0.5335	接受

结果可知，正面情绪、雾霾关注度的时间序列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下不存在单位根，负面情绪在一阶差分后也不存在单位根（见表7）。根据协整检验结果，正面情绪、负面情绪、雾霾关注度与风险感知之间都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参考AIC和SC取值最小准则，正面情绪、负面情绪、雾霾关心度和风险感知之间的最优滞后期为2期。因此，文章以滞后2期为标准进行格兰杰检验。

表7 公众情绪（广义）与雾霾关注度的ADF检验结果

变量	ADF统计值	1%临界值	5%临界值	10%临界值	结论
负面情绪	-1.691113	-3.486063	-2.886732	-2.580281	非平稳
D负面情绪	-9.825705	-3.488063	-2.886732	-2.580281	平稳
正面情绪	-4.365641	-3.486064	-2.885863	-2.579818	平稳
雾霾关注度	-3.534167	-3.486064	-2.885863	-2.579818	平稳

根据 Eviews 检验结果, 在滞后 2 期的情况下, 负面情绪和风险感知在 0.05 显著性水平上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 负面情绪是风险感知的格兰杰原因。正面情绪和风险感知在 0.05 显著性水平上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 风险感知是正面情绪的格兰杰原因。雾霾关注度和风险感知在 0.05 显著性水平上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 风险感知是雾霾关注度的格兰杰原因 (见表 8)。

表 8 公众情绪 (广义)、雾霾关注度与风险感知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滞后期	原假设	F 统计量	P 值	决策
2	负面情绪不是风险感知的格兰杰原因	0.52 2.47	0.00 1.09	拒绝
	风险感知不是负面情绪的格兰杰原因	10.0 87.80	0.47 1.20	接受
2	正面情绪不是风险感知的格兰杰原因	0.34 3.30	0.71 0.20	接受
	风险感知不是正面情绪的格兰杰原因	10.0 93.70	0.00 0.70	拒绝
2	雾霾关注度不是风险感知的格兰杰原因	0.15 2.21	0.96 1.60	接受
	风险感知不是雾霾关注度的格兰杰原因	2.49 3.68	0.04 7.20	拒绝

根据相关性分析和格兰杰检验结果可知, 公众的正面情绪和风险感知呈负相关关系, 且风险感知是公众正面情绪的格兰杰原因, 即风险感知变高会引发公众正面情绪的下降, 因此 H1 不成立。由此可知, 正面情绪的变化对于风险感知并没有直接影响, 正面情绪减少或增加并不能有效地预测风险感知的变化。公众的负面情绪和风险感知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且负面情绪是公众环境问题风险感知的原因, 因此 H2 成立。可见, 负面情绪的变化能够有效地预测风险感知的变化。公众的悲伤、厌恶、恐惧情绪都和风险感知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且悲伤、厌恶、恐惧情绪都是环境问题的风险感知的原因, 因此

H3、H4 和 H5 成立。在雾霾的影响下, 公众的悲伤、厌恶和恐惧情绪的增加, 能够提高公众对环境问题的风险感知程度, 这与地震、非典等公共危机事件中研究的结论相符。本文认为当这类负面情绪增加时, 推动公众对于雾霾等环境问题的理性思考, 进而会提高公众对环境问题的风险感知程度, 对其进一步的决策行为也存在着潜在的影响。公众的愤怒情绪和风险感知之间有正相关关系, 但愤怒情绪和风险感知之间并没有格兰杰因果关系, 因此 H6 不成立。本文认为愤怒情绪能够引发公众的非理性思考和行为, 并不能引起公众对环境问题风险感知程度的增加。公众对雾霾的关注度和风险感知之间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雾霾关注度不是风险感知的格兰杰原因, 因此 H7 不成立。然而, 风险感知是雾霾关注度的格兰杰原因, 即公众的高风险感知能够有效预测公众对雾霾的关注。本文认为公众的环境风险感知增加会引发公众对这一问题的注意, 进而能够提高公众对于雾霾问题的关注度。

四、结论

基于以上分析能得到以下结论: 雾霾的变化会显著影响到公众情绪的变化, 雾霾影响下的公众情绪和公众的风险感知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公众的正面情绪与风险感知呈负相关关系, 公众的负面情绪与风险感知呈正相关关系, 公众的愤怒、悲伤、恐惧、厌恶都与风险感知呈正相关关系, 公众对雾霾关注程度也与风险感知呈正相关关系。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表明, 在最优滞后期即滞后 2 期情况下, 在 1% 显著性水平上, 公众的悲伤、恐惧、厌恶情绪为风险感知的格兰杰原因, 快乐、愤怒情绪不是风险感知的格兰杰原因; 在 1% 显著性水平上, 公众的负面情绪为风险感知的格兰杰原因, 风险感知是公众正面情绪的格兰杰原因; 在 1% 显著性水平上, 风险感知是公众对雾霾的关注度的格兰杰原因。



近年来，随着大气污染的严重化，雾霾现象已经影响到了人们工作、生活及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本文紧跟社会热点，以微博为收集数据的平台，对雾霾影响下的正面情绪和负面情绪进行了分类研究，深入探究了公众情绪和风险感知之间的关系，能够更好地了解雾霾对公众情绪的影响，以及公众对环境风险感知的变化。在雾霾治理过程中，公众的情绪和风险感知也是重要的考虑因素。政府有必要转变治理雾霾的观念，重视公众的情绪和态度变化，寻找推动公众形成客观

理性的环境风险感知水平的政策措施，进而为公众提供更多有效的政策参与途径。具体来说，在制定治理雾霾的政策、措施过程中，政府需要把控公众的情绪和态度，并将公众参与纳入到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来。



（摄影：姜子禹）

《大城养老——上海的实践样本》读书笔记

杨帆

人物小传：

杨帆，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助理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老年精神健康、社区长期照护、城市贫困。

《大城养老——上海的实践样本》一书由上海市民政局组织出版，由于有较强的可读性和实务操作指导性，在当前养老行业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受到了包括研究人员、行业从业者以及普通百姓的广泛关注，初次出版后不到两个月即再次加印，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本书通过13组养老故事、40年前行轨迹、80个基层实践样本，勾勒出上海的养老全景，并提出了破解大城养老困局可行的探索方案，既为国内其他城市的养老服务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板，同时也为养老社会政策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素材和方向。



养老机构的发展：让养老床位附着上一种生活方式和期待。

根据规划，上海要在“十三五”期间新建成3.4万张床位，使全市养老床位总数在2020年达到16万张。市政府将此刚性指标在各区间进行分解，强调新增床位没有回旋余地，并积极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养老床位建设。各方的参与促进了养老机构在建设方式、运营模式、服务类别方面的多元化，使养老院的核心理念从“老年人了此余生的去处”升华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期待”。同时，本书还提出，这种理念的提升还应该包含公平理念，即保证市中心和郊区的养老资源分配的公平、保障失能失智老人获得适当的养老服务。

社区养老的发展：嵌入式、专业化、集约化是大方向

上海于2000年在全国率先提出“居家养老服务”概念，其内涵是“以家庭为核心、以社区为依托，以老年日间照料、生活护理、家政服务、精神慰藉为主要内容”。经过十七年的发展，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已经覆盖了全市各个街镇，并在村居委都有相应的服务支撑点，每年为30多万老年人提供各类服务。但在深化发展的阶段，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向更具含金量的生活照护、专业配餐、心理咨询、康复理疗等服务深耕时遇到一定的瓶颈。在应对这些状况时，上海市推出了长者照护之家、社区护理站，以及带有综合性质的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等养老服务组织形式。这些机构的特点就是嵌入社区之中，强调专业为老服务能力，如失能半失能老人护理、老年医疗服务、照护者喘息服务、中风骨折康复服务等，而不仅仅停留在“买汰烧”和文娱活动层面。根据规划，上海将在全市建成200家以上的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将其作为枢纽型设施，与其他养老服务设施进

行联动，形成“一站式综合服务”、“一体化资源统筹”、“一门式业务受理”，以及借助科技助老平台实现“一网覆盖的信息管理”，进而打造10-15分钟的资源高效集约利用的养老服务圈。

老年友好型城市的发展：社区与社会力量是载体和抓手

上海自2013年开始创建老年友好型社会，其中最重要的载体就是社区、最重要的抓手是各种社会力量。本书中概括的郊区农村留守老人的“四不离”，即不离乡土、不离乡邻、不离乡音、不离乡情，就需要依托强有力的在地互助式养老安排；而城市社区中的非正式照料体系，也离不开由“老伙伴”计划、社区睦邻点等项目动员起来的专业或半专业人士的支持。上海在城乡地区因地制宜发动起来的助老、为老网络，极大解决了老年人对紧急援助和社会交往的需求，也帮助很多“年青老年人”实现了晚年人生的价值。这些行动的背后是全社会一种互助和慈善接力的氛围的营造，也正是老年友好型社会的应有之意。而在一个更为直接的层面上，上海也在探索通过城市的适老化改造来提升老年人日常生活的半径。其中主推的项目包括无障碍生活、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房屋适老化改造等。这些适老化改造的辐射半径逐渐从住宅楼拓展到社区、街区乃至整个城市，并作为新型为老服务而悄然改变着养老公共服务的供给。

医养结合的发展：不断突破“资源壁垒”

医养结合是中央政府制定的一项国家战略，其基本意涵是养老设施布局与医疗设施通盘考虑、就近安排，并鼓励有一定规模、新建的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以及支持医院办养老院。但在实际中，二者资源的打通遭遇了诸多制度层面和实践层面的壁垒。作为首先倡导养老服务与医疗服务相结合的城

市，上海在2015年实现了首批50家养老机构的内设医疗机构的医保联网和“三段结算”，最终为“医养结合”政策的落地扫清了顶层设计方面的障碍。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医养结合还需要开启新一轮变革，尤其是要打通协调好政府部门之间的利益关系，使民政、卫生计生、人社等部门共同参与到资源破壁的规划当中，从而推动医养结合的实质性进展，当前来说，比较突出的合作领域是护理站、护理床位等的建设。

供方与需方的改革：护理专业人才培养与老年照护需求评估

在目前上海养老服务的供给侧，护理专业人才短缺是一个尤其急需政策改革介入的问题。根据2016年发布的《上海养老服务发展报告白皮书》，到2020年，上海需要新增7.8万养老护理员，而当前全市总共才5万护理员，人才缺口之大、需求之急，由此可见一斑。为达成这一目标，上海提出了三条主要途径，即通过中高职

养老护理专业教育培养、引进外省市养老护理专业毕业生，以及培养录用外省市来沪从业人员和上海户籍劳动者从事养老护理工作。但值得注意的是，护理人员数量的增长能否带来服务质量的真正提升，这一点尤其反映在在失能失智老人的照护上。根据预测，目前上海共有失能失智老人63万，其中

失智老人30万。这些老人的护理过程漫长而艰辛，需要较高的护理技能和专业精神投入。

而在上海养老服务的需求侧，对每个老年个体的养老服务需求进行科学评估则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它关系到养老服务资源的有效分配和利用。为此，上海市推出了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制度，而该制度的重点在于“统一”，即统一使用一套标准来评估老人的照护需求等级，然后根据评估结果，将有需求的老人分别转介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保基本养老服务和护理院服务等



层次。但目前实施过程中，在标准科学性、评估员队伍建立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亟待部门更加有效的沟通和协同。

养老产业的“风口”：科技助老项目和养老地产

本书还介绍了养老产业与科技和地产资本的结合。它与科技的结合缔造了“智慧养老”模式。目前上海市各级政府都在搭建智慧养老平台，为老年人提供急救配送货品、家电维修、代理代办等有偿或低价服务，力求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配以周全的人力服务来打造一种全新的服务模式。这在当前上海独居、空巢、高龄和纯老家庭比例不断增高的背景下显得尤其有意义，能够让这些相对弱势的老人在依靠传统的子女赡养、入住机构外，选择更有自由度的居家养老服务，并降低照护者的压力和提升服务的精准度。而养老与地产的结合则导致了诸多养老地产开发模式的出现。它们一方面丰富了养老业态，另一方面也推动着养老服务监管体系的完善。

纵观全书，编者舍弃了自上而下的大视角回首历史，而是聚焦基层，特别是街镇社区和实务机构，观察和梳理了近四十年来上海养老改革发展的实践。全书十三章以及

遴选的80个实践样本，从不同角度为读者讲述养老发展的故事，从微观层面探求大城养老的发展路径、应对方法和工作成效。同时，它也激发读者们进一步去思考上海养老服务发展中的一些关键性问题。在养老机构发展方面，上海在下一步大量增加养老床位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如何应对愈加棘手的“养老邻避”问题；在社区养老服务发展方面，政策界和实务界可能需要更多考虑如何将综合为老服务中心的服务专业性加以发挥，避免低专业性服务的复制扩展，导致养老服务“内卷化”；在老年友好型城市建设方面，如何培育和充分激活相应的社会力量可能是关键；在医养结合的深入发展过程中，如何打破不同政府部门和行业间的壁垒，上海还需要更多的探索，建立一个更高层面的统筹机制；在养老服务供给侧和需求侧改革方面，养老护理人员大跃进式培训和上岗如何带来实际服务能力的提升是关键；而在养老产业发展方面，如何避免“为科技而科技”，避免科技助老产品脱离老人及其家人的心理特质，以及形成良性可持续的老年住区商业模式，是上海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都需要探索的。



中国政治的变与不变——读《中国政治》

陈雨雁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本科生

浅读《中国政治》，惊叹于美国学者詹姆斯·R·汤森对于中共数十年历史的冷静审视与客观分析。现代化是20世纪绕不开的话题，并似乎总与“变”字相关，全文以时间线索构建起的中国政治充斥着“革命”的破旧与“改革”的维新。但其中的政策主张与理论依据，似乎又是“万变不离其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虽是全书论述的重点，但作者依旧不偏不倚，从更加客观的政府运作角度进行分析。而中国政治的变与不变，就在不断变化历史的洪流与延续恒久的政治传统中展现。

全书的知识点非常丰富，充满各种现代政治学研究通行的理论范式与基本架构，当然亦包含尚有争议的内容。下仅从中央与地方关系及政治文化与表达两方面小谈对于书中所提到的相关问题的见解。

一、中央与地方关系：大一统国家绕不开的话题

自秦以来，各大王朝盛世无不是建立在幅员辽阔的帝国及与之配套的官僚体制的基础之上。无论是秦时期的郡县制亦或是元以后的行省制度，都强调中央政府为了管理广袤的帝国的各种制度设计。地方政务繁杂不可面面俱到，但若轻易放权却有“分裂”的危险。中国千百年来的人治传统在地方与中央之间的关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从书中可知，在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中，地方政治体系的自主性只是一种出于行政效率和保守理由而设置的操作上的安排，并非真正的地方分权或自治，因为中央始终掌握着绝对的权威和最高决定权。从中央至地方的“金字塔”型结构固若金汤，即使一个王朝被内外部力量摧毁，新建立的政权依旧会按照前朝建立起相类似的政治架构，并且更加强调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即使是在今日的中国，我们依旧看到了地方及基层自治的战兢兢、如履薄冰。

战兢兢、如履薄冰。一个全能的政府对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控制可以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体现。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所以不同于之前的历代封建王朝，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在于对于地方基层政治的“再构造”。这从某种程度上也许改善了千百年来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毛为代表的领导人团体深谙地方社团通常比中央政府更能赢得人心的道理，故无论是解放前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亦或是解放后的“大跃进”，无不是成功地发动地方群众以达成中央的目的。正如文中所说的，“这些早期运动扩大了群众组织，建立了宣传网路，吸收了新的积极分子和党员，清除了反对者并创建了新的社会关系，因此大大加强了共党的政治整合。”这一种群众运动虽然明面上看似是一种群众利益“有组织”的表达，但根源上依旧是党中央对于群众意识形态的灌输。这一种中央对于地方及基层组织的支持实则仍是“动员-巩固”的循环往复。类似于“儒学”之于仕途发展，但这一种控制是成功渗入到各个基层组织中的，而不是传统社会中对于群众的疏远。

但这一种控制依旧是有积极效应的，党一贯坚持的“群众路线”在达成了对组织的控制的同时又激发了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政治动员为社会主义建设铺平了道路”，这一种发动群众的形式带来的活力可以从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专业户制度”之中体现，而经济层面计划经济带来的“超级工程”与市场经济带来的“中国奇迹”也充分体现了集权与分权间的权衡带来的最高效益。在确保稳定的基础上，适当放权，想必未来中国发展中“发动群众力量”去做的事情不仅仅只有经济。

二、熟悉词汇中的中国政治文化

本文中对于政治的社会化与传播及政治文化部分的描写是十分有趣的，无论是建国之后对于家庭内部角色的再构造，亦或是革命精神的传播与教育，以及中国独特的“官场文化”与“行政之要”，其中所包含的习以为常的词汇背后的深厚含义，可以说让我从另一个角度了解了中国政治。

从最小的“离婚”说起。中国社会的变化之快令人无法想象，中国竟是在80年代才允许以感情破裂为基础的离婚。书中将家庭与国家政治的联系视角非常独到。婚姻法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台的第一部法律，最初竟是以削弱亲缘组织权力为目的开展的。文革前对于家庭意识形态的控制与“革命化”到文革后适应经济繁荣而更大程度容忍的个人对物质化的需求，每一个小小家庭的幸福稳定竟都囊括在国家的整体政策之下，着实令人感慨。

而在教育方面，正规教育，即九年义务教育的扩大，让普通公民增长了政治技能，文化水平和知识，从而产生了一个具有重要政治影响力，相对年轻的广泛的中间阶层，以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新的活力。中共早期对于意识形态的传播与教育是非常成功的，这让每一个普通公民都认为接受这些意识形态的教育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一系列的政治专业术语，如“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人民内部的矛盾”等可以说是耳熟能详的。当然，新时期动员形式也需要适应新的变化。今日政治文化传播的途径已经开始迎合新时期的需求潜移默化地以全媒体的形式融入到社会生活中去了，仅以几个目的性较为明显的教育性尝试为例，无论是类似于“共青团中央”、“江宁公安在线”等的互动形式，亦或是“人民的名义”、“打铁还需自身硬”之类的雅俗共赏的文化产品，“喜闻乐见”的形式下依旧是一种对于公共舆论引导性的尝试。

从中国官场“潜规则”这一个角度，作者对于中国行政组织的评价则十分犀利：“（官僚机构）不为人民服务，其问题不是太多的资本主义，而是太多的封建主义。”在特殊的上下级关系下，下级官僚向较高级的官员反应群众要求，另一方面也不需要显

示民意以便促进所谓群众利益，以晋升为目的的各政府工作人员在基层展现出“千人一面”的性质，一团和气；而通向决策者的门路、人事关系这两项政治资本的重要性使得“走后门”成为了“中国特色”。门路和关系的重要性导致许多职位都由攀爬关系网而争得，亦是产生了“中国特色”的“关系”文化。以“权力”为诱惑，从地方向中央的晋升机制带来的是整个官僚机构的完全效忠，但也使得干部们过于看重头顶那顶“乌纱帽”，在上司及重大决策面前小心翼翼，而对于自己的下属和“群众”，又总喜欢摆弄自身的“特权”。正如作者所云，在层层加码的行政组织体系中，“每一个官员都是他上司的铁砧和他的下级的锤子”。虽说现在党风廉政建设轰轰烈烈，但老百姓依旧喜欢以“XX帮”、“XX派”的政治利益关系与冲突来调侃官员的落马与晋升，中国式关系的影响，一时还难以散去。

三、几点疑问与思考

通观全文，作者对于中国中央及地方的政府组织形式及政治表达等方面的列举对于全方面了解中国的党政架构与关系都是十分友好的，对于中共的发展历史及几个重大历史转变时期的历史综述也十分清晰简要。但其中如“宗派主义”、“输入-输出”等概念的论述则看得有些云里雾里，并不是很明白。

可以看到的是，作者将“中国模式”等同于“毛泽东主义模式”，也许符合西方惯例，但对于我国现今的实际情况来看，似乎有所不妥。全篇看下来，也没有搞明白“毛泽东主义”究竟是怎样的一种“主义”，其中的浪漫的理想主义的确存在于各个群众运动中，但毛在其中的实际作用究竟如何？书中有涉及党派纷争与“宗派主义”之类，将国家政治等同于个人之间的利益斗争，作为中国读者，亦有些无法接受。再者，仅以大学生本科必修的《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例，其中就已经强调“毛泽东思想”的非个人主义。

但依旧要强调，作者对于一些涉及主观态度的问题时较为的客观立场及严谨、全面的治学态度是令人赞叹的；作者通过建立一个研究框架的方式所提出的对于中国现实问



题的冷静思考，亦是有温度的。官僚主义之后会是什么？党政之间的关系如何调和？权力的边界又在何方？新的开放的时代带来的是中国公民的第二次政治意识的觉醒，互联网时代下使得利益的表达变得更加容易。仅以今年上演的几次网络舆论高潮来看，群众运动的发起似乎已经转移了阵地，进入了一片新天地。在如此新形势下，以往的国家作为“家长”的合法性又该如何维系？也许毛给了我们一些思路，也许历史给了我们一些教训。

正如开篇所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是不断地否定过去，但“叛离过去从某些方面说也许仍然是传统所致，从而代表了与中国历史的联系，而不是决裂。”中国政治的

变化在今天看来确实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但其中长久不变的政治“惯例”却依旧可以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看到，时不时便是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话题。

“读史可以明鉴”，近300页的“干货”对于我今日观察中国政治社会有了新的视角与全面的认识。“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中国政治的独特性令无数学者神往，而居于其中的我却似乎如此“远离政治”，对中国政治生态发生如此巨大变化的当下感到漠不关心。“两个一百年”计划似乎近在眼前，中国政治生活究竟会发生何等“翻天覆地”的变化，要明“往昔”，亦要看“今朝”。



（陈雨雁（左））

生于无印，长于无印

——走近无印良品董事长金井政明

李瑞琪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本科生

摘要：拿掉商标，去掉一切不必要的加工和颜色，提醒人们去赏析原始素材和质料的美感，这就是MUJI无印良品独特的精神内涵，以“物有所值”为宗旨并研发出各种优质的商品，而作为无印良品的掌门人，金井政明先生浑身上下都渗透着这个日本品牌朴实的经营哲学，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理念而操劳着，但他的理念却是追求生活的慢节奏和朴实的人生。

一、金井政明简介

在日本国内，倘若要问谁是最了解无印良品的人，那么答案一定非金井政明莫属。对金井政明来说，无印良品（MUJI）就像自己亲生子女。在过去20年时间里，金井政明亲眼目睹了无印良品从跳跃到摔倒，再到艰难爬起的全过程，一切过往都已深入他的脑海。可以这么说，没有金井政明，就没有现在的无印良品。



（一）生活中处处彰显对细节的苛求

正如本读书报告封面上的照片一样，这是一个仅有19个客房的精品酒店，高四层，由一幢建造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日本住所改建而成，设计理念基于“新旧”的融合，原有的混凝土结构被保留还原，八十多年历史斑驳随处可见，天台则由带着青苔的红砖铺

地。这个低调古朴的酒店就是金井政明下榻的酒店，选择这个酒店的理由本是为了迎合金井政明的喜好，但是金井政明对此却仍颇为不满，他认为这种对古朴简单的东西进行改造的特点与无印良品十分相似，但是仅仅家具的设计就汇聚了包括丹麦、米兰、日本的五六位设计师的设计思想，对此，金井政明评论说：“这里为了更加突出设计感，过度地把一些破的东西留了下来，过度地把各式各样的设计掺进来，这跟无印良品不一样。我们还是更自然，而不是特别做作的‘加强型’。”

正是由于这种对细节的吹毛求疵，无印良品一直是由外而内构建品牌，从内而外管理品牌的全球最佳中型企业典范。他将“理念”看得无比之重，而且极度注重理念到产品设计、店面陈列的一致性，这种对于细节近乎偏执的追求，使得无印良品在没有logo、广告、代言人、海量宣传册，甚至没有任何繁复多变的形象设计的情况下，业绩依然高举同业前列。

（二）打造如水般的“无印良品”

“无印良品想要成为像水那样的存在。水虽然不拥有酒那样的魅力，也没有香水那般奢华，但只要日积月累，就能击碎岩石，有时甚至能够削平大山。”金井政明在2014万科春季例会上所做演讲的展示稿上写着这样一句话，同时，他进一步解释道：“现在很多企业想发展酒那样的公司或者香水那样的公司，这是因为酒有香味，但是我们的目标不是这样，我们的目标是像水这样，培养生于无印，长于无印的优秀人才。”

正如金井政明所形容的一样，无印良品没有商标、广告、代言人、海量的宣传册，甚至连稍微复杂一点的形象设计都找不到，就像是一杯平淡无奇的纯净水，但“这杯水”却能够实现业绩的飞速增长。

（三）漫天的火焰里是对卓越的追求

2001年夏季，在日本新泻县的垃圾焚烧场，伴随着熊熊火光，无印良品价值38亿日元的库存产品被付之一炬。事情的起因是由于优衣库等平价同业的兴起，无印良品的产品被研究，因为大量相仿的产品低价出售导致无印良品发展受挫，金井政明和前任社长松井忠三一起做出烧毁存货重新制造的决定。

熊熊大火烧去了员工骄傲自大、停止革新的状态，促使他们找出造成库存的原因，保证以后不再产生“垃圾”。余烬的威力是巨大的，正如大火中他释然的眼神，重新燃烧起来的无印良品很快从谷底反弹。只因为对卓越的追求，他不惜放弃眼下巨大的利益和巨额的的管理费用，这只是他在这条名为简单朴实的路上操劳的缩影。

为了应对无印良品的困局，金井政明和前任社长松井忠三开始走访日本国内的107家分店。他们在下班之后，将各地门店的店长约至当地的居酒屋内进行面对面交谈。虽然两人对每一位店长都抱着极大的诚意，但起初几乎没有人信任这两个新上任的领导。直至一年后，这些无印良品的一线员工才逐渐卸下心防。

通过改革，无印良品的核心竞争力已从“廉价”转向了深掘日式生活形态的“设计”。与此同时，松井忠三冷静果敢的管理风格也对金井政明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金井政明曾说：“我从松井那里学到很多工作方法，也学会了柔软，而不再像过去那么粗暴行事。”

（四）追求“这样就好”

“过分消费会导致很多淳朴的东西慢慢消失。作为流行的对立面，无印良品所追求的是长久耐用、具有高度普遍性的设计及材质、恰当的价格，而不会增加有很强嗜好性的设计和颜色。”金井政明如此说道。

“这样就好”的理念将价值赋予可接受的质量：节制、让步以及超然的理性，可称之为“全球理性价值”，一种倡导以极端理性的视角使用资源和物体的哲学。无印良品理念指出的是日常生活的‘基础性’和‘普遍性’。”而这也是无印良品自创立以来，

就一直秉持的经营理念。

二、对话金井政明



2016年1月13日上午，无印良品董事长金井政明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做客励志讲坛，为同学们带来了题为《基于企业理念的经营管理》的讲座。

笔者非常荣幸能够成为那一期讲座的主持人，在金井政明先生演讲结束以后，对其进行了一次深入、具体的访谈。

在讲座筹备的阶段，无印良品的团队对讲座的每一个细节重视到了极致，大到视频的播放问题，小到logo的size，他们都要反复检查，生怕出现任何问题，直到现在，当我阅读了《无印良品的育才法则》和《解密无印良品》时，我才明白，无印良品的整个企业对于细节的重视可谓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厚厚的2000页无印指南MUJIGRAM包含了从店铺经营到商品开发、卖场展示和服务等一切工作的专业知识规范。

初见金井政明先生之时，他穿着笔挺的西装、打着领带，不苟言笑，但是待人接物、举手投足之间非常有礼貌，看上去是一个很和善的人。当他跟我眼神交流、点头示意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很温暖、很自信的感觉，笔者一直都是MUJI无印良品的粉丝，现在当这个品牌的董事长站在我的面前时，那种幸福感和崇拜感简直油然而生！

在讲座的开始阶段，金井先生在以环境问题举例时，说：“环境问题归根到底还是人类的问题。”他指出了目前人类社会存在的资源枯竭、环境污染、交通、高龄化社会和福祉等一系列问题，以此提出当下社会人们过度追求幸福和舒适，而忽视了自然简朴

的生活方式。随后，他结合无印良品的企业理念解释了无印良品如何追求生活的质朴和纯真，也向到场观众展示了如何挖掘生活中的点滴细节，返璞归真的生活方式。

金井先生几次提及**无印良品只是一个小企业，并不想成为多么大的企业**。他以中国古代的文字“竞”、“争”向观众们展示了竞和争的不同，他说：“无印良品的员工在开会的时候时常不知道自己的竞争对手是谁，我们只是想做更好的自己，我们的目标是为社会提供更好的产品。有的厂家竞争靠的是服务、是价格，而与香奈儿和LV一样，无印良品立足靠的是**绝对价值而非相对价值**。”期间，金井先生还谈笑说可以和上海交通大学合作改造学生宿舍楼，金井政明先生幽默的谈吐使整场讲座的氛围都非常轻松愉悦。



金井政明先生从四个角度分析了无印良品与其它品牌与众不同地方：

（一）回归生活的本真

老子曾言：无之用，无用。我们觉悟了是否能把生活中简朴、简洁、细微和周到调和起来，这样我们的生活是不是会更美好。但是一般看到碗，瓷器，大家会觉得很贵，或者形状好，或者颜色漂亮。但老子讲的并不是外表看到的东西，他认为当中**空的部分**才是最重要的。因为有了空间才可以把东西放进去，这个空间才是为我们所用的地方。东京的住房很小，上海也是。其实空间是最重要的，住在一个很小的空间，不停地塞很多东西，不知不觉把家都塞满了。而家的空间才是最有意思，最让人感到快乐的地方，却不知不觉被废掉了。

（二）重新认识传统文化

人类会通过科学进步提供这样的生活条件，但单单靠科学进步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改进生活的方方面面，否则是没办法满足那么多人的需求的。现在日本的人口正在不断地减少，而我们想要回到过去，制造过去那种让人感觉富足的生活。全球化很快，你在各个城市都感觉不到差异。比如我在肯尼亚看到很多人拿着智能机，和别的地方并没有差异。所谓文明，就是能在非常短的时间里同化整个世界。但**人类需要差异，文化方面的差异，人类提升精神层次最需要的就是重新认识传统文化的好**，无印良品在快速发展的文明方面不会求发展，而会在文化部分，即差异部分求发展。

（三）重视环境与生活方式

环境问题并不是环境问题，而是人生活方式的问题。地球是在46亿年前诞生的。如果我们把1亿年作为一米的距离进行思考，我们前面有46米，人类是在哪里诞生的呢？两百万年前北京猿人出来了，也就是说，那么远的距离，人类在两厘米的位置诞生。我们的产业革命在200年前诞生，也就是说在0.002毫米这样的距离诞生的，但在这0.002毫米里我们用了多少地球母亲的资源？社会存在这么多问题，我们是否该反省自己的生活方式。无印良品认为如果把生活变得美好，那么社会也会更美好。

（四）感受自然的柔软的心

你多少时间没看过月亮？多久没有赤脚踩在泥土上了？首先你要学会感受自然，有感受自然与生活的柔软的心。本田一开始叫做本田技术研究所，召集了五十个聪明人作为员工，第一是请他们花半年时间考虑二十年后能让消费者感到幸福的事。这些人都感到很惊讶，因为这个问题和他们的专业完全无关。但是本田说，如果你能考虑到二十年之后能让人感到幸福的场景，只要能想到，技术是能够跟得上的。

演讲结束后，笔者就开始了金井政明先生的访谈，当被问及能就创业可能的方向给出建议的时候，金井先生说：“你还记得



上次赤着脚贴近泥土走路是什么时候吗？还记得上次望着月亮忘了时间的是什么时候吗？无论创业方向如何，都要用心感受自然，去揣摩社会最需要什么。你不妨用半年的时间去思考十年后社会上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我始终忘不了他在说句话时的眼神，那是一种似水般柔和的目光。感受自然、感受幸福——这也是金井先生整场讲座反复强调的事情。此外金井先生还就无印良品在中日价格、产品种类方面的不同做出了解释，并表示无印良品的目标是在世界各地以同样的价格卖同样的产品。

到了讲座结束的时候，上海交通大学向金井政明先生献上了为他精心准备的书有“爱无华饰简素中自有奥妙，自然而然纯粹里不失知性”、画有金井先生肖像的卷轴，金井先生当即表示会将这个礼物作为金井家传家宝，随后他为上海交通大学广大学子题写了“希望交大的各位能用自己年轻的力量创造出美好的东风”以此表达了对上海交通大学和学子的祝福，也祝愿同学们可以拥有简单轻松的生活方式，在慢节奏里享受生活中点滴的快乐。



三、无印良品育才法则

法则一：培养“生于无印，长于无印”的人才

通过阅读无印良品的资料，我发现 MUJI 如今已经在“想在这个品牌公司里做兼职”的排行榜中位列第二，成为了一个员工离职率仅有 3.6% 的公司，有许多人是因为喜欢 MUJI 无印良品这个品牌而加入，也就是所谓的“品牌效应”，而无印良品也是依靠

内部采用机制让慢慢培养起来的人成为正式员工，即成为真正的“生于无印，长于无印”的人，他们的脑中已经完全渗透了无印良品的哲学和理念。公司也一直全力营造一种“有成就感”的职场氛围，营造一种能让员工实现自我价值的职场氛围。

在无印良品，基本不会出现突然让外部人员进入本部的现象。即便是招聘社会人士，每年也只有两到三人左右。虽说如此，毕竟无印良品的离职率还不是零，必须填补离职人员的空缺。每逢这种时候，无印良品都会开启“内部聘用”。

所谓内部聘用，就是将兼职人员吸收为本部员工。而兼职人员指的是在各个店铺工作的学生和兼职员工。内部聘用不看性别、学历、也不看年龄，而是根据每个人的实力做出公正评价。生在无印、长在无印的兼职人员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

无印良品店铺的所有员工都要接受“MUJIGRAM”的指导，它并非从上至下的规定，而是根据在现场工作的员工和顾客们的希望总结而成。并且它并不存在制作完成这一概念，而是每月都会更新内容。因此只需隔上几年，其内容就会出现很大的变化。

从服装的折叠、上架，到店内清洁和库存管理，无印良品从不存在“凭感觉”进行的工作，所有的工作都有明确的目的和意义。MUJIGRAM 的特征就在于在教授工作方法之前，首先教授工作的目的。

教授“目的”，同时也是通过现场工作来传授无印良品的理念和哲学。通过每项工作来教授无印良品的思想，就能让其理念和哲学浸透到员工心中。我们就是这样来培育生在无印，长在无印的人才的。通过在店铺工作的经验，他们自然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身为无印良品本部职员必须拥有的能力。而从外部招聘的社会人员，则远没有那么容易培养。

用人数来解决人的问题，这个方法本身就会弱化公司。

当营业额增长 10% 的时候，员工的工作会因此而增多，那就再增加 10% 的员工吧——似乎很多公司都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可是这其中隐藏着很大的奉献。如果一直秉持着这样的想法不断增加员工，在业绩良好的时

候看不出弊端，一旦业绩恶化，人事费用就会变成沉重的负担。因此不仅是不动产，每个企业还必须警惕人才的过剩投资，谨慎制定扩张路线。一般来说，中途聘用的社会人士多数都会在几年后辞职。以前无印的公司财务曾经聘用了几位社会人士，一开始那段时间工作非常顺利，可是没过多久他们又被猎头公司挖走了。与此同时，别的员工也纷纷辞职，那时正值最重要的结算时期，公司内部立刻顿时陷入了混乱。

这就意味着“用金钱挖走的人才最终会被金钱挖走。”然而只要将公司的运营交给熟悉无印良品这个组织的人，就不会产生伤及核心的混乱。为此，就算多花一点时间，培育生在无印，长在无印的人依旧是最佳策略。

法则二：无印良品人才的“调动”特点

与其他公司不同的是，无印良品会进行与众不同的调动：①多数情况下每三到五年就会进行调动②多数情况下会进行毫不相关的部门间的调动③往出现问题的部门投入精英④将部长调动到完全陌生的领域⑤不存在处罚性调动。

金井政明认为，调动决定了八成的人才培养。

上节课胡巍老师提到说：把人才调到专业不对口的部门（即 $a \rightarrow B, b \rightarrow A$ ），这使得职员在其中得到锻炼，而无印良品就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他们每年就是这样做的。无印认为，人才应该既是专才，也是通才，而最理想的通才是将两种不同的工作作为本职，并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只钻研单独领域的知识和能力，这样的专才乍一看似乎很能干，可实际上他只会考虑自己部门的问题，最终变成一个次优主义的员工。次优指的是只追求部分利益的员工，而全优则指的是考虑总体利益的员工。无论堆积多少次优都不会变成全优。

每个员工都有能力之差。可是在前一个部门表现不佳的员工，或许在别的部门就能大放光彩。作为一个企业，决不能断绝了那样的可能性，并且尽可能发掘出员工的所有可能性，也就是企业的职责所在，只要让调动发挥其最大作用，就能让所有员工得到成

长，也能让他们产生为公司长久工作的想法。这是一个对员工和企业互利的东西。

正如前面所说的第一点，无印良品调动的间隔很短，每三到五年就会进行一次调动，而三到五年这个时间，正是员工掌握了所有工作，获得一定成果，找到自己独特的工作方法，开始发挥个性的时期。在这种时期被调到完全陌生的部门，就不得不从零开始重新学习工作方法。

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不禁想要质疑，这对于员工来说不是一个坏事吗？

但通过后面的阅读，我了解到这不仅不是坏事，还会促进员工的进一步成长。不间断的调动对每一个职员都裨益良多。

首先，员工们会得到切实的职业发展。比起单一领域不断积累经验，多样化的体验更能促进切实的职业发展。比起考取专业资格或者去听讲座而言，工作调动更能让人获得职业发展的机会；其次，为了不让自己的成长停顿，最好的方法就是时刻挑战新事物，通过工作调动进入新的环境，自然就能得到挑战新事物的机会，这样就可以不得不硬着头皮去挑战；再次，如果调动到其他部门，就能与新部门的人展开新的交往，拓展更广阔的人脉，再继续保持跟以前部门同事的关系，就能增加员工在公司内部的交流，促进团结和团队合作；最后，通过调动到新的部门，就能亲自体验到与以往不同的立场和环境，这是最有效解决部门之间矛盾的方法。

法则三：越是疼爱的孩子，就越要让他吃苦

在无印良品，经常会出现突然让员工独自一人到尚未建立办事处的地区出差的情况。就算是从未出国的员工，也在被派遣的行列之中。正因为无印相信，没有海外经验的员工也能在异国独自开拓一片天地，才会放心把他们送出去。

在当地接连遭受文化冲击之后，员工就会明白日本的常是并不是世界所通用的。每个国家的语言不通，饮食、生活习惯和工作方法也截然不同。跟语言和常是完全不相同的人该如何交流？通过这样的炼狱体验，员工就会产生为对方考虑的意识。单方面的交流时不可能成立的。比起将自己的想法传达



给对方，尝试去接受对方的想法更为重要。这种意识在回到日本也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无印良品之所以要刻意将员工送到严苛的环境中，就是因为炼狱体验最能促进人的成长，也最能提高人的能力。年轻时吃过苦头的人，也是能力最强的人。

无印所培养的就是要具备“一个人想办法解决问题”的经验，在读了这一章之后，我意识到，如果我未来的公司能够提供到海外赴任的机会，我会毫不犹豫地接受挑战（在未成立家庭时）。就算不这么做，一旦我感觉自己停止了成长，我还是会想办法使自己置身于炼狱体验中。因为人们总是只擅长于溺爱自己，却无论长到多少岁都无法对自己严格要求。



四、优秀管理者素质之我见

胡巍老师在管理学的课程中曾将西游记与团队建设结合起来，产生了五大元素，分别是目标、分配、协调、技术和信任。我认为，无印良品的管理也可以就这五个方面进行细致地探索，得出无印是不仅专业而且到位的企业：

（一）目标——严于规范，创造品牌效应

无印良品的目标即是强调“这样就好”，不以昂贵的名牌自居，甚至在开会的时候找不到自己的竞争对手是谁。这样的企业就像是一股清流，直抵人心，就算没有过分的宣传、广告、logo设计，它也在分分钟俘获了人们的内心。

最可怕的一点是，我曾经见过这样一个问题，问美国的无印良品和日本的无印良品有什么样的区别？答案是：完全没有区别。无印对于标准化的目标苛求到了极致，

MUJIGRAM 作为无印的指南囊括了无印的方方面面。像麦当劳有可能会根据不同地域人们的口味而随之变换，而无印良品则讲求百分百的一致。这样的规范促使了无印的品牌更好地建立。

（二）分配——听取意见，团结下属

在《无印良品·育才法则》这本书中提到了领导者必须具备的素质有：①能够团结下属②能够看清事物的本质③能够克服障碍④能够领导团队按时完成工作。我认为，无印良品能够成功的主要原因也离不开它对于事务的分配。

金井政明先生曾经遇到过自己的下属对于自己的决策持强烈反对意见的态度，而他的做法则是将这件事情分配给这位反对的下属来做，他在完善这件事的同时看到了决策的另一面，并且积极配合地完成了这项任务。这也是我认为优秀管理者的素质。

（三）分配——听取意见，团结下属

在《无印良品·育才法则》这本书中提到了领导者必须具备的素质有：①能够团结下属②能够看清事物的本质③能够克服障碍④能够领导团队按时完成工作。我认为，无印良品能够成功的主要原因也离不开它对于事务的分配。

金井政明先生曾经遇到过自己的下属对于自己的决策持强烈反对意见的态度，而他的做法则是将这件事情分配给这位反对的下属来做，他在完善这件事的同时看到了决策的另一面，并且积极配合地完成了这项任务。这也是我认为优秀管理者的素质。

（四）技术——为顾客着想，打造安全舒适购物环境

有一次，在无印良品有一个负责防止顾客发生事故的部门接到了关于顾客在店内试用铁制推车的建议，建议说那个尖角撞到客人身上应该会很危险，公司很快就开始处理这一问题，最后把推车换成了圆形钢管制成的安全形状。他们把新车放在十间店铺里观察效果，做出了安全性已经提高的判断。随后，无印所有店铺就迅速换成了那种款式的手推车。

这并不能直接提升店铺销售额，但是“让顾客在安全舒适的环境中愉快购物”是实现无印良品公司理念的重要原则。

（五）信任——对具备潜力的人才采取百分百信任

无印为了人才的培养更是对有潜力的员工采取了完全的信任，他们提供一年的时间可以供有潜力的人才去国外创业，他们甚至可以做与无印完全无关的事业，全部都由无印提供资金，为的就是提升员工能力素质，这一做法更是表现了无印良品对于人才百分之百的信任，并在这种氛围中越做越好。

与金井政明先生相识缘于一场讲座的主持，但是他身上的那种淳朴、自然的气质，那样的礼貌与用心却让我想要挖掘他背后的这个庞大的企业，因为管理学作业的这个契机让我更全面地认识了这位优秀的董事长，也让我更深入的了解 MUJI 无印良品这个成功的企业。

感恩、感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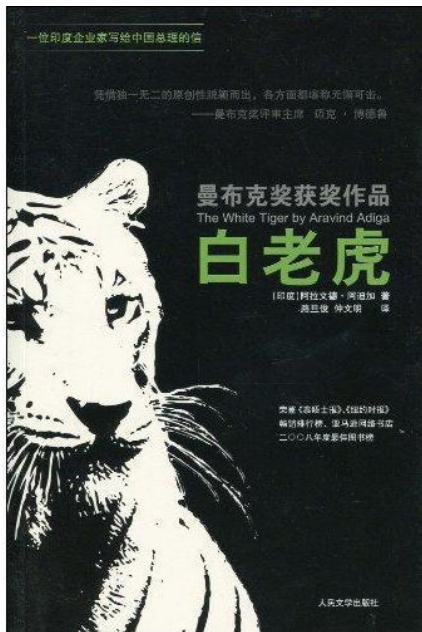
参考文献：

- [1]金井政明.《无印良品·育才法则》.新星出版社, 2015:13-15;251-253
- [2]金井政明.《解密无印良品》.新星出版社, 2015:222—224
- [3]渡边米英.《无印良品世界战略与经营改革》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8:36-40
- [4]王美珍.《无印良品金牌企业炼成记》[J],2014(11)
- [5]罗贵西.《无印良品是如何成功的》[J],2014
- [6]宋爽劲.《金井政明：无印良品监护人》[J],2014(11)
- [7]松井忠三.《无印良品 2000 页指南作何用处?》[J],2015
- [8]张佳.《从“设计经营”到“经营设计” From “Design to Operate” to “Operate to Design” Interview with Masaaki Kanai》[J],2013 (5)

《白老虎》读书笔记

张子江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本科生



《白老虎》是印度作家阿拉文德·阿迪加的处女作，被认为是一本能够“展示出印度黑暗的一面”的书。“白老虎”比喻的是丛林中难得一见的动物，而故事的主人公巴尔拉姆正是以“白老虎”自喻。他原本是一个贫困的人力车夫的儿子，机缘巧合下学会了驾驶汽车，成为了从美国归来的年轻富翁阿肖克的司机，逐渐通过欺骗、背叛、狡诈、弑主和夺财，“成功”地从幽暗走向光鲜的经历。在种姓制度余毒难消的印度，主人公这样一段看似传奇的“逆袭”之路，不得不引起读者思考。

一、关于“鸡笼”的解读

《白老虎》一书中有一个内涵颇深的隐喻，鸡笼。

在作者眼中，整个印度社会就好像一只大大的“鸡笼”。印度社会中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是底层群众，是鸡笼里待宰的鸡，没有

办法决定自己的命运。他们的生死祸福掌握在鸡笼外的人手里，那是印度社会中掌握着权力，金钱，资源的少数人。鸡笼里的很多人慢慢习惯了被统治者剥削、奴役和宰杀，但他们毫不反抗，也不竭力逃出鸡笼。致使“人吃人”的场景时时刻刻在印度上演。

“鸡笼”如何禁锢底层人民的思想？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1. “鸡笼”本身是旧时代种姓制度在当代的延伸。主人公一家的姓氏“哈尔维”以前是做糖的，是社会最底层的种姓。这种观念在主人公家族内部根深蒂固，他们安于现状，认为自己本就应该去从事那些最辛苦的工作，从未想过去改变自己的命运。放眼印度，很多底层群众的想法与主人公家族是相似的。主人公的上学也是百般坚持后的结果，因为在家族的眼中，上学是没有意义的，反正人一辈子总要重复父辈的工作，年轻人去上学反而损失了劳动力。正是因为这样的思想在底层群众中相当普遍，致使他们习惯于被剥削的生活，不敢甚至没想过去改变现实。最终这些陈旧观念，像“鸡笼”一样将他们束缚在里面，任人宰割。

2. “鸡笼”代表着资源分配的不均等与社会流通的不畅。印度社会宛如鸡笼一般，资源分配相当不均等。在鸡笼外的人掌握着财富、权力、地位，他们也因此获得了充足的教育、医疗、商业资源，他们有很多方式来丰富他们的知识，延长他们的寿命，扩展他们的生意。而鸡笼内的穷苦百姓则不然，他们的孩子可能连学都上不了，他们的医疗条件差到患者久久无法医治最后在医院中去世，他们的职业生涯是被固定好的，他们很难拥有自主选择职业的权利。两相对比，社会资源分配严重的不均等导致贫富之间的差距只能越来越大，越来越难改变。同时，资

源的分配不均造成了穷苦百姓在知识水平、技能素质上的落后，并且缩紧了社会流动的通道，使他们无法拥有向上级社会攀登的条件。因此，“鸡笼”的存在，使鸡笼内外的群体保持相对固定，限制了印度社会的人员流动。

3. “鸡笼”是奴性意识强化后的产物。

在印度，人人都供奉着“哈努曼”神猴，因为他是罗摩大神最忠实的仆人，这为他们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以绝对的忠诚、热爱与奉献侍奉自己的主人”。出于这种宗教思想，在印度底层人民心中，为主人竭力奉献是他们“优良”的品行。这种奴性意识的强化更加使得身处鸡

笼内的底层群众顺从于鸡笼外主人們的剥削，“被剥削成为了“本分”。同时，这种奴性也使得奴隶们心中也产生了维护体制的思想，因为他们需要将自己墨守的理念合理化、普遍化。这关乎他们生存的意义。就好像从出生开始便使一头狮子

不断地吃素而不是肉，时间长了，它自己也觉得自己本来就是吃素的，突然有一天让它看见别的狮子津津有味地吃着肉，我保证它一定会发疯的。因而一旦出现了挑战权威、挑战体制的人，必然会受到其他底层人民的压制。这也造成了奴隶之间互相监督互相压制的状况，使得鸡笼更加难以破去。

二、弑主方式必然性的思考

书看到一半时，我以为这将会是一本讲述巴尔拉姆凭借自身努力一步一步走向成功的励志小说。当我看到主人公选择了谋杀自

己的主人时还是颇为意外的，没想到他会使用那么极端的方式改变命运。同时这也引发了我的思考，会不会有更加和平的反抗方式呢？

主人公身处的社会，弱肉强食，阶级思想浓郁。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金钱与权力决定了一切。

假设主人公在司机的位置上一干下去，既拿不到高额的工资，同时又时刻有着被主人放弃的危险——他始终是个不入社会主流的小人物。如何短时间内取得暴利？方法自然不会像他之前那样钻点空子赚点小钱。因此他想到弑主。虽然有一定风险，但一旦成功便能够获得一笔一辈子都赚不到的财富。

因此从理性角度思考，这个计划可行。

另外，由于之前曾差点被主人阿肖克拿去当车祸事故的替罪羊，巴尔拉姆对自己的处境和阿肖克的心理可谓是完全心灰意冷，愤怒与担忧促使着他尽快做出改变，扭转自己的人生。

弑主方式有其必然性，同时也更

体现出社会现实的残酷，可能这才是小说真正想体现的内容：在这样的社会中，甚至唯有犯罪才能流动到达上层。

《白老虎》是一本非常有意思的小说。它不仅描述了印度社会的残酷现状，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自下而上观察社会的角度。印度的状况，会不会在中国发生？贫富差距的落差，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均，社会流通的不畅。中国社会的发展，如何兼顾效率与公平？很多问题都只得我们进一步的深思。





踮起脚尖，遇见学术之巅 ——哈佛访学的观察与思考

刘玮辰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在世界范围内，哈佛大学都是无可争议的一流大学。得益于去年我院与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达成了合作交流协议，我有幸获得此次宝贵的机会，踏上了这趟学术盛宴之旅。在经过了院内面试、哈佛肯尼迪院方考核和国家留基委筛选后，我幸运的成为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Ash center）2017-2018 年度的访问学生。

能获得学院如此好的机会以及国家奖学金的赞助到世界顶尖学府来研究学习一年，我倍加珍惜。在哈佛大学放学期期间，我主要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经济系、商学院以及麻省理工学院 Sloan 商学院从事研究、学习和交流。在哈佛大学半年的时间里，感受最深的主要有三个方面，记录下来与大家分享：第一、关于访学项目；第二、课堂与教学；第三，丰富的学术资源。



关于 Ash center 交换项目

随着飞机降落在波士顿洛根机场，揭开了我与这座城市的缘分。一出机场，提前联系好的哈佛大学中国学联的学长学姐已在机场等候多时，一切安排妥当把我们送到了在国内就联系好的租房地地址。中心规定，每两周要参加一次 seminar 研讨会，要求全部同学出席；一年要安排一次 talk，来汇报自己的研究，我们是被安排在下学期即明年的 2 月份。项目负责人 kaori 也很负责任，在迎新会上，详细地介绍了学校以及中心的图书馆、可用的资源、相关的其他中心等情况。并安排了与赛奇教授等中心共三位教授的会谈，就各自的研究方向研究选题给了建议，并对各自相关的教授、课程上给予了推荐。在每次的研讨会上，中心非常重视参加者对于汇报人的反馈。在这里的时间，有任何关于学术和生活上的问题，Kaori 也都会专业且耐心地回复解答。

课堂与教学

由于项目的 orientation 是在 8 月份，而大部分的课程是在 8 月底甚至 9 月份才开，所

以整个八月可以仔细考虑选课的事情。虽然是访学项目，但是我们依然可以跟感兴趣的课程教授申请旁听，把握近距离接触大师们的机会。哈佛大学的选课很有意思，在第一周开设 course shopping，让所有的学生去自己感兴趣的课程试听。在试听课上，教授一般会下发一学期的课程计划，介绍课程的开设目的、推荐的阅读材料、考核形式和内容，一般是半小时到45分钟不等。之后，学生可以根据兴趣和视听感受，最终确定想要选修的课程。并且，波士顿是一座云集世界一流高等学府的城市，除了哈佛大学以外，麻省理工学院、东北大学、波士顿大学等知名高校也坐落于此，因此，卓越的跨校选课系统成为了这座城市知识共享的一个重要媒介。

作为访问学生，有机会现场感受到哈佛大学的课堂教学和学术研讨，感触颇深。哈佛大学的课堂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传统授课（Lecture），另一种是讨论会（Workshop）。在这半年里，围绕着科技政策、科学家流动等主题，我最终选定旁听了两门课程以及两门workshop。一门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George J. Borjas教授开设的移民经济学（The Economic Impact of Immigration），一门是麻省理工学院Sloan商学院Pierre Azoulay教授和Scott Stern教授合开关于创新创业的课程（The Economics of Idea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同时，一直关注的Richard Freeman教授也在经济系、商学院有两门workshop，果断参与其中，追踪领域的前沿研究。更棒的是，美国全国经济研究局NBER位置很方便，每周二的午餐研讨会更是丰富了学术生活，幸运至极。

在选定了两门课程、两门研讨会后，在上课、研讨会、以及自己的研究之间就要仔细权衡。在美国，上课的压力还是不小的，虽然是旁听，但只有每周阅读老师布置的阅读材料，上课时候的效果才会更好的吸收。在这里，学生是课堂的主体，要充分参与到讨论和教学当中。课堂上最大的感受就是学生与老师之间的互动特别紧密，随时可以打断提问，老师们也都会耐心的给与解答，思维的碰撞充斥了整个课堂。最让人钦佩的是老师的敬业精神，一次George J. Borjas由于不可避免的个人事情导致会缺席一堂课，教授特意发来邮件表示从教20年来从未缺课并深表抱歉。在这里，以学生为本、老师的谦逊都深深的影响着我们。

丰富的学术资源

哈佛大学也是世界著名学者云集的学府，在哈佛期间，大家都抓紧机会一睹大师们的风采。在来之前，就跟老师和师姐请教了经验，当时印象深刻十分深刻，“在哈佛，资源讲座丰富的根本参加不过来，只要你想，天天都有”。果不其然，来之后深刻的感受到了丰富的资源。与中国相关讲座的集中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和燕京学社，学院每日都会邮件推送最新的活动，应接不暇。所以大家一定要合理安排，抓住机会。在我听的各种哈佛讲座中，主讲人讲得不多，更多的是提问和交流的时间。当主讲人人气太旺时，他们就采取注册登记和随机抽签方式，中签者才能参加。

此外，还有一个亮点一定要介绍——哈佛沙龙。哈佛沙龙是由几名来自中国的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发起的小型主题沙龙，站在哈佛，思考中国与世界。沙龙追求真知，秉承兼容并包、独立开放的精神，每双周举办一次，并且全球同步直播。有幸参与一次，听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博士后李钧鹏博士讲述何为中国的自由主义。除此之外，企业家王石、李开复先生、襄禾资本创始人等都来到哈佛大学、MIT著名学府开设分享会。而刚刚卸任的以色列情报局摩萨迪领导人也曾来讨论中东的新平衡问题。

围绕十九大，哈佛大学也开展了系列讲座，主题涉及十九大与中共的未来发展、一带一路、中国发展及其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以及纪录片“designed in China”的放映，很多地方都给我们带来了满满的自豪感，掀起了讨论中国的高潮。嘉宾涉及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傅高义、赛奇、Richard Cooper等重量级中国研究专家分享他们对于中国发展及其在国际事务中角色的挂点和看法。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有特殊性在于容纳了一批MPA、MPP、MPP/ID等学生，这类学生大多以具备多年工作经验为主，因此特殊的背景经历汇聚在一起，着实为我们一直在学术殿堂里的学生带来了不同的视角和思想的冲击，也让我们以更加辩证性的思维看待很多问题。

除了坐拥学术之巅以外，哈佛大学也是一个自然与人文环境十分优美的地方。校园周围有若干博物馆、艺术馆、剧院，享誉中外的波士顿交响乐团的大本营也坐落于此，学生可以在这里享受很多便利。行文至此，深感半年时光转瞬即逝。非常感谢学院为我们提供的如此宝贵的机会，以及国家留学基金委提供的资助，哈佛的访学经历无疑对我的学术生涯乃至人生规划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暗红色的盾型图案上三本翻开的书，镌刻着“Veritas”（拉丁文：真理），正是哈佛大学的校徽，也是这座著名学府的校训，折射出了学者们一丝不苟对真理执着追求的精神，也将持续影响着我。

玮辰于2017年11月22感恩节前夕

交大“武林”之路

人物小传：

张心怡，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17级硕士研究生，院研会学术部干事。



题记：经过了交大四个月的研一生活，我自身无论在学习还是生活中都感触颇深。研究生不同于本科生，对学术的要求更进一步，对能力的要求也更高一步。爱好武侠的我希望用不成熟的“武侠风”，描绘我的研一生活，毕竟在高手云集的交大，我们也许都被“学术大神”碾压过，但不管怎样，“人在江湖飘呀，哪能不挨刀呀”，学习还是要继续。最重要的是，开心的研究生生活要继续，属于我们的这一段时光不许负！还请诸位看官见笑了！

序 饮马江湖，称风流

江湖之中，门派林立，少林武当、峨眉崆峒凭一家之长独领风骚，华山昆仑，明教丐帮又以独门绝技冠盖武林，唐门全真、青城逍遥誉之一方霸主。斗转星移，各门各派观天下暗涌、审时度势，于革命风云变化之际，纷纷图强求变，肩担家国之任，储育栋梁之才，救国图存于水火中。历百廿之年，天佑中华，国祚绵长，然储才兴邦之路任重道远，江湖求贤之势如火如荼，各门各派更是著书立说，成各家之言，于武林之中占一席之地。北以清北人师为荣，南以复交同中为傲，各路英雄大师欲争天下魁首，四海八荒少年侠者无不趋之若鹜，求问道于大师门下，既安身于武林，亦立命于江湖，更有杰出者可问剑天下，成宏图霸业。

第一话 风萧萧兮，踏马来

自上一次华山论剑之后，又一批少年侠客各凭本事，入各派大师门下，开启闭关修炼之



路。手持特制“邀请帖”的本少侠，鲜衣怒马，一日看尽魔都花，于三秋桂子之季，拜于交大黄琪轩先生门下。恰逢先生访学海外，唯鸿雁传书、飞鸽传信以传授心法，然日常修习断不敢懈怠。

同辈袍泽各依所长，从于不同流派。武功心法虽有差异，方法论中却有共通之处，学以互补、习以借鉴、沟通有无，皆可为我师之。

各派之中不乏武功高强、内功深厚的高手，皆任不同教席，授五行八卦、奇门遁甲之术，传东西传统、内外前沿之学。仰止诸位先生之风，谓之高山，可望不可及。

江湖暗流，唯修炼内力，凭借自身功力，方可剑指天下。幸得交大风水宝地，闭关三年潜心蛰伏，守得初心，必方得始终。

第二话 夜雨江湖，十年灯

早闻得“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之金玉良言，又听得“学海无涯苦作舟”，仗着原先几成功力，本以为剩下的功力修炼不过是沿袭着“闻鸡起舞”和“披星戴月”的勤奋之路踽踽前行尔尔，进而达“学富五车”和“学贯中西”之境，终能问鼎武术巅峰。然，入门之后，方惊觉自己竟面临“江郎才尽”之困境：呜呼，吾武功之何在，内力之何存，唯齏粉尔！

初，自是各大门派武功秘籍经典的研究。既称之秘籍，必是大师精心之作，既包罗古今史实先例，又可谓之某一流派之滥觞。众武林高手皆曰：武林之路自当以研摹大师之作为始，观其要义，理其内涵，鉴其招数，悟其心法，方可模仿一二；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后加以融会贯通，举一反三，必对内力增长，招式提升大有裨益，武功登峰造极不过时间尔。然，于己而言，且不说各派典籍之庞杂，如汗牛充栋，着实令人眼花缭乱，难免心生厌倦，不胜烦恼，自觉读少忘多，不得要领。更有甚者，众高手设擂台，命我等读典籍后展一展拳脚。惜我唯照猫画虎，因见秘籍如天书，难得真传，遂屡屡献丑，花拳绣腿，不堪一击。虽羸弱如此，暗想从其他少侠所展中窥得精彩之处也是极好的。

继，已非武功初学者，既入交大门，必成交大功，武学造诣必得增进。然方知自身根基之薄弱，底蕴之不足，悟性之不高，勤奋之欠缺，愧求学于此。初入门庭，不知套路，无论心法。伤心焦虑之余，更坚定修行之路。路，吾选之，泣涕以行之，终不复焉。幸，勤可以补拙，学可以增智，问可以解惑，思可以反省，行可以练习。若遇瓶颈之处，方是提升增益之时，悬梁刺股须持之，挑灯夜读应恒之，每日三省必为之。

桃李春风酒何在，唯十年江湖夜雨之学路沉浮，可磨砺栋梁之才，成傲世之功。

第三话 相逢意气，与君饮

自拜于师父门下，武功套路、招式变幻、心法内力皆受益颇多。师父者，功力大成者，内力雄浑，武功深不可测乎！又集百家之长，攻守兼备，精于十八般武艺，且融会贯通也。以武论道，不问英雄出处；剑试天下，结知音肝胆之友。随心率性，敏而克勤，聪以致远，明以察微。每与师父席谈，胜十年苦读书，不可不谓之良师。入师门，从方法论之指导，知如何见招拆招；从心法之解析，以参悟大师风范；从秘籍之推荐，以寻内力之提升。吾常怀感恩之心，谢与先生相逢、受教之缘。

先生门下亦多英才。师门初聚，两师兄均有意继续修炼。大师兄儒雅敦厚，不似习武之人，然剑术造诣已有七成。既负剑道天赋，又勤于苦练，不日必为高手。二师兄眉宇间英气袭人，勇而不莽，强而不恃，未来武林之新星也。吾得师兄颇多经验指导，方觅得武学道路上丝丝踪迹，与未来发展前途之点点建议。诚然，多谢师兄不厌其烦解疑答惑，不至使我如盲人摸象般独自探索。

师门同袍中，两位少侠均各负奇才，每每交流，所学颇丰。韩少侠沉于内功修炼，虽有佳人在侧，仍未动弃武之心。吾尝谐谑之，少侠往往默而笑之。三人多聚而研习秘籍，互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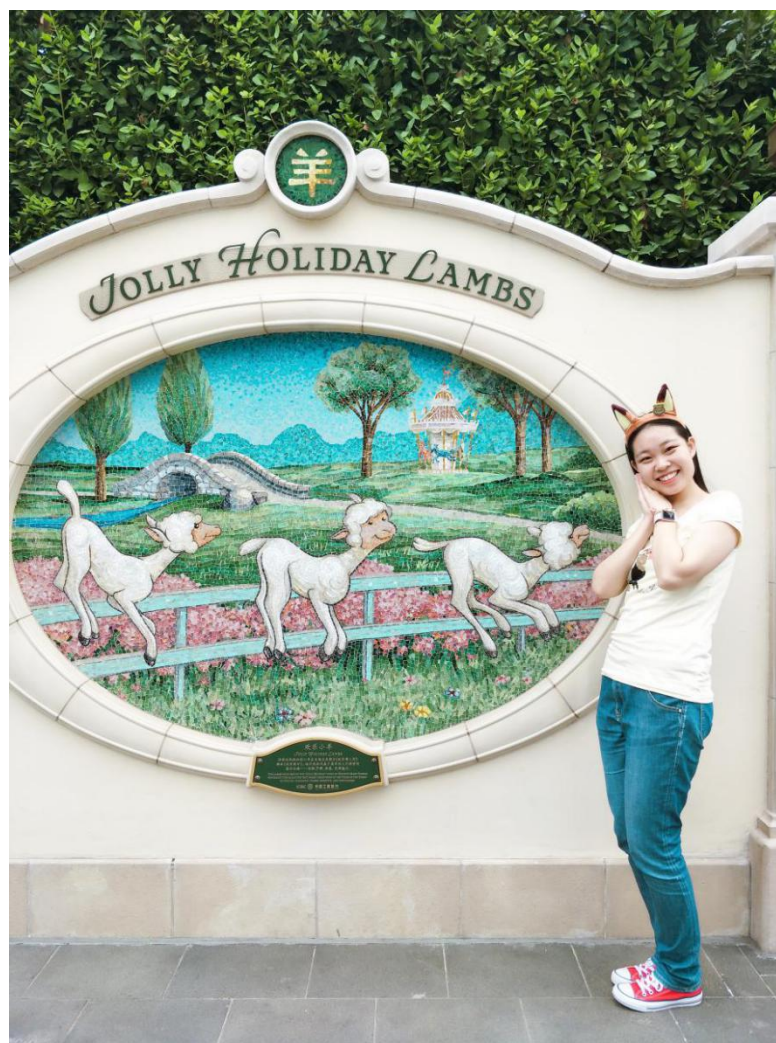
试炼，不断增进。

终话 路漫漫兮，求索之

长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于漫漫长路兮，必将怀赤子之心，砥砺前行，求索于大师高手之言、先生之授、朋辈之行中。纵使步履维艰，仍愿付洪荒之力，不求闻达于武林，亦不妄睥睨于江湖。惟愿克己修身，在交大武学修炼中与日俱增。

番外 江湖问路，更问心

常言道，江湖问路不问心，问心问得几路行。然如若心之不定，路之何行。本少侠才疏学浅，功力薄弱，各位同袍、高手、大师多多指正，心行双修，与君共勉。来日红尘作伴，策马江湖！





社会科学和数学的奇妙邂逅

人物小传：

吕立远，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2014级本科生，曾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学生体育总会执行主席、国务学院团委学生会学术部部长、校学生科技协会哲学社会科学委员会学术委员，曾获2014-2015、2015-2016学年国家奖学金、2016-2017学年上海市奖学金等荣誉。目前即将前往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攻读公共政策硕士学位。

题记：自大二下学期起，我开始修读数学与应用数学第二专业，迄今已完成培养计划中大部分课程，预计将于2018年6月获得学位。作为果园学子中比较小众的选择，我将在本文中分享一种与公共管理专业风格迥异的学习生活，希望能给大家带来积极的思考。

还在新生群中潜水时，便听说数学是国学子面前的一座大山，学时不多而用处不少，因而学长学姐们多有书到用时方恨少之感。作为一个高中时混迹于理科班研习数学竞赛的非典型文科生，当时便心生疑惑，在公共管理这样看似文科的专业，数学究竟能派上什么用场？又该以一种什么样的状态面对大学数学的学习呢？

带着这些疑惑，我迈入了交大的校门，非常幸运，在大一时便遇到王维克教授这样学贯文理、春风化雨的恩师。开学的第一课上，王老师开门见山地指出，数学应成为文科生的“成功学”，数学背后蕴含的逻辑推理与理性思考，无论是应用到科研论文写作，还是融入到个人的职业选择，都是文科学习很好的补充，甚至在某些场合，可以成为文科生的制胜之道。此后的一年间，我有幸成为了王老师的课代表，也获得了更多恩师耳提面命的机缘。在与王老师的交流中，我渐渐知晓了计量方法、最优化乃至神经网络这样原本看上去高深莫测的数学方法，也越发开始思考如何将还算擅长的数理融入个人的发展。一年的数学课结束前，王老师告诉我，如果还有兴趣，就去修数学双学位吧，定能开启一个全新的世界。我欣然领命。

时光走过半载，大二下学期，我终于踏入数学系的大门，开始第二专业的学习，也开始了几个打算使用数理建模的科研项目。然而一切冲动的激情终究将在生活的磨砺中归于平淡。很快我就发现，待我攀登的，是一座罕有人烟的高山。一者双学位的课程大都在工科数学的基础上设计，略去了200多个学时的内容，这意味着我得在不影响一专的情况下补上普通同学一年多的数学课，否则后续学习断无可能。二者科研中的数学远远比数学课程来得复杂，各种方法无奇不有，但你得找到最适合自己项目的模型。有了模型还需要高质量的数据，古扎拉蒂的《计量经济学基础》中有一句评论来的甚为贴切，“时刻记得，研究结果不可能比数



据的质量更好”¹，因而很多时候都面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境地。那段日子，我的心情低到了极点，拿到了大学考试的第一个 50 分，制定的研究计划也不断推倒重来，但也坚持着在闲暇时间一页一页地温习《数学分析教程》和若干量化方法的文献，现在看来，也是获益匪浅。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大半年，但发展的问题终究需要发展来解决。一遍遍地推导演算终于带来了能力上的飞跃，我终于不再拿到数学书便两眼一抹黑，再预习量化文献时的速度也大大提高了。我的考试终于摆脱不及格，从 60 到 70 到 80 再到概率论期末时第一次突破 95，终于不再万年垫底。科研上的困境也慢慢迎刃而解，公共自行车项目的研究没有数据，便通过爬虫下载数据；脆弱性项目的系统方程搭建不出，便不断查找文献，在思路多次调整后竟也最终找出了一条方案。此后，在导师樊博教授的指点下，我又进一步修习了与社会计算相关的程序设计与数据挖掘，逐步在量化研究领域打下了较为广泛的基础，也成为我前往清华复试时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回顾本科时光，我一直追求的，是将追求极致理性的数理思维融入社科生涯，其间有过初遇的惊艳，也有过求之不得的迷茫，听过前辈的极力推荐，亦受到过传统社科学者的质疑。

现在看来，单一的质疑与纯粹的支持可能都不足以应对我们所应对的挑战。一者社会主体的理性，与数理科学所追求的极致理性终究有所差异，基于微积分的优化方法适用于 100% 理性的环境，却不能完全照搬于理性程度为某一概率分布的大样本人群。（诚然模糊数学与行为科学已有所发展，但其影响力较于经典的新古典体系还相差甚远）。二者社会环境终究有别于冷冰冰的数学模型，模型帮助我们抽象的认识世界，但完全由模型构成的世界想之难免不寒而栗，我们同样需要价值层面的讨论与争辩来保持活力。因此，一条混合的策略终将摆在我们面前，使用模型而不迷信模型，积极讨论而不陷于纷争，如何把握其中的平衡，值得我辈每一个社科人细细思索。

时至今日，数学与量化社会科学研究已是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是我未来有志进一步深造的方向。唯愿未来无论身在何处，都能做出“顶天立地”的研究工作，不负母校母院的教诲之恩。



（摄影：姜子禹）

¹ 古扎拉蒂, 波特, & 费剑平. (2011). 计量经济学基础: 第 5 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P28



挂职锻心炼性，助力成长成才

人物小传：

黄伟强，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2015级硕士。在校期间先后担任年级班长、院研究生会副主席等职位。2016-2017年相继在中共浙江平湖市委统战部、共青团上海市黄浦区委、黄浦区小东门街道办事处等党政机关挂职锻炼，限于篇幅，笔者在此仅对2017年黄浦区暑期挂职经历作分享。



时光飞逝，1个多月的暑期挂职转瞬即止，而我对于黄浦的感佩与眷恋却愈发变得深刻，在黄浦的这段时光已定格成我人生中的一段美好回忆。

今年7-8月，在学校的组织下，我赴黄浦团区委组织联络部（青联秘书处）挂职锻炼，期间被借调至中共黄浦区委组织部干部科帮助工作2周（8月4日至18日），先后经历了两个部门的实践，两位带岗老师都是既美丽大方又和蔼可亲的小姐姐。承蒙组织上青睐，指派我和复旦大学的一位女同学共同担任整个挂职团队的班长（2/109）；因此，我能有机会全面、系统地接触有关暑期挂职锻炼的工作事项，从中也学习到许多新知识、新技能，锻炼了自己的能力和才干。在挂职工作中，虽谈不上“日理万机”，却也过得十分丰富、充实，使我得以在实践中打磨自己，从点滴处升华自我。在团区委组织联络部，我的主要工作是协助暑期大学生挂职锻炼工作的开展，包括设计活动方案、对接各校队长、组织活动开展、编写工作简报、撰写新闻稿和工作总结等。在区委组织部干部科，我主要负责协助干部选拔任用的档案整理和近几年提任干部的名单汇总工作，系统梳理了近三年来300多名提任干部的相关档案和数据。两边的工作业务和氛围虽有所不同，但我基本能很快地切换角色、适应环境，并顺利完成了工作任务。

在挂职过程中，我逐渐认识到：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团委部门一直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肩负着团结和凝聚广大青年的重任，团委的很多工作都是围绕团员青年来展开的。在团委工作的基本都是较年轻的公务员，工作氛围也较为轻松、活泼。相较而言，根据党管干部原则，作为“党委三大部”之首的组织部主要负责的是党建和干部工作，工作氛围则相对严谨，要遵守的纪律和规矩较多，这也是由单位性质和工作对象所决定的。挂职

期间，通过阅读相关文件材料和理论读物、在工作实务中自我体察感知、向带岗老师请教专业问题等学习方式，我对大学生暑期挂职锻炼工作、团员青年“一学一做”教育实践以及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流程等，都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



与此同时，通过此次挂职锻炼，我也积累出以下几点感悟：

第一，务要摆正心态，切忌眼高手低。7月上旬，挂职开始后不久，由于并未接触实质性工作，在单位基本处于“打杂”“跑腿”的角色，干的都是打字、复印、整理文档等较为简单粗糙的工作，部分参加挂职的同学不免心生不快，甚至有个别选择了退出。这其实是极其不理智且不负责任的行为。归根结底，这部分同学还是没有摆正自己的心态，没有认清参加暑期挂职实践的目的。参加暑期挂职，主要是为初步体验机关单位的工作氛围，简单了解党政机关的运行机制，进一步发现自己的兴趣和特长，从而判断自己是否喜欢和适合体制内的工作生活。而一旦今后我们选择进入党政机关工作，能否沉心静气、戒骄戒躁就显得尤其重要。特别是在组织部门工作，需要的是细致考究的工作态度、确保零差错的工作作风，眼高手低、心浮气躁是十分忌讳的，这也是我在组织部干部科挂职的两周内所学习到的重要一课。

第二，倡导分工协作，切忌以邻为壑。如何与单位内部特别是办公室内同事相处，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由此也引发了很多诸如“办公室政治”的猜想和遐思。现实生活中，尽管大部分人并没有太多“机会”参与到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当中，但怎样与同事相处确实十分考验人的情商和智商。个人认为，在单位内部与同事相处能做到打成一片当然最好，再不济也要相敬如宾，把自己的工作抛给别人、不考虑对方感受、在同事需要帮助时不管不问，这些以邻为壑的做法是坚决要不得的。这里涉及到分工协作的技巧，秉持的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理念。在这一点上，我的带岗老师给我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我也非常有幸与复旦的两位女同学一起愉快共事了一段日子，并与她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第三，注重沟通协调，切忌颐指气使。从大学学生工作的组织开展到单位工作岗位的建功立业，沟通能力和协调能力的重要性都不言而喻，而在认识到其重要性的同时更要注重沟通协调的技巧，否则只会事与愿违。以我在团区委挂职的经历为例，按照挂职工作方案的设计，挂职期间需要组织各校大学生开展一系列参观学习和交流分享的活动，由于大家本身负有挂职工作任务，且各挂职单位分布在不同区域，组织起来势必会有难度。针对这一情况，我



们事先做足了准备，拟好详尽的通知，把活动尽量安排在工作日的中午，集中在半个小时内搞定，并且让8所高校的学生分组轮流参加；在与各校队长沟通时，考虑到大家都是大学生的身份，也保持以平等、平和的语气与之商量，并反复沟通确认，事后要求反馈，最终取得了良好效果。

第四，强化理论学习，切忌浮光掠影。诚然，暑期挂职为我们搭建了知行合一的良好舞台，提供了从校园走向社会的实践机会。实践出真知，知行合一要求我们积极投身实际工作，但行源于知，无论身处何地，理论学习断然不可偏废。以我在团区委挂职期间接触的“一学一做”（“学习总书记讲话 做合格共青团员”）工作为例，带岗老师让我试着围绕该项工作写一份中期总结。由于刚刚到岗，前期并未有丝毫参与，对所有情况都是两眼一抹黑。在周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我不仅系统梳理了团中央、团市委、团区委以及基层团组织的相关文件材料，同时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最终写出的总结尚算差强人意。同样地，组织部门的许多工作专业性也很强，十分考验组工干部的理论能力，需要不断地给自己充电。从中我认识到，强化理论学习不能搞“运动式作战”，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深入细致，切不可浮光掠影、流于形式。

暑期挂职锻炼是大学生接触基层、服务社会的宝贵机会，不仅可以帮助大学生拓宽视野、积累经验、增长才干和提升素质，同时也是引导和鼓励优秀大学生到基层建功立业的有效途径。希望未来有更多的交大学子勇于走出校园藩篱，积极投身社会实践，坚持知行合一、理论结合实际，树雄心、立壮志，成长成为“治国理政”的杰出英才！



走进哈佛

人物小传：

周文星，上海交通大学国务学院 2015 级博士研究生，受教育部留学基金委公派资助于 2017 年 8 月至 2018 年 8 月赴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做访问学者、联合培养博士。



2017 年 8 月 8 日，我怀揣着感恩与激动的心情搭乘上海直飞波士顿的航班，来到了坐落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哈佛大学，一所当今世界最负盛名的私立研究型大学。行前，很多师友叮嘱我：一定要珍惜在哈佛的时光，教授尚且难有这样的交流平台，学生更应把握这来之不易的机会。我自问了很多次，如何才能不辜负在哈佛的宝贵时光、充实度过每一天？逝者如斯，转眼我在波士顿已生活了快 3 个月。现在让我谈谈在哈佛的学习感想，内心惶恐自己的讲述难免以偏概全，但这却不失为一个阶段性总结和审视自己的好机会。那就利用这个稍有闲暇的周日下午，浅谈自己的几点感想吧。

探寻“真理”

拉丁语 Veritas 是哈佛大学的校训，意为“真理”。沿着麻省大道，经过哈佛书店（Harvard bookstore），走到哈佛广场（Harvard square），再绕到哈佛庭院（Harvard yard），沿途发现“真理”作为哈佛最经典的 logo 随处可见——学子的帽子上、游客的纪念 T 恤上、古老的大门上。“真理”不仅只是一种外在的装饰，它更是每位哈佛人毕其一生去追求的信仰。作为全美历史最为悠久的高等学府之一，哈佛大学已经培养了八位美国总统、多国政治领袖与无数政府要员、三百多位罗德学者、若干名诺贝尔奖得主，以及数十名富豪企业家。这些林林总总的数字，是哈佛数百年来践行“真理”的冰山一角。这所常青藤名校常常提醒她的学子们，地位、金钱与权力只是人生的部分追求，哈佛人必须谨记并落实通过个体行为去改变世界、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细微之处见真章。在我看来，哈佛大学对“真理”的追求也体现在诸多人性化的设计之中，如便利的图书馆系统、灵活的院校选课制度、服务周到的行政体系。哈佛图书馆系统由近 80 座图书馆构成，从馆藏量而言它是全美最大的学术图书馆网络。每一座图书馆都具有其



独特性。拉蒙特图书馆（Lamont Library）24小时开放，它是曾经在国内网络红极一时的“哈佛大学图书馆凌晨4点半的景象”中的图书馆原型。哈佛学生可以向图书馆借阅不限数量的书籍、电子与影像资料。如果借阅文献为电子材料，图书管理员会将电子资料打印出来然后送交给借阅者。哈佛图书馆分散在剑桥市各个区域，如果借阅者亲自到各大图书馆寻找所需文献将会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为此，哈佛图书馆系统设置了索取资料（request item）功能。借阅者只需登录自己的图书馆账号，选定所需文献，然后点击索取资料，选择他们最方便领取文献的图书馆即可。图书管理员在一周内将借阅者所需文献送到预约的图书馆，然后电子邮件告知借阅者前去领取。图书馆系统还具备校级借阅（Inter-library loan）的功能，如果哈佛图书馆没有借阅者所需文献，借阅者可以申请校际借阅，从其他高校图书馆调阅。

哈佛的选课体制设计新颖。新学期开始前两周是选课（course shopping）时期，授课者在此期间会讲解有趣的内容，以吸引更多学生的关注。得益于哈佛大学强大且灵活的选课体制，来自任何学院、中心、项目的学生学者都可以实现跨院甚至跨校选课。比如，医学院的本科生可以选修肯尼迪学院开设的有关美国医疗改革与公共政策过程的课程，肯尼迪学院的研究生也可以注册参加法学院举办的有关美国重新划定选区与法律因应的系列研讨会。从这一点上来说，无论学生身处哈佛哪个机构其实并无实质影响，因为哈佛各大学院之间不仅实现了丰富资源的可得性与流动性，而且在大波士顿地区各大高校之间也实现了资源的共享。

哈佛行政工作人员为师生提供细致的后勤服务。学校与学院的行政工作人员邀请相关专家与技术人员，为师生提供论文写作、学术软件运用、网站设计等实用性强但易上手的短期培训。他们还会定期通过哈佛官方电子邮箱向所有注册在籍的学生（行政人员为每个学生学者都注册一个哈佛官方电子邮箱）发送邮件，告知学校的近期活动与安排。每个工作日早上7点前后，我们会收到哈佛公报（Harvard Gazette），介绍学校层面的最新活动。肯尼迪学院的行政团队则会在周一到周五每天凌晨2点半左右向所有师生发送学院活动（HKS Event）邮件，预告院长活动、今明日以及近期活动安排。肯尼迪学院主办的活动让人印象深刻。学院从早上8点到下午6点不间断地举办各种活动，平均每天有30场。其中，院长活动是由学院办公室组织的全院范围的交流和讨论活动（Community event），为院长与师生讨论公共议题提供交流平台。其他学术活动包括研讨会、午餐会、讲座、学习小组，主题覆盖国际安全、人工智能、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疾病与控制、人权、性别与女权运动等。有些活动要求注册并提供简餐，间接地鼓励了学生们去参加主题多元的学术活动，学生们也顺便解决了一日三餐。与我同在一个项目的同事们开玩笑说，体现一个学院或研究中心财力与实力的最好指标是看它提供的食物。的确，肯尼迪学院不仅组织精彩的活动，而且提供美味的饮食。所有大型活动中，学院每周举办的2-3次论坛，即肯尼迪论坛（John F. Kennedy Forum），是肯尼迪学院以及哈佛大学最受师生青睐的学术活动。由于受邀嘉宾包括各国元首、政府要员、学界权威与企业总裁，因此，我们有近距离与他们进行对话的机会，因而感觉到高大上的政治与国际安全事务距离我们并不遥远。有好几次我在学院食堂碰到肯尼迪学院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主任、美国前防长卡特（Ashton Carter），也曾旁听肯尼迪学院首任院长、里根特别顾问艾利森（Graham T. Allison）教授与知名国际关系学者沃尔特（Stephen Walt）教授的课程。在这些制度设计的细节与交流互动的活动中，哈佛人不断探寻“真理”。

“问问自己可以做什么”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Harvard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HKS）是在两所学院合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一所是始建于1936年的公共管理研究生院，另一所是为了纪念遇刺身亡的校友肯尼迪（John F. Kennedy）总统而在六十年代成立的哈佛政治学院。为了表达

对肯尼迪总统的尊重与缅怀，合并后的学院仍保留了他的名字。学院院训为“问问你自己可以做什么（Ask what you can do）”，选自肯尼迪总统1961年1月20日在华盛顿特区的就职演说词：“不要问国家可以为你做什么，你应该要问自己可以为国家做什么（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院训简约而不简单。它呼吁学院所有学生学者、教职员工为国家发展去贡献自己的智慧和汗水，而不是坐等国家为个人分配面包。如今，院训已不再拘泥于最初的“问问自己可以为国家做些什么”，而是逐渐发展为“问问自己可以为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做些什么”。每个向肯尼迪学院递交入学申请的人，几乎都会被委员会问道：“你认为你怎么做可以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心系社会、国家与世界发展，宛如中国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肯尼迪学院已形成独特的体系，不论是从广泛的校友网络还是强大的全球影响力而言，肯尼迪学院已经发展为世界顶尖的公共政策学院。

肯尼迪学院是哈佛大学的一所研究生院，除了主要开设硕士课程并授予硕士以及少量博士学位，还与哈佛商学院、法学院、医学院，以及国内外知名院校共同开设学位课程。学生大多具有工作经验，他们来自各国政府、国际组织、企业媒体等公私部门，所学课程强调实用性与政策性。肯尼迪学院为世界各国、国际组织以及学术界、企业界培养了许多重要的领



领导人、学者与企业家，知名校友包括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世界银行前行长罗伯特·佐利克、里根总统特别顾问格雷厄姆·艾利森、香港特别行政区前行政长官曾荫权、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等。肯尼迪学院拥有近60个项目、倡议与中心，财力雄厚且影响最大的几个研究倡议与学术中心包括艾什民主治理与创新研究中心（Ash Center for Democratic Governance and Innovation）、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政治学会（Institute of Politics）等。其他倡议与中心包括穆萨瓦-拉赫玛尼商业与政府研究中心（Mossavar-Rahmani Center for Business and Government）、卡尔人权政策研究中心（Carr Center for Human Rights Policy）、舒文斯坦媒体、政治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Shorenstein Center on Media, Politics and Public Policy）、妇女与公共政策项目（The Women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等。这些研究项目涵盖了公私部门所有研究领域，它们的办公室分散在肯尼迪学院L型主楼的各个地方。

艾什中心是唯一没有将其办公地点设在肯尼迪学院主楼群里面的研究中心，它位于肯尼迪学院几百米开外的奥本山大街与大学路的交叉路口。艾什中心下面设有民主治理、政府创新、科技产业、公共参与等项目，为博士生及博士后提供有关民主、历史与公共政策、美国政府创新、危机管理、科技与民主等研究领域的访问机会，并为实务工作者提供培训教育（Executive education）。近年来艾什中心获得了较多的捐赠，有一些是以捐赠者冠名的项目。其中，比较知名的项目如我所在的拉贾瓦利基金会亚洲研究所（Rajawali Foundation



Institute for Asia)。在肯尼迪学院诸多学术中心与研究项目中，艾什中心是主要将研究聚焦在中国问题的学术机构，因此与中国的学术联系较为紧密。目前，除了与中国极少量几所大学建立了博士生访问学者（pre-doctoral fellowship）合作关系以外，艾什中心还招收中国项目博士后研究人员（postdoc fellowship），并为科技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上海行政学院等单位的处级干部、研究与教职人员提供访问的机会。今年和我同一期的访问学者（2017-18年）共29人（其中10名为中国高校在读博士研究生），都被冠名为亚洲学者（Asia Fellows）。访问学者的工作职责与研究方向都不尽相同，但我们需要定期参加中心为我们组织的学术研讨会，主要是月度系列研讨会（Visiting Scholars/Practitioners Monthly Seminar Series）以及半月周三系列研讨会（Rajawali Doctoral Fellows Wednesday Workshop Series）。已经工作在职的访问学者必须参加月度研讨会，博士生与博士后则不强制参与。而周三系列研讨会则是闭门研讨，只允许博士后与博士生参加并轮流展示自己的研究，大家提出修改意见。总体而言，在访问学者项目主管浦山香（Kaori Urayama）女士的精心安排和组织下，每一场研讨会都取得很好的效果。对于博士后而言，发表他们的成果是主要目的；而博士生更关心如何构思自己的博士论文，研讨会在这方面达到了它的目的。

除了肯尼迪学院组织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主题的活动，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亚洲研究中心、哈佛燕京学社等机构也举办有关中国与国际关系的研讨会与讲座。2016至2017年，费正清中心与亚洲研究中心共同组织了以“中国面临的核心议题（Critical issues confronting China）”为主题的系列讲座，组织者为费正清中心前主任傅高义（Ezra F. Vogel）教授与亚洲中心资深研究员欧威廉（William Overholt）博士。受邀讲座嘉宾是各个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比如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心主任李成（Cheng Li）博士评估习近平时代的集体领导制度、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哈定（Harry Harding）分析海峡两岸关系困境、知华派学者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畅谈中美关系、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卜睿哲（Richard Bush）解读中国大陆的港台政策等。谢淑丽（Susan Shirk）、傅立民（Chas W. Freeman）、包道格（Douglas Paal）等学界与政策界的专家都曾受邀前来。哈佛大学学术氛围非常浓厚，专家学者们也鼓励并提携后辈。我在10月份与哈佛大学台湾研究项目主任戈迪温（Steven Goldstein）教授取得了联系，并对他进行了学术访谈。经戈迪温教授引荐，我认识了慕名已久的知华派学者、MIT政府系教授傅泰林（M. Taylor Fravel），并再次见到了在国内就已认识的陆伯斌（Robert Ross）与博士卓（Joseph Fewsmith）教授。通过与他们的交流和访谈，我获得了很多研究资料与灵感，对自己的学术研究起到较大的帮助。

感恩前行

充满不确定性是生活的本质，也是其魅力所在。我从未料想自己能够如此幸运，有机会到世界最知名的学府深造学习。这一宝贵机会的获得除了自己一直以来不懈的努力与争取外，导师一如既往的支持、学校学院提供的平台以及国家留学基金委的经费保障同样不可或缺。

我非良驹，但经常感恩我的导师林冈教授。他有如伯乐，总是督促我们不断学习、进步。这几年学院国际化办学成果颇丰，谢谢为此不断奉献的各位领导老师与工作人员。据我所知，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高等院校与研究机构都想与哈佛大学建立合作关系，但是他们伸出的橄榄枝并非都能引起哈佛的关注。哈佛也因此成为学生与学者最想申请，但又最难被录取的高校。如今，交大国务学院是紧随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之后，第二所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建立官方合作关系的学院。在中国大陆所有高校中，目前也就只有清华经管学院、北大政管学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与交大国务学院几乎同时和哈佛肯尼迪学院建立了合作联系）以及交大国务学院等三所院校与哈佛肯尼迪学院建立了正式的协议合作关系。国务学院的办学水平得到了国际认可，这是最好的证明。为了更好的为国家发展与社会建设提供优

秀的人才，国家这几年尤其加大了对学生学者出国留学与访问的资助范围和力度。我很幸运在硕博期间连续两次获得教育部留学基金委员会资助出国学习交流的机会。交流与对话促进彼此的理解，我因此对所谓的“文明冲突论”抱有怀疑。只有开放包容的心态、广阔的视野以及文化间的深度交流与即时沟通，方能消弭这种悲观认知。

中西方文明与制度各有优劣，我们要用包容的心态与批判的思维去交流。若彼此取长补短，双方才能受益。文明对话如此，学术交流更是这样。我们年轻学者，既要有仰望星空的宏大视野，更需辅以脚踏实地的勤恳作为。我相信，通过在哈佛一年的访问与学习，自己的专业能力与学术涵养都将获得新的提升。

周文星
哈佛大学拉蒙特图书馆
2017年11月5日





狮城行

Why exchange? Why NUS?

麦婷茜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16级硕士研究生



留学海外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心愿，可惜在本科期间我并没有遇到好的机会，于是在硕士阶段之初，我便决定一定要找机会出国交流学习，圆自己一个梦。在我眼里，去到另一个国家、另一所学校做交换生，是和出国旅游很不一样的体验，甚至可以说，它能带给我们许多旅行所不能获得的东西。在交大，国际合作与交流的氛围非常浓烈，我们身边就有很多不同国家的同学和我们一起学习、生活。对于我们国务学院来说也向来不乏好的交流项目，比如我们和美国南加州大学、法国巴黎政治学院、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等世界知名高校的合作项目，每一个都是干货满满。而我——一个喜欢热带与夏季的女生，这次选择了参加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合作的院级交流项目。站在交换生活的尾巴上，我想说，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这是一段美妙的旅程！

新加坡是一座小到在世界地图上几乎看不到的城市，然而就是这么小小一方土地，却成为了亚洲经济发展的领导者之一。这里城市规划良好，国民素质极高，不同种族的融合更是彰显出这座花园城市巨大的包容力。因为注重教育与人才培养，新加坡政府在高校的建设上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因而建成了以新国大与南洋理工两大名校领军的高等教育系统。无论是新国大还是南洋理工，都在世界高校排名中占据着很靠前的位置。这一次交换学习，我好好地感受了一把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学生们是如何利用优越的资源在学习和生活中大放异彩的。

Study hard, play hard

在新加坡交流期间，我修习了三门课程，分别是《城市规划》、《新加坡政府与政治》和《食物社会学》。因为新国大并没有公共管理专业，所以我根据交大的课程学习要求修习了前两门有相似之处的课程。另外根据我“吃货”的兴趣，选择了后一门。一个学期下来，无论是哪一门课，我都非常享受征服它的乐趣。全英语教学并不容易，尤其是在新加坡，混杂着各色口音的老师也许会让你在第一节课上傻眼。不过，正因为有挑战，才有了乐趣和进

步的空间。社科类的本科课程都不会太难，但几乎所有课程都会包含各式各样的“套路”：城市规划课程上，老师带我们到乌敏岛做 fieldtrip；新加坡政府与政治课上，会有公职人员来到课堂和我们进行对话，而各国学生提出的问题也相当犀利；食物社会学的老师则要求我们写饮食日志，记录并发现自己吃了什么；每门课还都会有一个小组合作项目，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完成一份课程项目。在这里，我看不到学生低着头玩手机的课堂，老师们也都花样百出确保你听懂他所讲的内容，一堂课很短，只有 90 分钟，但学习效率非常高。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方面就是新加坡的校园活动氛围。从我还没到新加坡的时候，就陆陆续续有校内与国际交流有关的组织通过邮件联系我们，鼓励我们参加各类活动。报到入学后，更是接近两周的时间通过各种活动帮助我们快速融入当地文化与校园生活，例如学习 singlish，城市徒步游，欢迎晚宴等。在这些活动中，我认识了很多新朋友，更是体会到新加坡本地学生在举办这些活动时的诚意与热情。他们贯彻了那一句“study hard, play hard!”，可以为了玩忙碌一整天，把一切组织的井井有条，然后忙到凌晨再钻进自习室学习。还有让我印象深刻的一点是新加坡学生对运动的热忱。健身房、运动场、游泳馆全天候都有人挥汗如雨，飞盘、攀岩、健美操等各式各样的运动都能得到许多人的青睐。虽说同根同源，但新加坡华人学生对力与美的追求似乎远高于中国学生。也正是这些运动，把学生之间的关系拉的更近、绑的更近，极大的促进了他们的团结意识。

交换生活还有一个不可不提的关键词是：旅游。无论是在新加坡还是在欧洲、美国，随着交换生活而来的是大把的旅游机会。交换期间，我们的课程压力通常不大，目标学校周边通常会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因此一定要把握大好的机会走到更多地方。就我个人而言，我十分喜欢大海，位于东南亚中心的新加坡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天堂。在交换期间，我去到了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好几座海岛，考取了 PADI 潜水执照，酣畅淋漓地领略了一把大海的魅力。而同期的其他交换生更是把足迹留遍整个东南亚以及南亚，或是品尝世界美食，或是探索自然奥秘，或是偶遇更多的陌生人，一眼掠过别人的故事与人生。

Conclusion

总的来说，新加坡还是以华人社会为主的，因此生活习惯、语言沟通和饮食习惯还是很容易接受和习惯的。更多细节不在此过多赘述，因为生活只有自己去经历才会更加觉得精彩。

一段完整的交换经历应该等于全新的教学模式加丰富多彩的社交活动，再加新的国度下的生活体验。学习给予我智慧，社交给予我生动，生活给予我成熟。独自在异国生活、学习实在是一段难得而宝贵的经历，正所谓一日难再晨，趁着年轻气盛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而不要等到将来连挤出时间度假都变得困难时再后悔。虽然在坡国只有短短四个月的时间，但我会永远对这段日子心怀感恩，把新加坡和新国大珍藏在我的心底。





巴黎政治大学交换基本情况

金荃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本科生

- 交换学校：巴黎政治大学
- 申报时间：2016年9月30日
- 获得 offer 时间：2016年11月6日拿到电子 offer
- 派出时间：2017年1月18日
- 回国时间：2017年6月1日
- 主要课程：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学分
BAFF 59603	文化历史视角下的跨太平洋国际关系	5
BSOC 53822	组织社会学	5
DAFF 59445	从国际关系看欧洲一体化	5
LANG 50826	英语语言课	5

- 未能申请到优本项目的原由：

估计是因为规定时间内材料不齐全（国家留学基金委优本 2017 春季项目申请的截止日期是 2016 年 9 月 30 日，需要网上填写资料并上传相关文件，包括对方学校的 offer。而我当时完成了相关填写，但当时我刚刚拿到本校该项目的提名，还没有收到巴黎政治大学的 offer，所以并没有办法上传对方学校的 offer。）

注明：据留办沈丽丽老师说当时全校只有两个同学申请到了优本的名额。

- 在巴黎政治大学参加过的学术活动：

2017 年 4 月 18 日 19:15: SCIENCES PO Environmental Conference Debate

2017 年 3 月 20 日 12:30-14:30: Sociology Workshop

- 作为上海交通大学海外大使在巴黎政治大学发动举办的活动：

线下活动一：春节活动

- ◇ 春节活动：茶艺秀，包饺子绝活，书法写春联，小游戏
- ◇ 负责现场拍照，包饺子，活动回顾推送《春节就要嗨翻天！》



线下活动二：文化交流——刘震云讲座

- ◇ 著名作家刘震云讲座
- ◇ 3 人负责 150 人活动

文案宣传推送（约 1100 余字）

现场会务安排（背帖、播放视频、现场拍照）



线下活动三：多文化美食节

- ◇ 3.31 日 UNEF&文化社团
- ◇ 摊位的联系申请
- ◇ 赴中超购买食物（受资金和时间限制）
- ◇ 摆摊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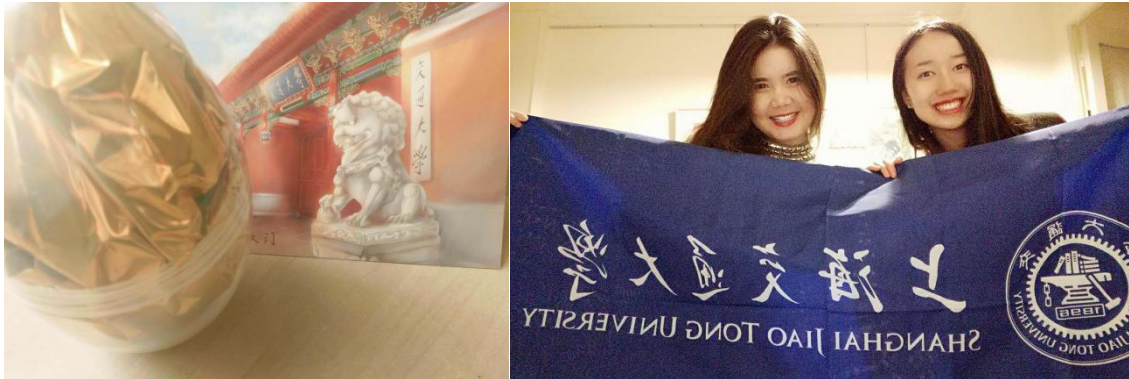
线下活动四：展位摆摊

- ◇ 展位联系申请
- ◇ 展位布置
- ◇ 展位介绍（9 人）
- ◇ 展位流量的吸引方法



线下活动五：复活节活动

- ◇ 提前发出邀请
- ◇ 准备了3个彩蛋（内置中国风耳饰、护手霜、彩虹糖她们很喜欢!!!）
- ◇ 愉快的进餐，聊起中国的节日、上海交大、中国建筑等话题



线下活动六：Impact 周边

- ◇ 积极参加野炊活动，结交私人朋友，课堂分享中国故事
- ◇ 面对误解的三种巧妙处理态度



线上活动：微信公众号推送

C2: 做 2 份推送

◇ 《春节就要嗨翻天!》

◇ 《“潘金莲”来巴政啦》

大使团: 2 份随笔文章 (4000 余字)

◇ 《我为什么在做正在做的事情》

◇ 《探索巴黎》

线上活动: 知乎&学弟妹指导

一、校园篇



1) 选课

春季学期的一轮选课时间是在 1 月 9 号—1 月 11 号，二轮选课时间是 1 月 25 日—1 月 27 号。每年的选课时间虽然不是完全相同，但是基本变化不大。巴政本科是不设立专业的，你可以随意挑自己喜欢的课来上，对交换生开放的课程种类有经济，法律，历史，人文，国际关系，社会科学，社会学。与咱交大选课不同的是巴政的选课可以说只有一轮，因为第二轮是专门选体育课的（体育课 hin 多好玩的课程，比如击剑，拳击，马术啥的）。所以，选课前要做做功课，选课时才能眼疾手快，当机立断。

选课前的功课:

巴政既有法语授课课程和英语课程课程，课程种类分为以下几种。具体的选课功课你要参考官网上看一看课程大纲和要求，网址：<http://college.sciences-po.fr/siteparis/english-seminar#spring>，不要太贪心选过多的课，巴政的课程要求是比较严格的。



THE DIFFERENT TYPES OF COURSES AT SCIENCES PO

- ⊕ Cours magistral or Lecture: 48 hours
 - ⊕ 1 course by a professor in an amphitheater, usually around 150 to 300 students
 - ⊕ 1 course by a maître de conférence in smaller groups of 20 to 24 students
- ⊕ Seminars: 24 hours
 - ⊕ groups of 60 to 100 students
 - ⊕ a dedicated Teaching Assistant with 6 sessions of tutorials
- ⊕ Electives: 24hours
 - ⊕ groups of 20 to 24 students
- ⊕ Workshops ou Ateliers de pratique artistique
 - ⊕ groups of 15 to 18 students
 - ⊕ dedicated to the practice of an art and the intellectual reflexion on it

学分转换:

要自己积极主动找所在院系相关课程的老师就课程大纲进行沟通的，能够转换学分的课程成绩用 P 和 F 显示。

特殊情况:

第一，如果忘记选课，选不到课，或者网络故障，大可不必着急，你需要做的就是发邮件给 Administration office+捡课。第二，前两周是可以退课的，要去行政办公室填个表，给个理由。第三，没选到的或者不敢选的大课可以蹭听，但是小课就别闹了。

2) 语言

巴政是提供语言课程的，有英语，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和德语。另外，还有免费的语言辅导（学姐力荐），每次一对一外教辅导 20 分钟，但是需要提前发邮件预约。

3) 图书馆

No. 27 图书馆开放时间是：周一到周五 9am-11pm, 周六 9:30am-9:30pm

No. 30 图书馆开放时间是：周一到周五 9am-9:30pm, 周六 9:30am-8pm

图书馆预约借书时长是一个月，当下借书时长是 10 天。但注意的是，刚来记得去行政办公室拿自己的学生卡，这个hin重要的，第一次借书前先保证已经激活自己的校园卡。校园卡里学校提供了有 30 欧的打印费，可以在任意层图书馆打印室打印资料。

至于熟悉校园，有四种打开方式，第一，报名学校的 welcoming party，第二，和你的 buddy 联系（你在来之前会收到巴政 buddy program 的邮件，你主动联系你的 buddy 就可以啦）；第三，学长学姐带我飞，可以约群里的交大学长姐或者参加 Sciences Po Club Chine 的 warming up 活动（简称 C2，巴政学生学者俱乐部，在开学的时候会有学长学姐带你逛校园）；第四，自我探索，嘻嘻嘻，我就选择第四种，也蛮好玩的。

二、生活篇

1) 交通

交通票分为普通票，周票，月票和年票。普通票一张 1.99 欧，一次买 10 张 14.5 欧更划算。一张票可以在小巴黎范围内转乘（包括由地铁转乘公交）。如果每周出行 12 次以上，建议带好证件照去办理月票。一些地铁线路到站需要自己开门。

Google map, RATP 等 app 应用提前下载好，因为其实机场到家不一定需要专人接送（出租车或者找人接送都不便宜）。在欧洲境内旅游时，如果预定了廉价航空，记得 check 订单，提前打印登机牌。

2) 租房

办签证的时候就会需要租房证明，一般你的巴政空间里会提供一些租房网站和信息，Airbnb 网站上面也会有一些比较好的房源，同时每年巴政校友微信群里会有很多好的房源，

所以不要担心租不到房子，要货比三家。租房要注意地理条件，比如安全，离学校近等。

3) 银行卡

巴政的交换学生建议去红与黑这家银行开银行帐户，第一离学校近，第二，该银行对巴政学生有一个特殊项目，可以免费帮你的房子买保险（这个一般是在这边租房必须要买的）。但需要注意的是，这边的服务需要提前预约（可电话预约也可当面预约）。



4) 吃饭

你可以去学校的 snack bar 吃饭，No. 56 地下一楼买三明治和咖啡比较好，很大的三明治只要 3.3 欧左右。小三楼吃正餐比较划算，同时提供水果甜点。（可能刚开始挺新鲜，但久了，不大能满足你的胃。）

由于饮食文化差异，如果自己做饭的建议来法国前先带些盐，花椒，老干妈等调味品（也可在这边的华人超市买），做饭的其他食材基本在超市里都买的到。

在这里给大家安利一个公众号：寻味巴黎。

5) 建议大家来之前学点 survival French.

在这边生活学一丢丢生存用的法语会有很大帮助的。一般年轻的法国人英语都还可以，但是稍微大点的人英语就不是很好了，另外会法语会提升好感。

三、游玩篇

1) 景点凭借学生卡免费

巴黎还是有 hin 多景点的，比如说沿塞纳河的如卢浮宫等众多景点，或者是稍微远一点的凡尔赛和圣米歇尔山，但注意周一闭馆。

2) 购物

打折季是 1 月和七月，基本上都会做不同层次的促销活动（但是傲娇的某些一线大牌不打折，如 LV）

药妆店大概每半月打一次折。

如何最快知道打折消息？在其官网注册帐号，会收到邮件或者短息。

3) 推荐 Rue Mouffetard 街上物美价廉的法餐馆，如 Volcan。

No. 2 巴黎政治学院交换随笔 1 | 我为什么做我正在做的事情

就在在大三老腊肉们都开始思考自己今后读研方向或者工作方向的一月，我选择了去一个陌生而又浪漫的国度进行为期一学期的交换，忐忑而又兴奋。

如果说申请去巴黎政治学院交换的过程，我就像搭乘了一列幸运列车，那么来巴黎的这两周生活，我就像坐着吃到蜂蜜的维尼熊。

发芽在我走之前小心翼翼地问我，“小荃是怎么想的呀，怎么突然要去巴政交换啊？”

其实，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为什么，人生百年，我就想做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说白了，就是任性地给自己 0.5 个 gap year，尝试着去做所有我没有尝试过的事情。

在谢列蔑契娃机场等待的十几个小时里，我和来自韩国，西班牙，伊朗，和法国的五个陌生人聊着天，并学着用他们的国语说三句话，“很高兴认识你”“我叫 Chuan（老外发不出 Quan）”“我很喜欢你们国家”。

为了满足自己的味蕾，在厨房一边做着煮着意大利面煎着牛排，一边振臂高呼“我要成为大厨啦”（无数次在做饭时脑海中都会浮现厨神的片段，哈哈哈哈哈）在佳雯和美国小哥的



带领下做出美味的中西餐料理，真正成为了一个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的人。

享受着20多人的小课堂的讨论，参加学校学生联合会的warming活动。在课堂上手脚并用的和老师同学们交流着，说着Trump的muslin ban，扯着bureaucracy的利弊，似懂非懂地聊着Mereantilism。偷偷对比自己和国外学生的思维和表达差异，并且在一次次的debate中改进。春节和法国同学一些学习茶艺，写毛笔字，吃饺子。

来巴黎的一周里，我吃过了酥香的法棍和羊角面包，体验了在冬日暖暖的阳光下躲在咖啡馆里的一角和朋友用国语肆无忌惮地畅聊，珍惜着在塞纳河边散着步的悠闲，任由自己泡在卢浮宫里，目前在攒钱希望春假能去瑞士滑雪，去罗马雅典娜看看图拉真柱和帕特农神庙！

人活着，就是要开心嘛！

公共管理前沿问题

1、互联网医疗信息溢出与中国居民就诊选择——基于 CHNS 混合截面数据的实证研究

作者：刘宸，周向红（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出处：公共管理学报

期数：2017 年 04 期

摘要：制度、价格、医疗保险是分级诊疗的研究焦点，而“信息”的价值未被足够重视。在互联网时代，医疗信息呈现溢出态势。本文关注了互联网医疗信息溢出与居民就诊选择的关联。研究基于医疗知识的异质性构建了理论假设，而后利用 2006—2011 年 CHNS 混合截面数据和多项 Logit 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互联网医疗信息溢出引发了个体就诊选择的两极化，突出表现为自我诊疗、高等级医院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患者的分流。互联网打破了普通疾病的知识壁垒，产生了自我诊疗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替代效应，不过疑难杂症及重大疾病的知识垄断不会被消解，自我诊疗无法替代高等级医院。信息供给的增加也为决策带来了“噪音”，加剧了正规医疗机构就诊的“趋高倾向”。本文不仅将“信息”纳入了医疗卫生需求的研究分支，也为分级诊疗诱导机制的设计提供了“互联网+”的思考方向。

2、中国城市治理研究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基于学术论文的计量分析

作者：吴建南，郑长旭（上海交通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

出处：中国行政管理

期数：2017 年 07 期

摘要：本文基于中国期刊网和 web of science 中国作者的论文数据，运用文献计量方法，从研究热点、学科分布、合作网络三个维度，分析了中国城市治理研究的过去与现在，并对未来进行了预测。分析表明：过去 20 余年中，中英文研究热点各异，中文文理学科交叉少，合作网络也不多，而英文则涉及更多环境学科等交叉研究，合作网络密集，研究群体稳定。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这两年中，中文论文中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研究已占鳌头，英文学科交叉依然明显，而中文合作网络虽有增加但数量依然较少，文理学科交叉更是有待推进。从未来发展趋势看，将会有更多学者从事城市治理研究，而政府、高校以及国家有关资助机构若能给以进一步支持，则更会推动城市治理研究的繁荣。

3、政治关联会影响中国草根 NGO 的政策倡导吗？——基于组织理论视野的多案例比较

作者：李朔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出处：公共管理学报

期数：2017 年 02 期

摘要：本文旨在探讨政治关联对于中国草根环保 NGO 政策倡导的影响。在整合经典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的基础上，通过对浙江省 H 市三个草根环保 NGO 的多案例比较，发现在中国情境下，政治关联对草根环保 NGO 政策倡导的影响体现出与西方线性关系截然不同的特点：由于资源依赖和合法性压力的双重作用，政治关联与政策倡导呈现倒 U 型的关系，即过强或过弱的政治关联都会对 NGO 的政策倡



导产生消极影响,而与政府保持“若即若离”的NGO反而更有可能介入到政策倡导中。这不仅对于理解中国草根NGO政策倡导行为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暗示了相较于其他类型的草根NGO组织,合法注册的草根NGO对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性。由于案例研究的局限,对于该结论的扩展性未来应进行进一步挖掘,同时学术界应对合法注册的草根NGO进行更加深入和系统的研究。

4、激励-贡献导向下心理契约差异对公务员离职倾向的影响——基于公共服务动机和变革态度的综合分析

作者:谭新雨,刘帮成,汪艳霞(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出处:公共管理学报

期数:2017年04期

摘要:依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职务职级并行等变革举措给公务员职责要求、薪酬晋升等带来重要变化的现状,本研究从不同工作要求-资源类型的公务员心理契约差异来分析变革后他们在变革态度、离职倾向方面的差异。基于贡献-激励理论,本研究设计抽样框对不同省份不同单位的公务员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及问卷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当公务员处于工作要求低于工作资源时,激励导向的心理契约令他们更支持变革、积极工作;反之,贡献导向契约关系令他们抵制变革、倾向离职。本研究从贡献-激励视角拓展了变革背景下公务员离职倾向、心理契约的相关研究,从内、外动机存在“挤出效应”拓展了自我决定理论的相关研究,剖析了变革背景下公务员抵制变革、离职的动机,为相关部门交叉运用发展性和物质性激励、识别并激发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知人善任等变革管理提供了有价值的启示。

5、协同治理中的多样性,信任和社会学习

作者:Saba Siddiki, Jangmin Kim, 威廉D.利奇

出处: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期数:2017年77卷6期第863-874页

摘要:关于协作治理的奖学金确定了持续影响治理结果的若干结构和程序因素。合作治理研究的下一步将是探索这些因素如何相互作用。本文着重于社会学习的两个维度 - 关系和认知 - 作为合作的结果,考察了参与者多样性和信任的潜在相互作用效应。实证设定需要在美国提供10个合作伙伴关系,为海水养殖政策提供咨询意见。研究结果表明,参与者信念的多样性与关系学习正相关,而参与者的从属关系多样性与关系学习呈负相关,而高度的信任加强了信仰多样性对于关系和认知学习的积极作用。此外,高度信任降低了从属关系多样性对关系学习的负面影响。对协作治理多样性的更细致的了解对于设计和促进不同利益相关者群体具有实际意义。

6、相关基础:街头级官僚工作场所网络形成的理论和证据

作者:穆罕默德·阿扎法·尼萨尔, Spiro Maroulis

出处: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期数:2017年第77卷第6期第829-839页

摘要:尽管同伴在形成角色期望,培养群体认同和促进就业学习方面的重要性,

但是在街头同辈关系的前因后面还存在着有限的理论和经验证据。为了弥补这一差距，作者利用社会资本和社会交换理论来发展关于街头官僚同行选择的微观社会基础的假设。这些假设使用来自大型城市学校教师组织内网络的丰富数据集进行测试，实施了强有力的前线创新改革。结构性和工具性的考虑，比如寻找具有改革价值的特点和资源的同伴，在街头官僚的工作关系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政治学前沿研究

1. The Behavioral Immune System Shapes Political Intuitions: Why and How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Disgust Sensitivity Underlie Opposition to Immigration

作者: LENE AARØE *University of Aarhus*

MICHAEL BANG PETERSEN *University of Aarhus*

KEVIN ARCENEUX *Temple University*

出处: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17) 111, 2, 277–294

摘要: We present, test, and extend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at connects disgust, a powerful basic human emotion, to political attitudes through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designed to protect humans from disease. These mechanisms work outside of conscious awareness, and in modern environments, they can motivate individuals to avoid intergroup contact by opposing immigration. We report a meta-analysis of previous tests in the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conduct, for the first time, a series of tests in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samples collec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Denmark that integrate the role of disgust and the behavioral immune system into established models of emotional processing and political attitude formation. In doing so, we offer an explanation for why peaceful integration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ethnic majority and minorities is so hard to achieve.

简介: 本文将一种强大的基本人类情感——厌恶，与政治态度联系起来，说明这种心理机制如何在现代环境中，使得人们无意识地反对移民与避免同移民群体之间的联系。作者通过对美国和丹麦收集的全国代表性样本进行的一系列测试，将厌恶和行为免疫系统的作用整合到建立的模型中情绪处理和政治态度形成，从而解释了为什么和平融合以及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互动如此难以实现。

2. Childhood Skill Development and Adult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作者: JOHN B. HOLBEIN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出处: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17) 111, 3, 572–583

摘要: Recent child development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psychosocial or noncognitive skills that children develop—including the ability to self-regulate and

integrate in social settings—are important for success in school and beyond. Are these skills learned in childhood also important for adult political behaviors like voting? In this article, I use a unique school-based 20-year field experiment to explore whether children who develop psychosocial skills early on are more likely to vote in adulthood than those who do not. Matching subjects to voter files, I show that this intervention had a noticeable long-run impact 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ese results highlight the need to better understand how childhood experiences shape civic behaviors later in life. During this critical period, children can be taught the not explicitly political, but still vital, skills that set them on a path towar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adulthood.

简介：最近的儿童发展研究显示，儿童发展的社会心理或非认知技能（包括自我调节和融入社会环境的能力）对于学校及其他领域的成功至关重要。作者本文的研究问题是：这些技能在童年阶段学习对成年人的投票等政治行为是否有重要影响？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使用了一个独特的、以学校为基础的 20 年实地试验来探讨早期发展心理技能的孩子是否更有可能在成年时投票，从而说明这种干预是否能够明显的、长期的影响成年时期的政治参与。结果突出表明，在儿童这个关键时期，孩子们可以被教授不明确的政治，但儿时的经历对于塑造之后生活中的公民行为具有关键作用。

3. Policy Uptake as Political Behavior: Evidence from the Affordable Care Act

作者：AMY E. LERMA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MEREDITH L. SADI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SAMUEL TRACHTMA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出处：*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17) 111, 4, 755–770

摘要：Partisanship is a primary predictor of attitudes toward public policy. However, we do not yet know whether party similarly plays a role in shaping public policy behavior, such as whether to apply for government benefits or take advantage of public services. While existing research has identified numerous factors that increase policy uptake, the role of politics has been almost entirely overlooked. In this paper, we examine the case of the Affordable Care Act to assess whether policy uptake is not only about information and incentives; but also about politics. Using longitudinal data, we find that Republicans have been less likely than Democrats to enroll in an insurance plan through state or federal exchanges, all else equal. Employing a large-scale field experi



ment, we then show that de-emphasizing the role of government (and highlighting the market's role) can close this partisan gap.

简介: 党派关系是预测公共政策态度的主要因素。但是,我们还不知道政党是否同样在塑造公共政策行为方面发挥作用,如是否申请政府利益或者利用公共服务。现有研究已经确定了许多增加政策吸收的因素,然而政治的作用几乎完全被忽视了。本文作者考察了“可负担医疗法案”的情况,以评估政策的不成立只是否只是关于信息和激励。本文作者使用纵向数据,发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共和党人比民主党人通过州或联邦交易所参加保险计划的可能性要小。因此,通过大规模的实地试验可以发现,不强调政府的角色(并强调市场的作用)可以弥补党派间的差距。

4.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nfinished Development Projects: Corruption, Clientelism, or Collective Choice?

作者: MARTIN J. WILLIAMS *University of Oxford*

出处: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17) 111, 4, 705–723

摘要: Development projects like schools and latrines are popular with politicians and voters alike, yet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littered with half-finished projects that were abandoned mid-construction. Using an original database of over 14,000 small development projects in Ghana, I estimate that one-third of projects that start are never completed, consuming nearly one-fifth of all local government investment. I develop a theory of project noncompletion as the outcome of a dynamically inconsistent collective choice process among political actors facing commitment problems in contexts of limited resources. I find evidence consistent with key predictions of this theory, but inconsistent with alternative explanations based on corruption or clientelism. I show that fiscal institutions can increase completion rates by mitigating the operational consequences of these collective choice failures. These findings have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implications for distributive politics, the design of intergovernmental transfers and ai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tate capacity.

简介: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政策或项目实施中的中断情况。作者认为像学校和厕所这样的发展项目在政界和选民中都很受欢迎,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却散布着一些中途放弃的半完成项目,以加纳 14,000 多个小型开发项目为例,尽管这些项目占地方政府投资的近五分之一,但作者估计三分之一的项目开始从未完成。由此作者提出了一个项目不完成的理论,作为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面临承诺问

题的政治行为者之间动态不一致的集体选择过程的结果。作者发现与这个理论的关键预测相一致的证据，但痛基于腐败或庇护主义的替代解释不一致。作者表明，财政机构可以通过减轻这些集体选择失败的操作后果来提高完成率。本文的发现对于分配政治，政府间转移和援助的设计以及国家能力的发展具有理论和方法上的意义。

5. Does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Lead to a Decline in Voter Turnout? Global Evidence Since 1939

作者：FILIP KOSTELKA *Universit'e de Montr'eal and Sciences Po*

出处：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17) 111, 4, 653–667

摘要： This article challenges the conventional wisdom that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depresses voter turnout. Studying democratic legislative elections held worldwide between 1939 and 2015, it explains why voting rates in new democracies decrease when they do, how much they decrease, and how this phenomenon relates to the voter decline observed in established democracies. The article identifies three main sources of decline. The first and most important is the democratization context. When democratizations are opposition-driven or occur in electorally mobilized dictatorships, voter turnout is strongly boosted in the founding democratic elections. As time passes and the mobilizing democratization context loses salience, voting rates return to normal, which translates into turnout declines. The second source is the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context, which seems to depress voter turnout only in post-Communist democracies. Finally, new democracies mirror established democracies in that their voting rates have been declining since the 1970s, irrespective of the two previous mechanisms.

简介： 这篇文章挑战了民主巩固压制选民投票率的传统观点。作者研究了1939年至2015年间在全世界举行的民主议会选举，解释了为什么新民主国家的投票率下降，减少了多少，以及这种现象与已建立的民主国家的选民衰落之间的关系。文章指出了三个主要的衰落来源：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民主化的背景，当民主化是由反对派推动或在选举动员的独裁统治下发生的时候，其在建立民主选举中强烈推动选民投票率，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动员的民主化背景失去了显着性，投票率恢复正常，转而投票率下降。第二个来源是民主巩固的背景，似乎只有后共产主义民主国家压低选民投票率。最后，新的民主国家反映出已建立的民主国家，因为它们的投票率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在下降，而不管前两种机制如何。



成果

◆ 国家级、省部级项目立项情况

- 省部级以上项目共计 19 项，科研到款经费 587.02 万

国家社科 2 项

张攀 五年规划体制下环境目标设置的环境效应与作用路径研究 青年自选项目（吴建南）

张录法 分级诊疗导向的纵向整合医疗服务体系研究 一般项目（韩广华，吴建南，樊博）

国家自科 2 项

史东波 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的超级科学家——基于个人因素与制度因素的实证分析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G040402. 科研管理（已上会）

杨帆 城镇化中社区环境对农村老人心理健康影响的评估及优化机制研究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G040103. 社会与区域治理

上海哲社 3 项

徐家良 “互联网+”背景下的上海社区治理创新实践经验研究 系列项目

郭俊华 上海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政策效果评价研究 系列项目

沈洋 上海青年购房决策中的代际关系与伴侣关系研究 青年专项

教育部哲社重大 1 项

吴建南 大气污染政府间协同治理机制研究

国家社科重大项目 1 项

徐家良 促进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法律制度创新研究

浦江人才计划 2 项

杨帆 城市老年人抑郁症状社区评估及干预模式的研究 C类，二辩

梁昕 基于数据挖掘的建筑中用能行为模式及节能政策研究 C类，二辩

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 2 项

郭俊华 上海市慈善活动运作效果研究

彭勃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评价模型研究

上海市哲社“三大系列” 2 项

林冈 “一国两制”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40 周年

徐家良 改革开放后上海社会组织创新发展研究 40 周年

2017 上海市高校智库 2 项

林冈 上海交通大学台湾研究中心

吴建南 改革创新与治理现代化研究中心

上海市哲社“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 2项

谢岳 新时代国家治理的法治逻辑

吴建南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 科研获奖情况

- 徐家良《上海市网络募捐事业发展研究课题》获得民政部二等奖
- 吴建南、吕晓俊获得“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最有影响力学者排行榜”

◆ 论文统计情况

- 教师论文：63篇（SSCI 16篇，SCI 2篇，ESCI 1篇，A类3篇，B类3篇，C类7篇，D类31篇）
- 学生论文：30篇（SSCI 1篇 黄奕雄，B类1篇，C类5篇，D类23篇）

◆ 专著统计情况

- 英文著作1本、中文专著3本、译著2本、教材2本、编著10本（其中：实证2本、第三部门2本（入选2017年CSSCI集刊）、城市治理2本，蓝皮书3本）

◆ 学术会议情况

- 2017年我院共举办了15场学术研讨会与论坛，52场学术讲座
- 邀请了Gary King、Anthony Saich、David Sameuls、Evan Berman等知名国外学者，同时也邀请了赵鼎新、姜晓萍、朱天飏、米加宁、何艳玲、刘国材等誉满国内外的中国学者，提升了学院学术氛围

速览

台湾研究中心举办“陆配群体的社会融入与价值认同”学术研讨会

1月7日，由上海交大台湾研究中心与上海市台湾研究会、上海台湾研究所、上海市台湾同胞联谊会共同主办的“陆配群体的社会融入与价值认同”学术研讨会在徐汇校区隆重举行。

国务学院举行教育部哲社重大攻关项目开题报告会

1月8日，2016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近代以来日本对华政军档案整理与研究”开题报告会暨“战前日本对华政策问题研讨会”在徐汇校区总办公厅举行。

“浦东新区行业协会商会参与市场监管体系建设研究”课题结项评审会举行

2月22日上午，“浦东新区行业协会商会参与市场监管体系建设研究”课题结项评审会在上海交通大学机械楼210会议室举行。此次结项评审会由上海浦东新区民政局与上海交通大学第三部门研究中心共同举办。

国务学院党委召开一届三次全体

(扩大)会议

2月24日下午，中共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第一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国务学院第一届党委全体委员、教职工党支部书记参会，会议由院党委书记曹友谊主持。

国务学院学生分获 NASPAA-Batten 国际学生模拟大赛冠亚军

2月26日，国务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刘凤丹、刘青琴、聂爽、杨文婷、张莹一行五人参加由清华大学承办的NASPAA-Batten国际学生模拟大赛亚洲赛区比赛。其中，刘青琴、张莹获亚洲赛区冠军，刘凤丹、聂爽和杨文婷获亚洲赛区亚军。



徐家良教授担任上海市法学会慈善法治研究会副会长

上海市法学会慈善法治研究会于2017年3月1日在上海成立，并举行了揭牌仪式。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副理

事长张凌当选为慈善法治研究会首任会长，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公益发展研究院院长、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徐家良等 10 位相关领域专家学者担任副会长，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后苑莉莉担任理事。

国务学院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 Ash 研究中心签署合作备忘录

3 月 20 日，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 Ash 研究中心主任 Anthony Saich（安东尼·赛奇）教授到访上海交大。校党委书记姜斯宪在闵行校区会见了来宾一行，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代表同来宾在徐汇校区签署上海交大国务学院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 Ash 研究中心签署合作备忘录。



国务学院 2017 届研究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隆重举行

3 月 24 日下午，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2017 届研究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在徐汇校区机械楼 217 室隆重举行。国务学院院长钟杨，党委书记曹友谊，副院长彭勃，党委副书记

谢玮，导师代表郭俊华，全体毕业生及其亲属参加了毕业典礼。典礼由彭勃主持。

台研中心举办“两岸城市建设与治理论坛”

3 月 30 日至 31 日，上海交通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在徐汇校区老图书馆 108 室主办“两岸城市建设与治理论坛”，本次会议由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上海市台湾研究会、台湾 21 世纪基金会、台北大学、成功大学两岸与华人治理研究中心共同协办。

台湾中山大学公共事务管理研究所 MPA 师生代表团访问国务学院

4 月 5 日，台湾中山大学公共事务管理研究所 MPA 师生代表团汪明生教授一行 35 人访问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国务学院院长钟杨教授、学院党委副书记兼 MPA 教育中心主任章晓懿教授、院长助理刘帮成教授、MPA 办公室和学生盛情接待了代表团一行。

“城市安全与风险治理研究”专题研讨会成功召开

4 月 6 日上午，为认真学习并全面贯彻落实习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瞄准上海在城市

治理尤其是公共安全、应急管理方面的关键问题。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组织校内相关领域的教授和学者在闵行校区召开“城市安全与风险治理研究”专题研讨会。

上海交大举办“第十三届海峡两岸暨港澳公共管理学术研讨会”

4月21日至22日，第十三届海峡两岸暨港澳公共管理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交大徐汇校区举行。来自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等9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220余位公共管理领域的学者参加会议。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姜斯宪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钟杨主持开幕式。



上海交大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和12345市民服务热线正式启动合作

4月26日，由校文科建设处处长、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建南带队，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副院长陈高宏、副院长李振全、院长助理张录法等一行赴上海热线办，商榷与“12345市民服务热线”合作事宜。上海市信访办薛秋芳副主任，上海市热

线办邓友中主任、管苏清副主任等出席会议。

上海交通大学2014级公共管理硕士(MPA)毕业典礼隆重举行

5月6日，上海交通大学2014级公共管理硕士(MPA)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在徐汇校区新上院N100号隆重举行，184名获得公共管理硕士学位的学子挥别母校，扬帆起航。

国务学院代表团出访德国、比利时、荷兰六所知名高校

5月17日至25日，国务学院院长钟杨教授一行出访德国、比利时和荷兰，先后访问洪堡大学、柏林自由大学、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安特卫普大学、伊拉斯姆斯大学和格罗宁根大学六所高校。此次访问进一步开拓我院国际合作海外院校资源，确定欧洲地区国际化合作战略伙伴关系。

我院和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住房与城市发展研究院签署备忘录

6月6日，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住房与城市发展研究学院院长Cornelis Wilhelmus van Rooijen教授访问国务学院，国务学院院长钟杨教授在徐汇校区总办公厅与Cornelis Wilhelmus van Rooijen院长见面并共同签署谅解备忘录。

上海交大举办“慈善法学习与社

会组织能力建设”研讨班

6月15日至17日，由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公益发展研究院、中国关心下一代健康体育基金会联合举办的慈善法学习与社会组织能力建设研讨班在上海成功举办。这次研讨班是民政部全国社会组织教育培训上海交通大学基地、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公益发展研究院举办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社会组织负责人研讨班。

上海交大举办“社会组织创新治理与融合发展”研讨会

6月22日，由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上海市张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上海市社会团体管理局指导，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公益发展研究院和上海科学技术开发交流中心主办的“社会组织创新治理与融合发展研讨会”在技贸宾馆成功举办。

国务学院 2017 届本科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隆重举行

6月30日下午，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2017 届本科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在徐汇校区机械楼 217 室隆重举行。国务学院院长钟杨，党委书记曹友谊，党委副书记谢玮，导师代表章晓懿，教师魏英杰，全体毕业生及其亲属参加了毕业典礼。

上海交大举办第三届“城市治理”

全国博士生论坛

7月1日，第三届“城市治理”全国博士生论坛在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成功举办。本次论坛由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学生工作指导委员会和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联合主办，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承办，并得到了《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社会科学》《探索与争鸣》《上海行政学院学报》《实证社会科学》《中国第三部门研究》《城市治理研究》等多家期刊的学术支持。论坛吸引了来自清华、上海交大、人大、南大、中大、武大、南开等 20 余所高校 50 多名优秀博士生前来参与，并邀请到全国各地的 20 多位专家学者以及公共管理学界知名期刊的主编进行论文评审，同与会学子展开交流探讨。

国务学院成功举办第三届“暑期社会科学方法论”培训班

7月2日至16日，为期15天的国务学院第三届“暑期社会科学方法论”培训班圆满落下帷幕。来自哈佛大学、香港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大、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上海市委党校等高校和科研单位的 190 余位师生参加本次培训。自 2015 年 7 月起，国务学院已连续三年举办暑期社会科学方法论培训班，影响力不断扩大，

本次培训班学员人数为历年最多。

国务学院举办第三届“实证研究中国”国际研讨会

7月15日至16日，由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主办的第三届“实证研究中国”国际研讨会在浩然科技大厦102报告厅成功举行。来自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密歇根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匹兹堡大学、牛津大学、多伦多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纽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台湾大学等高校的近30位学者到会并作主题发言。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召开工作汇报交流会

8月11日上午，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工作汇报交流会在徐汇校区召开。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院长姜斯宪，校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顾锋，校党委宣传部部长胡昊，文科建设处处长、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建南，研究院部分学术委员会委员及双聘研究人员等50余人参加会议。

2017国际公共管理网络年会在上海交通大学成功召开

8月16日至8月18日，2017国

际公共管理网络(International Public Management Network)年会在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成功召开。本次会议是国际公共管理网络的第21届年会，同时也是该会议首次在中国大陆召开。会议由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改革创新和治理现代化研究中心共同主办。围绕“变革时代背景下的改革、创新和治理：提高绩效和改进问责”这一主题，通过三个分论坛展开了交流讨论。



上海市“社区基金会训练营”在上海交通大学成功举办

8月30至31日，由上海市社会团体管理局、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和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公益发展研究院联合举办的“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示范项目(2017)”——上海市基金会秘书长政策法规学习与能力建设培训之“社区基金会训练营”在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浩然高科技大厦成功举办。

上海交大承办第七届“上海公益伙伴日”高峰论坛

2017年9月15至16日，上海市

民政局和上海市社会团体管理局主办、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公益发展研究院承办的第七届“上海公益伙伴日”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高峰论坛在上海新天地正式开幕。

上海市“基金会秘书长政策实务研讨班”在上海交大成功举办

2017年9月19日至20日，由上海市社会团体管理局、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和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公益发展研究院联合举办，上海紫江公益基金会协办的“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示范项目（2017）”——上海市基金会秘书长政策法规学习与能力建设培训之“基金会秘书长政策实务研讨班”在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文治堂成功举办。

中国公共管理学术年会（2017）暨第三届公共管理青年学者论坛在上海交大举行

10月13日至14日，中国公共管理学术年会（2017）暨第三届公共管理青年学者论坛在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成功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公共管理专业委员会和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青年工作委员会主办，由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和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承办。本次大会的主题是“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的公共管理：致力于打造一个更包容的社会”。



上海交大成功举办第三届大学生城市治理案例挑战赛

2017年10月28日至30日，第三届大学生城市治理案例挑战大赛在上海交通大学成功举行。本次大赛为2017“世界城市日”主题活动之“全球城市论坛”子活动之一，由上海交通大学主办，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和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联合承办，旨在推动青年学子关注城市治理，更好地传递“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思想理念。

2017全球城市论坛在上海交大举行

10月29日、30日，“世界城市日”主题活动之一“2017全球城市论坛”在徐汇校区举行。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上海交大党委书记、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院长姜斯宪出席论坛闭幕式并讲话；上海交大党委副书记顾锋在论坛开幕式上致辞并主持主旨演讲。





首届上海交通大学公共管理(MPA)案例大赛顺利举行

11月5日,首届上海交通大学公共管理案例大赛在徐汇校区机械楼举行。来自两个年级并自由组队的16支队伍参加了此次比赛。经过初赛、决赛的激烈角逐,最终决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和若干优秀奖。

上海交通大学第三部门研究中心入选2017年度中国核心智库

11月1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主办的第四届全国人文社会科学评价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论坛发布《中国智库综合评价AMI研究报告(2017)》。报告显示,上海交通大学第三部门研究中心在参评的531家智库中入选中国核心智库榜单。

国务学院“空巢青年”作品荣获第十五届挑战杯全国二等奖

11月18日晚,第十五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决赛在上海圆满落幕。上海交通大学以总分510分打破由自己创造的赛事历史纪录,再次问鼎“挑战杯”。这是上海交通大学继1991年、2011年、2013年、2015年四次问鼎并获得可永久保存的“挑战杯”之后第5次夺冠。上海交大也因此成为“挑战杯”赛事历史上首个连续四届获得最高荣誉的高校。



